六十年代的牢狱往事 饥饿的政治犯

贾植芳

我得的不过是“饿病”

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以后，我们夫妇都被扫地出门，先后被关押起来。我被关了十一年.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监狱里饥馑成灾，我在长期的羁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数同监犯那样，得了浮肿病。大腿和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来了。

一九六零年秋冬之际，监狱当局终于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的医院住院治疗，那里的“人民医生”（因为在这里看病的还有“医务犯”，即犯法前的职业医生）略为检视了一下，便开了个“高蛋白”的药方，我被留下住院治疗。我吃的所谓“高蛋白”，其实就是黄豆芽、豆腐之类的豆制品，偶尔有几片油煎带鱼，但就是这样的“高蛋白”也有神效，我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三天，腿部的浮肿居然逐渐消退下去了。其实这病医生不看，我这个“医盲”也明白，那不过是“饿病”，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一切正常了。

因此三天后，在监狱病房服役的“劳改犯”（即判刑的犯人），就叫我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并为他们喂饭、喂水。我曾向这位自称是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提出抗议：“我的病还未好利索，而且我快五十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他理直气壮地训斥我说：“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来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不我报告管理员，说你对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铐了，我劝你还是识相点！……”

这不啻是一堂政治课，使我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阿飞流氓，因为他们是“普通”刑事犯啊。因此，怪不得当这位“头头”“教育”我的时候，那些懒洋洋躺在床上的年轻病犯个个挤眉弄眼，向我这个政治犯投来蔑视的眼光，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奚落我……

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

我在医院住了十三天，就给搬到称为“休养监”的八号楼监狱。在这里“享福”不到五天，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被收押在二楼的一个监房里。这在监狱生活里叫“调房间”，同“抄靶子”一样，是监狱生活的例行公事。我一脚踏进狱室的门，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体弱的老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当管理人员在身后锁好门以后，他抬起头看见我，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我说：“我们不是在韩侍桁家里吃过螃蟹吗？”我向他点点头，一边用下巴指着门口，要他不要再说下去。

开过午饭后，我同他各自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闭目养神，虽然刚吃过饭，但至多 600cc（当时，犯人们习惯以“cc”为计量单位来衡量监狱给的饭食的含量之多少）的菜皮烂饭，仍不堪果腹，因此，饭后闭着眼睛静静听着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

这时，他忽然向门口走去吆喝“报告”，向管理员讨来钢笔墨水，说是要写交代材料。等拿到钢笔墨水后，他却从屁股下面的铺位上拿了几张草纸，放在膝盖上低头写着甚么。

过了不一会儿，我忽然被他撞醒，他把写好的草纸塞给我，我向门口警惕地看了一眼，才低头读他写的东西。原来是一首七言诗，题为《狱中遇甄兄有感》其中有“有缘幸识韩荆州”一类话，我含笑地向他点点头，表示我看过了，谢谢他的盛情；同时告诉他，这东西马上得撕毁，搁在马桶里，要不给管理员“抄靶子”时发现了，我们都得吃手铐。说着，我动手把它撕掉，起身掼在屋角的马桶里，又端起旁边的脸盆，把留下准备擦地板的洗过脸的脏水冲了进去……

1952 年的吃蟹往事

我说了半天，这里得交代一句：我在这个狱室里所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五二年。

韩侍桁一次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请客，宴请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译者罗玉君教授。被邀请的客人中，除了李青崖和施蛰存两位是我在震旦大学的旧同事外，余上沅、刘大杰又是我当时在复旦大学的新同事，都算是熟人了，只有邵洵美、罗玉君两位却是初会。记得是在众人已入座举杯的时候，邵洵美才匆匆地赶来。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长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旧的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就是我第一次与他相见时的印象。

一九五四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又应邀在韩侍桁家里吃蟹，也是吃到中途，邵洵美撞进来了，匆匆入座就食。这两次相会，大家都是天南海北的闲聊，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对话，但在事后，却引起我将他和自己印象中的邵洵美相对照。

他早年办过“金屋书店”，出版过《金屋月刊》，后来又是新月社重要人员之一；还主编过《十日谈》、《时代画报》等。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火与肉》等，更被目为中国唯美派诗歌的力作。

解放初，四川中路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用突击的形式出版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因大半属于第二国际人物，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著作，而受到《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这个书局也就昙花一现式地消失了。据传言说，它的出资老板正是多次经营出版事业的邵洵美。基于对他在文学界的旧印象，我当时不禁哑然失笑：他怎么忽然异想天开地要吃马列主义的饭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生里会与邵洵美成为四个月的“同监犯”。

—— 原载 新闻午报

Thursday, July 15, 2010

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

余习广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刘家远是一个老实人。他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 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 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还过得有些兴旺。乡亲们都说他娶了个能干泼辣的女人，刘家远家旺人兴有了指望。

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牵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两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闹一番。但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合作社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两口子意见也越来越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

1961 年 4 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

“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风整社运动开始止，才平息下来。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3812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万元）的23%；其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246万元，相当于五九、六0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0%。其中包括集体土地29563亩，社员自留地24307亩，房屋123960间，各种农具3823837件，现金2699000元等，每户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

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 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公社成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

刘家远杀子食子案

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而刘家远人崧货馕，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声。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事，连老婆都护不住。

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邻居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 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 20 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 5 斤多谷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

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1960 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当天夜里，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就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几刀就把他儿子杀死了，并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偷偷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那天晚上，刘家远说他几年来第一次吃了餐过瘾的肉！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跑到公社去报案。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人们从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对当年 “四大公案”的控诉。可以想见，澧县的“文化大革命”会有多么激烈、多么残酷……

报复杀人犯熊光禄
—— 《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第三章《黑暗岁月》片断
铁流

四川省四监狱九中队第三分队一小组，是清一色的死缓，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最小的熊光禄才十七岁。他们所犯罪行多是抢劫杀人或谋财害命，只有值星员（即组长）袁崇贵是公社书记杀害妻子的凶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出身贫贱，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大字认不得一升，有的还是文盲。案件数额极小，多为一口粮食和几斤粮票，如用价值计算超不足人民币十元。且犯罪手段直接，无任何作案技巧，原始得不能再原始。此种犯罪应为国家政策所致，是执政者不让老百姓活下去的结果，他们为生存不得不为之。

熊光禄，一个典型的农村孩子，憨厚老实，天真无邪，从不知道大山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平生只坐过一次汽车，就是从看守所送来省四监狱。他有一张稚嫩的娃娃脸，一双惊恐不定的大眼睛，圆圆高翘的大鼻子下紧紧地压着两片厚厚的嘴唇。他不善言词，一说话就发急，一发急鼻尖上就冒汗，那模样儿太像鲁迅笔下《故乡》的主人公润土。

我喜欢和他聊天，一次他问我：听说你当个记者，见过海吗？那海到底有多大多深？它的那半边是不是美国？我会水，打个“迷头”（四川话潜水的意思）就能钻过去吗？

我回答不出，只好一笑。

当时正是中苏交恶时候，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九篇批评苏共中央的文章，史称“九评”。批修防修是全党全国大事，领导干部学，机关人员学，工人、农民学，各行各业学，关押在监狱的犯人也要学，不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犯人怎么办？因为学习要联系实际，所谓“上联下批”，难免常常闹出笑话。

一晚上熊光禄发言说：赫光头的“三祸（和）一少”真它妈个舅子坏，害得我们农民穿不暖吃不饱，才使我去偷苞谷杀人……我以为他发言走了题，驻笔问道：他的“三和一少”，怎么与你偷苞谷杀人有关？他正儿八经道：当然有关啦！苏联是老哥，带头搞“三祸”，我们中国老百姓怎么受得了？他一祸公社化，二祸大跃进，三祸大炼钢铁，所以我们才缺吃少穿。

我心里特满意他的发言，认为他说到了点子上，但我是学习纪录，必须纠正他的“错误”说法，便道：不是“三祸一少”，是“三和一少”。“三和”是指“和平竟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一少”，是少支援亚非拉的革命人民。

其它在坐的同改哦了一声：不停地夸我理论水平高，解释得清楚透彻。我有什么水平，只能照本宣科敢言其它吗？学习是个套，狱吏们就用这个套在死井里抓活鱼，凡被抓上的不是挨斗争便是加刑 ，不然何以叫“改造思想”。作为“学习纪录”的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帮他们掩盖。

每学习完“一评”就要进行小结，各人都得写出心得体会呈交给狱吏。熊光禄写不出找我帮忙，自然责无旁贷。记者出身的我喜欢用手中的笔去解剖人和事。经过几次长谈，发现他的杀人犯罪实属毛泽东“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歪理邪说所致，近似一个洁白纯真的心灵为毒品海洛英所污染，是“阶级斗争”异化的产物。

他是宜宾古宋人，那是个山区里的山区，不通公路与世隔绝，是个世外桃园的好地方。千百年来邻里和睦亲善，无争无斗，没有仇敌，没有冤家，相安得像一家人。他祖祖辈辈世代农耕，大小九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无忧无虑田园生活。解放后老毛为坐稳天下，总是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什么“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尔后又是什么“互助合作”、“统购统销”，再后是“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运动。每搞一次运动就给农民脖子上系条绞索，到了 1958 年后不知农民脖子上系了多少条绞索？每一条绞索都是吸血的毒蛇，捆紧农民手足，勒紧农民裤带，让你死不死活不活，只能乖乖听命。

按照毛的说法，农业合作化的目的是要把千千万万的农户“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富裕的道路，不然中国会重新回到“人剥削人的旧社会”。这条道路就是要消灭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私有制，为此农民不得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他家是自耕农，不愿把土地交出来，一直坚持单干。“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然逃不了批判斗争。爷爷旧脑筋，视土地如命，无论怎样也不把祖上传下的五亩土地的契约交出来入社。天天斗月月斗，斗得来痛心疾首，一身是病。父亲是明白人，知道汗毛扭不过大腿，入得入不入也得入，最后只好入。在全乡、全县、全省热烈庆祝“人民公社取得伟大胜利”那天，爷爷一命乌呼了，死时手里还死死捏着那份契约。

他当时年纪尚小，不足十二岁，自不知人世间的欢喜忧愁，印象最深的是一日三餐白米干饭变成了公社食堂的大锅清水汤，穿在身上的衣服纵是千疤万补也换不上新的。家家一样，户户如此，缺吃少穿饿成了农村治不好的痼疾。父亲常向他说：儿哩，这年头要想吃饱穿暖，思想得进步提高，赶快入团入党当个干部，纵去不了县里乡里，在村里也不吃亏啊！在父亲的鼓厉鞭策下，他也学会了跟风，很快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当上公社基干民兵。别小视这职务，也有便利可拣。

在饥荒年间的一九六一、二年，农村遍地是小偷，偷地里蔬菜、红苕、苞谷；偷，放在仓库里的稻种谷种，以及哪些能进嘴的东西。这些小偷不是外来的贼，全是社里的社员，家贼难防，很难对付。为了保护集体财产，公社将基干民兵分两人编成一组，搭棚守护日夜巡逻。团支部书记胡海寿和他一个组，看管的是母猪岩那一大片苞谷林。苞谷挂上红须须，在硕大碧绿的叶子上摇摇摆摆煞是诱人，饿极的肚子恨不吞下几包。

大队给守夜民兵每晚发四两重一个火烧麦粑，可吃长饭的后生怎么也塞不满肠子，扛着步枪转几圈肚子里就没东西了，下半夜饿得来直流清口水。他是个死脑筋不开窍，再饿也不吭声。团支书胡海寿有心计，饿了会打主意，不是煮罐菜吃便是去地里抠根红苕。他不说也不参予，尽心尽责死死地守护着那遍成熟的苞谷林。一天夜里两人巡逻回来躺在草棚里闲聊，支书问：光禄，你饿不饿？他说：不饿。只是肚子里有点咕咕响。支书笑了说：傻瓜那就是饿，肚子在向你说，我要吃苞谷！我要吃苞谷！他笑了笑说：哪有苞谷，未别去偷不成？支书说：我们守护苞谷林自个吃几包，怎么是偷呢？别人去搬才是偷。他不言申，心里在想支书的话：到底对不对？

隔一会儿支书又说话了：我看着棚子你去搬几包苞谷回来，用树枝一烤，吃起来挺香的。他不表态也不动窝，支书再次催他干。时他说：这不太好吧，万一队里知道了怎办？支书纵声嘿嘿一笑：谁知道？这一大遍苞谷林林，没说吃它几包，就是几十几百包也看不出，除非自个坦白交待去？我火柴都带出来出了，你去搬，我找树桠。

他经不住团书记再一再二的催迫，风快地飞出工棚搬了十几包又大又饱籽的苞谷棒子回来，麻利地剥去皮扯去须，燃上树枝哗哗剥剥烤上，真好吃，香、脆、爽！吃上一次想二次，一连吃好几次，自然留下痕迹。一天大队长到各处苞谷林察看，在他们看守地段发现了几个啃过的烧烤棒子，于是不提名地进行了批评：这是谁干的？要坦白交待啊！待大队长走后团支书把嘴一撇说：坦白交待休想！光禄，你得扛住。

他是老实人不露一点口风，可团支书是精灵鬼，做贼心虚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主动向组织做了坦白交待，还检举了熊光禄怎样唆使他干这种“损害集体利益”的“盗窃行为”。不几天公社党委书记找熊光禄谈话，提出严厉批评，还勒令写检查交待。他不服申辩，说是团支书胡海寿叫他做的。公社书记冷冷一笑说：你狡辩什么？既是胡海寿叫你干的，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揭发？现在别人检举了你，你不但不认识错误，反猪八戒吃西瓜倒打别人一钉耙，凭这恶劣态度就该处分你！

他不再申辩，可一肚子是恨是怨，不知怎么发泄。晚上两人又在一起值夜，胡海寿心怯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粗粗地出着气，像个快爆炸的油桶。那夜特闷，天边沉雷滚滚，草棚热得发慌，相互没有一句话。不久两人睡下，被子里响起团支书的呼噜声。这呼噜烦得熊光禄睡不觉，他睁睁地看着头上那盏煤油灯。那滚滚沉雷变成公社书记对他严厉地批评声音：你狡辩什么？既是胡海寿叫你干的，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揭发？现在别人检举了你，你不但不认识错误，反猪八戒吃西瓜倒打别人一钉耙，凭这恶劣态度就该处分……

愈想愈气，愈气愈烦，愈烦就愈想报复泄愤。他想看想着，轻轻地爬下床，摸起放在门边那把挖山地的大铁锄，对准熟睡中胡海寿的脑袋用力砸下去。只听得噗哧一声，肉长的脑袋怎经得住铁锄的敲打，像个西瓜开了花，一床红红的血，白白的脑花，胡海寿没叫一声就死了。他怔怔地看着，手软腿无力，不知怎么是好？他知道自己杀了人，杀了人不枪毙也得坐班房，

可没有跑的打算。“好汉做事好汉当”，他拖着软软的双腿，来到大队长住的房子，在门前高声叫喊：温大队长！温大队长！……

大队长开门见是他，揉着惺惺睡眼问：光禄，这夜半三更叫什么？他道：大队长，我杀人了。大队长不相信说：你发什么梦颠？会回去睡觉。他不走，真诚地重复道：大队长，我真的杀人了，我把胡海寿打死了。

什么？大队长惊了，打开电筒光一照，见他一身是血，不敢怠慢立马赶到草棚，一瞧，满屋冲鼻的血腥味，满床血水脑花，一股难闻的气味直冲鼻孔，胡海寿一动不动躺在床上。

很快，大队和公社干部闻迅赶来，有什么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立即用绳索将熊光绿牢牢捆上，赶夜派民兵送到县上公安局。他什么也不推卸，一五十十说得明明白白，急得他父母呼天呛地双脚跳：这娃儿遭鬼迷了，怎么会去杀人呀？定有说不清的冤情哟！

什么冤情？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人一口承认，很快逮捕、审讯、判决，不到两月，县人民法院以“报复杀人”罪，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后戴上脚镣手铐打入死牢，待高院核准后执行。十天后高院批复书下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 x 条 x 款之规定：熊光禄不足 17 岁，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听完这个故事，我心里真不好受，就为几个苞谷棒子险些丢掉两个年轻人的生命。而今 70 年代后出生的人，决不会相信“乾坤朗朗，繁荣富强”的中国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何千何止上千上万！本人身上就发生过。那是 1960 年在“415”筑路支队劳教，一贴心哥们几次伙同我偷吃厨房饭菜，突然一天他经“政策感召”一下“觉悟”了，主动向狱吏告发我，害得我吃了一索子，气得我五窍来血，七窍生烟，但没有去杀人，因我有理智，知道杀人要偿命，只将他吃饭的碗筷扔在老乡家猪圈粪池里以示报复。

在那缺吃少穿的年头，中共一味地强调“阶级斗争”，把生活中任何小事归纳演绎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都成了“敌我矛盾”。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先下手者是“追求进步”、“靠拢组织的革命行为”，被告发者自然是“阶级敌人”，为此才有两个青年互为仇敌的悲剧！胡海寿死得冤，熊光禄判得冤，究其原因都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误导国家，但遗憾地是这个祸国殃的“思想”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清算，执政的中共仍呼之“万岁万万岁”。

死亡于人都很恐怖，世界上又有谁个不恐怖死亡？那“戴镣大街行，告别众乡亲，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那必竟是电影镜头。我经历过死亡，陪伴过死亡，也恐怖过死亡。试问一个大脑健全、活鲜鲜的活人当明知自已要被杀掉，在死前那一分一秒是什么心情呢？我来了探索的劲头，抱头沉思会儿问：当你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有什么想法？

想法？什么想法？他反问我：死就死呗！当法官宣布完叫我签字，我血冲脑门，抓起笔就签，二十年后又是个小伙子。可回到牢房我一下懵了，好像三魂七魄出了窍，什么都不知道了，昏昏沉沉地睡了几觉，到第三天才清醒过来，慢慢地又过两三天才明白，我是要死的人了……

我道：你害怕么？感到恐怖么？

他眨着一双幼稚无邪的大眼睛，久久地看着我说：害怕个么？恐怖个么？第一颗子弹穿过去痛一下，后面倒一箱子弹在身上，不就多几个洞洞。

他说得轻轻松松，一点不紧张。说到这里语调一转道：反正要死的人也不算时间了，听说毙那天官家要偿酒饭，我就盼呀盼呀，好想饱饱地吃一顿，嗨，没想到改判了……

他笑了，笑得天真灿然。

你现在悔不？我又问。

悔什么？他干了坏事，还去检举揭发我？这样的人不除，还得害人。他说得认真，眼睛里仍有仇恨。

我"哦"一声，哑了，久久地望着高墙外的兰天。兰天有鹰在翔，有鸟在飞，生命于人何其重要，但争斗的仇恨正在扑杀着宝贵的它们，人啊彼此得宽恕、宽容、宽厚……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残暴的专制制度。

作者惠寄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July 28,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跃进"的"丰功伟绩"

曦古
"大跃进"的"丰功伟绩"是什么！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运动，到年底时，有关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跃进"。从此"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了看家法宝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副总理薄一波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产的"1070 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薄一波 1959 年 6 月 30 日对薛暮桥等人的谈话，1967 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字报选第二辑；1967 年 5 月"斗

争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委员会”编印的《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滔天罪行》。）

那一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 3.4%，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 3.8%还略少一些。（史柏年《试析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粮食生产》，《党史通讯》1987 年第 11 期。一九五七年产粮三千七百亿斤，一九五八年三八二六点六亿斤。）谈不上是“跃进”，更没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高层，就变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又因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征购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 215 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 21 斤。（中国国家统计局编《1983 年中国统计年鉴》第 103 页。）

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年。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所以饥荒的到来只比“大跃进”晚了半拍，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比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灵璧县的三个乡饿死了 500 多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集第 436 页。）

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安徽文学》第 5 期。）许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 100 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中国人口年鉴》）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 2500 万人“无饭吃”。（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714 页。）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反 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党史研究》1981 年第 4 期第 21 页。）形势极度恐怖。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 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遢遢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钟山》杂志 1989 年第 5 期第 140 页。）因此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四川省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

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 103 万、258 万、300 万、125 万、26 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 811 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但根据《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第一版）一书中收录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中披露，当时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应该在 1250 万人以上。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 4 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 3.5 万人。（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 64 页。1991 年版《灌县志》第 74、130 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从一九六〇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 16 万！（1967 年 6 月 3 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

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 30 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 50 万。”（1967 年 6 月 3 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

安徽省

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 4.05 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 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 3000 多人被打，103 人被打成残废，还有 30 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 59、64 页。）

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 5%，一个占 11%强，一个占 15%，一个占 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〇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 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 65 页。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第一部第 19 页；《中国作家》1989 年第 4 期第 91 页，霍达《民以食为天》。）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

梓的老家全椒县，公布该县一九六〇年“人口非正常死亡 4 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1990 年版《宿松县志》第 89、83、32 页。1989 年版《濉溪县志》第 482、762 页。1991 年版《灵璧县志》第 77 至 78 页。1989 年版《涡阳县志》第 482、42 页。1988 年版《全椒县志》第 23、71 页。）

安徽死人情况严重，并震惊了高层。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当局力图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小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1962 年 2 月 3 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1967 年 8 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 42 页。）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300 多万，400 多万，500 多万。300 多万是个下限。

贵州省

遵义、毕节、铜仁地区，全家全家死绝的事件已不是什么新闻。

一九六〇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1967 年 7 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印发的材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 16 页。李景膺，1959 年至 1965 年为贵州省委书记，1965 年至 1967 年为内务部副部长。）

甘肃省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了望》周刊 1986 年第 41 期第 17 至 18 页；1987 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奖一等奖获得者麦天枢《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学》1988 年第 5 期。）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 130 万至 200 万之间，130 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 10%。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回答说：“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

青海省

青海省公布的死亡数仅为 12 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 54 万。（1990 年版《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第 88 页，1989 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人口青海分册》第 81 页。）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 40 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 15%了。

河北省

北京四围的河北省，并没有因为靠近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沾光。从北京往北，过了八达岭长城不远就是张家口地区。一九六〇年春，张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到下属蔚县调查。在蔚县西合营村，他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胡开明《难忘的三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 党史资料》第 39 集。）

在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河北省委的书记们既不敢向中央开口讨粮食，又不敢开放储备粮仓。他们只懂得一条：卡农民的脖子。省 委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决定全省农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口号是“吃四两，晒太阳。”因为太阳光里有热量，可弥补食物之不足。

胡开明跑到省里找省长：“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没要到一点粮食。而他手下的蔚县县委书记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竟决定再压低农民的口粮，规定全县农民日吃三两粮。按胡开明的说法，“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结果仅仅在实行此标准的头四个月里，蔚县就饿死了 2.8%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两后，宣化市的死人数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节初一，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书记指着宣化市委书记卢起责问：“宣化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卢起回答：“四两不行，就是五两也不行，至少需要六两。”会议这才决定将农民的口粮增加到六两。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才因而逐步缓解。（胡开明《难忘的三年》）

湖南省

湖南也没因是毛泽东的老家而免祸。溆浦县本是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此时人们也没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树叶可采，有猕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设法找点东西充饥。四周山上无野果可采的，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周围都是秃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饿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

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是刘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听说刘要回乡搞调查，当地干部怕他发现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机关路旁梧 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赶紧做了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刘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堆风干的人粪，用小棍子撩开，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农民告诉他，很多人已经饿死，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陈峰《啊！父老乡亲……刘少奇 1961 年还乡记实》，《记者文学》1989 年第 5 期。）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统计数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仅 86 万。但陪同刘少奇去湖南调查的夫人王光美说：当时“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必定是缩过水的，不可置信。实际湖南全省的非正 常死 亡数至少在 150 万以上。（《湖南省志》1982 年版第 2 卷[上册]第 253、256 页。）

湖北省

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饿死了人，一九六〇年死得就更多了。比如松滋县一九五九年饿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〇年又饿死一万六。宜都县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986 年版《松滋县志》第 27、60、62 页。1990 年版《宜都县志》）

江苏省

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 1.1 万多。武进县东安乡，仅 2 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 400 多。（1990 年版《溧水县志》第 94 页。1990 年版《常熟市志》第 1030 页。1981 年版《东安志》第 35 页。）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 1.6 万多人。一九六〇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 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 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〇年又死了 1.7 万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 0.4 万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 3.7 万多人中，1.7 万多是儿童。（1990 年版《高邮县志》第 61、162 页。）

当年副总理陈毅路过南京时，曾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苏省委事先已统一了口径，惠浴宇也就没有对他的老首长说实话。陈毅回到北京，叹道：“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1986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

河南省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 荒就最严重。”

河南省就是其中之一。该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 195 亿斤，他却按 450 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 260 页；《当代中国的河南[上]》第 136 页。）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 32 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 64 亿斤。省里要征购 9.6 亿斤，已属

过头，地委却自告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 10.4 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当代中国的河南》[上]）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公布的是 50 万。（1986 年版《信阳综览》）但这与目前已披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至一九六〇年春，正阳县饿 死 8 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 10 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一九六〇年一年里就饿 死 9.8 万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 203 页，1960 年 12 月 22 日《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86 年版《淮滨县志》第 69 页。）而“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有十五个”！

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仅息县就有 639 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 5647 户，息县 5133 户，固始县 3424 户。”（苏晓康《乌托邦祭》第 301 页，1989 年香港存真社出-版）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曾说当时“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阳。对信阳事 件，毛泽东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〇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查研究。不过，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毕竟没有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纪实文学》1989 年第 4 期，张文才口述、周之德执笔《周恩来轶闻》；王学仁《毛泽东和他的机要秘书》，见《湖北日报》社主办的 1992 年 12 月 26 日《楚天周末》）

另外，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一九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和“保证亩产籽棉 1.2 万斤，争取 1.5 万斤”的棉花高产奇迹。结果该县的粮食被大量外调，供上级领导观看的粮囤仅表面一层是粮食，下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断粮的农民成批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路上随时可见倒毙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 11.4 万。

山东省

山东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风调雨顺，夏粮长势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八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 700 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 887 万人。甚至在一九六〇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两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万亩。”（1989 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 194 页。）

本来据山东省委估计，200 亿斤是“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一九六〇年仅产了 166 亿斤。这样，国家应当支援山东 34 亿斤粮食才行。可是为向中央邀功，山东省委反而报告说

“大丰收”，农民“踊跃卖余粮”，从农民那里搜刮了 70 亿斤“余粮”交给国家，即从每个山东农民口里夺走了 100 多斤粮食。结果有 1600 万农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 142.7 斤”。（ 1989 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 193、201 页）每人每天不足四两原粮，还不够两只鸡吃的，人焉能不饿死！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 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〇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 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1987 年 11 月 12 日《人民日报》，段君毅《深切怀念张北华同志》。）

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较低而已。

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粮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区农民就不行了，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区农村共有 3.6 万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邻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数为 3.5 万多。东北重镇沈阳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三年内共有 6 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万五左右是归沈阳市管辖的新民县的农民，几千人属沈阳市管辖的辽中县。（1986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中国人口年鉴》第 399 页；1991 年版《天津简志》第 1176 页；《沈阳市志》第 431、435 页。）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

当年的国务院副总 理薄一波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 右倾’运动造成的。”（薄一波《若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有的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一九八九年科学出版社刊行，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即便是严肃的党史专著，也或者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 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多卷本《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第 2 卷，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272 页），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 常死亡数千万人”（一九九四年红旗出版社，吕廷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 36 页。），而不愿深入探讨。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 辉想清理那笔糊涂帐。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 4040 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社会》杂志 1993 年第 4、5 合期，金辉《“三年自然灾 害”备忘录》。）

根据二〇〇五年九月解封的“大跃进”秘密档案，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饿死及非正常死亡共计 3756 万人，其中一九五九年只统计了十七个省级地区。

面对着生灵的涂炭，四千万的饿殍亡灵，不但没有丝毫的忏悔之心和丁点儿的反思，那些个半导收音机、火车头等等反而成为了当今某些人心目中“大跃进”的“丰功伟绩”。

中国有句话，叫作“人命关天”。生灵的涂炭，四千万的饿殍亡灵，是那些个半导体收音机、火车头能替代的吗？“大跃进”不但功不丰、绩不伟，且恶贯满盈。

附：

1960 年河南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

http://www.cqzg.cn/118684/viewspace-2918

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全本）

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ztlw/rwyj/000058.htm

60 年大饥荒的时候修建的避暑别墅区

http://www.imagegarden.net/bbs/showthread_546037.html

—— 原载 凤凰历史
Friday, July 30,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应城农业化合作化运动

陈世高

农业互助组

湖北省应城县（现为市）解放后 1949 年 9 月在全县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为土改打下了基础。1950 年冬，开始在全县铺开土改，1952 年又进行土改复查，胜利完成了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

分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由于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无力抗拒天灾人祸的袭击，少数翻身农民或因生产工具不足，或因老弱病残劳力缺乏，造成生产生活困难，又重新出现雇工、借债、典当和出卖土地的情况，导致新的阶级分化。

土改结束后，在全县开展查田定产。1952 年 11 月 1953 年 3 月在全县开展大规模的整党建党运动，这时公开建党（此前秘密建党），以乡为单位建立党支部，对党员进行远景教育，迎接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到来。应城县的合作化运动同全国一样，分为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四个阶段。

中共应城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１９５１年９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于是，领导农民执行“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分期分批积极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帮助他们解决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

县委充分认识到要把几千年形成小农经济，通过说服教育，让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开始县委就加强了对合作化的领导，县委一书记梁俊义、县委第二书记邓必祯、书记处书记高今升和后来的书记处书记、县长孙世英，既挂帅又出马，把这个工作拿在手上，蹲在点上，各管一片；县委委员、区、乡领导和干部则是全力以赴组织互助组。以农工部部长熊炳文为首的县委农工部也是全力以赴，和部里的华富国、孙世英、肖述仁、李孝望、陈德俊、肖俊卿、鲁润林、张刚等同志，住在领导人的点上，专做互助合作化的工作，常年累月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合作化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成为合作化的专家。

1952 年 3 月县委在盛滩乡钱沟村试办了全县第一个互助组--钱汉炳互助组。在钱汉炳互助组的影响下，同年秋季，县委派出多个工作组进行农业互助合作的多点试验，全县各地开始办互助组，有同岭乡胡在林互助组，栗树乡陈世俊互助组，艾庙乡东十村黄元林互助组，西十乡陈世德互助组。县委组织部干事李昌成同志就在双灯月池湾组织了陈幼生互助组，以乡为单位试办互助组，这时每个乡都有二至三个互助组。县委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参加互助组合作化工作。这时的互助组分为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在常年互助组内为解决报酬合理，根据劳力强弱技术高低，评出底分，建立评工记分制度，实行“死分活记”，男女同工同酬，根据每个劳力的特长派活，做到人尽其力。

至 1953 年对互助组的工作全面展开，并由组织季节性临时互助组，逐步发展为常年互助组。1953 年年底全县有临时互助组 3993 个，常年互助助组 701 个，入组农户 23004 户，占全县总农户 33%以上。1954 年临时互助组减至 601 个，常年互助组发展到 5800 个，入组农户 42918 户，占总农户的 60，74%。其中渔业互助组 33 个，入组渔户 464 户。

在互助组中，农民的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和收获所得，仍旧归农民私有，只是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对耕牛劳力等价交换。由于互助坚持自愿结合与民主互利的原则，个个互助组都增产增收，受到农民的欢迎。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中共中央对于农业合化的运动极为重视，１９５２年冬至１９５３年春，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３年3月8日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又于3月２６日发表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１０月１５日、１１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纲，是农村工作的主题，说“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两次谈话，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表现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了联合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的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的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直到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后，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

中共应城县委根据中央上述一系列的指示与湖北省委和孝感委的布署开展工作，因为合作社是一个新生事物，谁也没有经验，于是，县委首先进行试点，县委派出华富国、孙世英。张刚、肖述仁等驻村干部发动群众入社，其中华富国进驻盛滩乡具体负责钱汉炳互助组的转社工作。在盛滩乡建立第一个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星火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入社农户 25 户。孙世英进驻西十乡曙光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继而各区在西十、艾庙、巡检、陈北、同岭等乡试办了曙光、五三、群力、同兴、燎原、胜利、先锋等第一批 8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 年 5 月又试办了第二批 10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初级社达到 18 个，以取得经验在全县铺开。各初级社选举了正副社长成立了初级社的执行机关——社务委员会，并建立健全了财务等制度。

为了适应合作化运动大规模地发展，县委主办了农业合作化训练班，由县委宣传部干事杨擎华、县委组织部干事李昌成负责，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多是互助组组长和准备发展为党员的积极份子，杨讲合作化，李讲党的基本知识。县委几位书记和农工部长到训练班作报告。从 1953 年 11 月到 1955 年 3 月，一期 200 人，每期 10 天，一个月两期，共培训 6000 多人。建国初全县只有党员 101 名，全是国家干部；1952 年土改结束，全县党员 995 名；为了适应合作化运动的需要，在农村和训练班里大力发展党员，每期发展 80 名党员，到了 1956 年全县共有党员 3941 名。整党和训练班都教育学员和党员翻身不忘本，带头走合作化的道路，他们是合作社化运动的骨干，毕业后回家带头组织合作社。

1955 年冬，在全面贯沏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指示》的基础上，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到 1192 个，入社农户 63105 户占总农户 85，66%。其中初级渔业生产合作社 3 个，入社渔户 81 户。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社，统一经营，民主管理，具有私有和集体两个方面的性质。入社农户的土地，作股入社，按入社时所评定的常年产量的 40 一 50%分红；耕牛农具作价入股，或折算入社，付给一定的报酬；劳动力实行评工记分，死分活记；农业收入，除去生产费用，交纳农业税后，其余部份则按土地、劳动力的比例分红制分红。具体分配方法为夏季预分，

秋后年终结算。由于初级社实行土地统一计划耕种，能地尽其力；耕牛农具统一使用，能物尽其用；劳动力统一安排，因人分工，实现了人尽其能；资金统一使用，投入农业基本建设和采用新技术，能促进农业增产。1955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 25062 万斤，比年景相同的 1952 年增产 1568 万斤。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 年初，对农业合作化更加重视，将发展农业生产合社的工作，作为党在农村工作长期中心工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力以赴，大力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口号。为了巩固初级生产合作社，并升级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 年 5 月，县委书记梁俊义同县委组织干事李昌成讲;县委决定派你带领工作组在杨河区的合阜乡办整党整社的重点，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方法得当，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细致的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和丰富的经验，孝感地委对于应城县合阜乡整党整社的经验予以充分地肯定，并向湖北省委推荐，省委通知李昌成参加省委召开的整党整社重点坐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麻城县和公安县，三县的经验都得到省委领导的肯定，并将他们的经验向全省推广。

在这里要提及时任县委书记梁俊义，他为人胆子大，有很大的气魄，敢想敢说敢干。他到合阜乡整党整社试点检查工作，听了回报，他认为这样作法太慢了，于是，他回县召开县委会，决定将全县（有关党政部门干部）区、乡、村的党员干部和积极份子集中到县里进行整党建党，发展党员，要求一个村有 3 一 4 个党员，并建立党支部。这样，打了一个大规模的整党建党的“歼灭仗”，因此，应城县的合作运动比其他县来得快。

1955 年 12 月在整党整社巩固初级社的基础上，根据群众的要求，由西十乡的曙光和盛滩乡的星火两社率先升级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 549 户。由此，并社升级的高潮席卷全县。1956 年全县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303 个，入社农户 72406 户，占总农户的 98，09%。其中高级渔业生产合作社 14 个，入社渔户 1899 户。初级社仅存 3 个，计 78 户。1957 年，经过整顿巩固，全县共有高级社 306 个，其中：200 户以下的 113 个，201 一 300 户的有 98 个，300 户以上的社有 95 个，入社农户 74123 户。全县基本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初级社升高级社时，土地（包括塘堰及其水利设施）转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耕牛大中型农具，合理作价，亦转为集体所有，由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实行分组作业，评工记分，执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与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但社员私有的房屋、家俱、粮食等生活资料以及家禽家畜小型农具仍归个人所有。此外，高级社还将集体土地统一安排一部份给农户作为自留地，自种自收。自留地的数量一般占总耕地 3 一 5%，户均 1 一 2 分。

在农业高级合作化的过程中，应城县的合作化运动同全国一样，也曾出现了急躁冒进的问题，1956 年元月，县委在向地委、省委的报告中称：“到元月 15 日，应城县建立了 234 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参加的农户达全县总农户的 84%”18 日在《湖北日报》报道了啄木鸟“应城县三天合作化”的文章。指名道姓批评了县委书记梁俊义。27 日中央、省、地三级派人检查，发现报告的情况不实。2 月 15 日，省委发出了《关于应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的指示》。县委根据《指示》精神，认真总结教训，及时组织大批领导与干部赴问题较

严重的区、乡进行整顿，把高级农业合作化运动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报告还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即批判“小脚女人”，从此，应城县“三天合作化”的事，也就宣告结束。总的来讲应城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是健康的顺利的。

由毛泽东主席主编，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出版发行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就采用了《应城盛滩乡星火农业生产合社 1954 战胜了灾害，合理进行了分配》的经验。文章中介绍了战胜灾害获丰收；贯沏执行政策合理分配；巩固社员以社为家的思想的经验。（应城县委书记梁俊义 1955 年 7 月 22 日（载中册 848 一 854），原载《湖北农村》上 118 期）此文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社长钱汉炳因此受到奖励，赴北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农业合作化的实现，推动了我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把我县的农民引上集体主义的道路，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低水平上保证了我县人民对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需要，改善了农民的生活。1957 年农业大丰收，完成国家任务后，农民都分足了口粮，多的粮食没人要，所以，后来人们一直记惦 1957 年的好光景。

我县农业合作化总是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我县农业合作化采取了由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都是采取自愿互利的原则，运用典型示范，逐步过渡的形式，引导农民逐步摆脱私有制，走向社会主义，避免了因突然改变而使农业生产力受到破坏和损失。

人民公社

1958 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发动大跃进和诞生了人民公社，也刮起了“五风”。

高产“卫星”竞赛

一九五八年干部种试验田奉为时尚，革新先试验，成功就推广，体现了实践是第一的观点，种试验田无可非议，可是，种试验田时走上邪路，出了偏差，在“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指导下，”所有农村干部都大办试验田，一些领导人的什么“试验畈”、“试验冲”、“试验榜，”的试验牌上写的豪言壮语的口号，高指标，把人力、物力、肥料和财力全往试验田里使，结果是试验田的农作物疯长倒伏减产，甚至绝收，而大面积农作物缺肥和少管理也减产，谁的官大，谁的试验田的肥料和物资多，试验田都未出成果，我们团县委 1 亩试验田，队长对我们种试验田很有意见，认为浪费了肥料，影响大面积平衡增产，他不沾试验田的边，当时，他是 48 岁，精明强干，是一个种田“精”，一天，他来到试验田望了望，我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连稻草也收不到五千斤，下肥过多，栽的挨挨寸，过密不透风，将来疯长倒伏，连百斤也收不到。”过了十几天，试验田禾苗猛长，浓绿，分孽密密展展，为了通风防倒伏，我们先用鼓风机鼓风通气，

夜间有人用竹竿赶露水，后用竹子一行一行扎架子，最终，不出队长所料还是倒伏了。

7 月初，县委为了验收高产试验卫星田，组织了验收组，分赴各区、乡验收，我和县监察委书记李芳同志为一个组，他为组长，我是副组长，负责对原城郊区五个乡的验收工作，李芳同志办事认真，规定先申请验收，我们到现场看着收割打场全过程，再用秤称，城郊五个乡，唯有城台乡李攀章同志的试验田亩产 900 斤，还未风干扬净，其他四个乡的书记试验田也只七百斤、八百斤的，我们验收的一位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田也因下肥过多倒伏烂掉而失败，收了几阁篓空壳，我们团委试验田，花了那么大的代价，也只打了四百来斤的湿谷。

可是，其他区、乡“高产卫星”接连发射，早稻卫星由亩产两万多斤到五万斤，十万斤，乃至十五万斤，二十万斤的。还有亩产芝麻千斤卫星，棉花大王等等，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大肆宣扬，喜报不断，凯歌阵阵，捷报频传，令人眼花缭乱。尤以黄滩、郎君两区为甚，同我们验收的差距太大。李芳同志对此产生了怀疑，他对我说：“为什么人家放那么大的卫星，我们验收却放不出卫星，你到黄滩去看看，了解真象。”

我吃罢晚饭，骑着自行车来到黄滩区，恰逢他们晚上开区委会，区委书记丁葆芳请我参加，我不知道解决什么问题而谢绝参加。当时，区里无招待所和旅社，上面去的干部与区里干部一同睡觉，我和区委书记丁葆芳同志关系好，他请我睡在他的床上，他的房与会议室相邻，房门在会议室中间开着，区委开会时，在房间里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我虽未参加会，实际上等于参加了他们的区委会议。

会议研究丁书记的试验田放特大的高产卫星，有的主张放十万斤，有的主张放十五万斤，有的主张放一个特大卫星，二十万斤，走在全县的前面，压倒全县，以此作了决议。有一个人补充一句，无零不成账，二十万斤挂一个零。决议作出，区委分工分头行动，有的区委到飞跃大队组织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群众将各队的谷挑到一个稻场，有的去把试验田耕掉只留一个角，加栽一些谷蔸，有的负责写喜报，有的负责写“特大高产卫星”的经验。喜讯连夜报到了县里，他们如何制造二十万斤“特大卫星”全部过程我全掌握了。

原来我们在验收时，李芳同志有点半信半疑，但不敢公开怀疑，我对于放的所有“高产卫星”是坚信不疑的，这颗特大卫星的放出，使我解开了“卫星”之谜。此时，我才如梦初醒，原来放卫星是吹牛造假，这时，原来“高产卫星”如同偶像一样，在我心目中顿时倒下，彻底破灭，并对一个堂堂的区党委敢于集体造假欺骗上级感到奇怪，丁书记同区委委员干部们忙了一个通宵，我一个人在床上也睡不着，想了许多、许多。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县里。

在县委会遇着县委办公室主任李家荣，他说：县委梁书记带人到黄滩区去，验收丁书记放的一个特大卫星，请你也去参加，我说：我刚从黄滩回来，我和李芳同志要去搞验收，那我就不参加了。开高产卫星现场会，与会人员听经验介绍，心中明明知道这都是假的，好象秦赵高指鹿为马，迫于权势，只好把鹿说成马，人们也畏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也只好把假卫星说成“真”卫星。

湖北省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红旗人民公社

1956 年底撤区并乡，在原来区的基础上设立指导组，1957 年底又撤销指导组恢复区，因为解放以后，县委各项工作都在城郊区搞重点，县委决定不恢复城郊区，这 4 个乡则由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好象战争年代杨罗耿兵团一样，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县委在盛滩一社和西十的曙光社办了两个重点，上级有什么新精神和新经验，就首行在这两个重点社试验，接着，向 4 个重点乡传达贯彻，再到全县铺开，这样，使工作和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向前推进。

1958 年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本来应城县的合作化运动开展得很健康的，促进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农民欢天喜地，但是，不幸的是仓促急忙在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导致三年困难时期。自然不光是一个应城县的不幸，而是全国性的不幸。

为什么湖北省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在应城县呢？因为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王良长期在盛滩蹲点，他代表省委亲自和地委、县委领导，在那个十分简陋大会场主席台上（后改为电影院的地方），研究筹备建立红旗人民公社，这样，4 个直属乡组建了红旗人民公社，就成为势在必然了。

1958 年 8 月 6 日至 8 日，毛主席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新闻媒体把毛主席说的“人民公社好”的消息一下传遍全国，从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神州大地汹涌澎湃地发展。

应城县区乡干部到七里营参观学习。离毛主席视察七里营只有 20 天，1958 年 8 月 28 日，应城县红旗人民公社诞生，它是湖北省孝感地区应城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由西十、盛滩、艾庙、范河四个直属乡组成。

在应城县人民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龙灯狮子，载歌载舞，隆重庆祝公社的成立。参加庆祝会的有湖北省委、孝感地委的领导，孝感地区各县县委书记，应城县县委委员、县直机关干部，区、乡党委书记和群众几万人。中共湖北省省委常委、秘书长王良，中共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代表省委、地委致贺词说：首先向红旗人民公社成立表示热烈祝贺。说：人民公社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和军事组织，

“一大二公”，这就是人民公社的性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我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31 日《湖北日报》头版刊登了王家吉的贺辞，同日，《湖北日报》发表了题为《以建立人民公社为动力，推动生产大跃进》的社论，从此，全县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至 9 月共建成 9 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规模由 300 户左右扩大到 1 万户左右，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下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小队。要做到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民兵为了做到“三化”舍弃自家房屋不住，就到荒郊野外搭战棚，一时间，田野战棚成群，星罗棋布，男女民兵分别住进了战棚，在搭建战棚时，农民的房屋、树木、用具再一次遭劫。

公社成立，百废待兴，急匆匆地办起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商店、农机修配厂、拖拉机站，把农民喂的猪捉去办了猪场，以小队为单位办了食堂，大兴土木，建公社办公室和大会场，折旧屋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为了体现“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实行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管理体制；在组织上从公社到生产队实行团、营、连、排的军事建制；生产上搞“大兵团作战”。生活上大办食堂，上级领导认为农业大丰收，粮食过了关，长期困扰着党政领导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吃饭已不成问题了。省委书记王任重给全省食堂赠送了一幅对联：“一日三餐餐餐有干有稀，四菜一场顿顿有荤有素”。横幅：“八百斤口粮一两也不能少”。后来，发展到干脆敞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一些城里人和外地人也跑到人民公社食堂吃饭，不但不给钱票，还说食堂饭菜味道不好。

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按月发工资，但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发了两个月的工资，就再也没钱发了。加上大办钢铁，青壮炼钢去，留下童与姑，大秋作物没有即时收获，浪费十分严重，极端的平均主义。加上高估产，高征购，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全购走了，还在催征购，食堂到了冬腊月，社员们在食堂吃羹喝水，大多数揭不开锅盖了，开始挨起饿来。

人民公社一经成立，打破了所有制界限，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改合作社核算为公社核算，不管大队的小队的统统都是公社的，公社无偿调用下面生产资料和农副土特产品以及劳动力，原合作社和生产队的财产，一律归公社所有，大队小队出售的农副产品，副业收入统一由公社结算，大中型机械由公社管理使用，原来折价入社的，仍由各户喂养保管的耕牛和农具，公社成立后全部地归大堆，牛进小队牛棚，农具入小队仓库，由于牛栏条件差，又无人精心喂养，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农具无保管责任制，任社员随便使用，丢失损坏十分严重，由于男女老少全部吃食堂，将农民的自留田和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

当时，领导想的和做的，都注重增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对于所有制、等价交换，按劳取酬，关心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原则和价值规律，都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并当作资产阶的法权来消灭。

合作社是一种潮流，不少农民是被潮流卷进合作社的，因而在合作社里生产劳动积极性不高，而人民公社刮起的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一平二调风、共产风等五风，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和挫伤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使他们有限的积极性丧失殆尽，“做事一窝蜂，个个磨洋工”，“出工如拉纤，收工像射箭”，一位耕田的农民对牛说：“牛呀！牛呀！你慢慢的走，我不打，你不吼，只要太阳一落土，我的十分到了手”。这是当时农民消极怠工的真实写照。农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点劲也没有。

大炼钢铁

在上世纪 50 年代，国民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到了 1958 年的夏季，上级认为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解决，钢铁元帅应该升帐，于是，又提出“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办钢铁”，在县、公社配备了管工业的书记，7 月组织工业书记到河南省西部参观，看那里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

回到县里以后，在机关、学校、团体进行了大动员，雷厉风行，土法上马，大搞“小土群”，这样，县委、县政府大院和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也相继办起了炼钢炼铁的小高爐，各公社也都在各自的伍家山、有名店、东嶽庙、团山等地也建起了小高爐。从山上挖出

石块作矿石，供小高爐炼铁炼钢的原料，也没化验石块里是否含铁？含有量多少？就把石头粉碎后，用木柴架着烧，说也怪，就是日以继夜不断地烧，怎也炼不出钢铁出来。

可是，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报道全国、全省大放“钢铁的卫星”，形势逼人，这时，有的单位和公社想出了办法，将耕田的鏡头鈊耳弄来，投入小土爐中炼，化成铁块，用板车拖着，带着喜报，文艺宣传队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向县委报喜。县委也向省、地委报喜。

虽然不断报喜，上级发觉是假的，后来提出那些没有铁矿的县，到有铁矿的地方去炼，根据湖北省委和孝感地委的统一安排，应城县到应山县的中华山和汉阳县的奓山炼钢铁。县委组织万人上马，炼钢铁大军，到外地去炼钢铁。

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郭国辉和工交部副部长陈启初带领，前往应山的中华山炼钢铁，由县粮食局局长邹家鞠和人民银行刘副行长带领前往汉阳的奓山炼钢铁。

9 月的一天，我从蹲点的季灯大队回县里办事，县委书记邓必祯看到了我，临时动议要我到应山县和汉阳县炼钢铁的地方去一趟，他跟我讲了几点意见：

一、要两地前线炼钢铁的领导，以一天等于 20 年和只争朝夕的精神，日以继夜地炼钢铁；

二、炼钢铁指挥部的各级领导要吃住睡生活在炼钢铁的小爐旁；

三、做好工地政治思想工作，对民工要进一步动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全力以赴投入炼钢铁，办好生活，让民工吃饱吃好，炼钢铁的民工三班倒，歇人不停爐；

四、要力争早日炼出钢铁，一炼出钢铁，要迅速向县委报喜；

五、要他们即时与县委联系，现在他们的电话安装在小队，要通过几道总机，打回的电话都听不清楚，不知讲的是什么，两处都要安专线，在专线未安装好之前，他们可以到县里跟县委打电话。

你明天立即动身去，原原本本传达我的意见。

次日清晨，我乘汽车到武汉，转乘火车到广水，步行赶到中华山炼钢铁基地。

我见到工地干部和民工的工棚，搭摆得整齐有序，分为男女住区，小高爐林立，男青年采礦石、砍柴，运输和炼钢铁；女青年负责捶礦石、后勤和生活。

工地领导见到了我，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特别热情，我先将邓书记的几点意见向工地领导作了传达，他们认为很好，于是，决定晚上开干部群众大会，由我传达县委书记的指示。那时组织纪律性很强，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晚上 8 点以团为单位整队入场，席地而坐，都是青年男女，会场上拉歌，气氛十分热烈，会议由陈启初主持，他首先请我传达县委书记的指示，接着郭国辉县长讲话，各团领导在会上表态和开展挑战应战的竞赛活动。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以实际行动落实县委的指示，全体干部围着炼钢铁的小土高爐，同民工一块炼钢铁，县长和部长都彻夜未眠，当然，我也不能去睡觉，同大家一道熬了一个通宵。

次日，我乘火车到武汉，再乘船到蔡甸，步行上到奓山，找到了应城炼钢铁指挥部，我向指挥部的领导传达了县委的指示，由他们层层向下传达，但是，不管怎样吃苦耐劳，即使不睡觉，仍然炼不出钢铁出来。

为了应符逼人的形势，中华山应城县炼钢铁指挥部收购了一些废旧钢铁，倒入小土爐中炼了铁块，向县委报了喜，算交了个差。

秋末冬初，寒潮袭来，在大山上交通不便，生活物资供应跟不上，就收兵回县。为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出劳力、出生活费用，付出很大的代价，山上的森林受到严重的破坏，县里也花费一百多万元，只失无得，劳民伤财，实在划不来。

无独有偶，与此同时大办水利，根据省、地委统一安排，在京山县境内的晏店修一座大型水库，安陆负责建大坝，应城负责修渠道，县委一书记梁俊义任指挥长，1958 年的 7 月带领 3 万多劳力上马，从京山县挖到应城县，从应城的北部一直挖到的南部湖边。挖了几百万方土方，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占压大量的土地，而安陆负责的大坝只是由抽糟转入回填。

到年底省委认为摊子铺得太大，决定晏店水库下马。人说水到渠成，应城是水库没修大坝就开渠道，结果是白修一场，也是劳民伤财。青壮炼钢铁上水利，留下老幼姑，晚秋作物未能即时收获，损失很大。

大跃进遭到失败的教训

从此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在经历了饥饿、寒冷、疾病和死亡线上的折磨，领导头脑开始清醒起来，在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总结经验教训，县委领导号召与会同志要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会上象开锅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了，把憋在心里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大家说：

胜利冲昏了头。在取得国内革命战争胜利，又顺利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上求胜心切，制定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包不得一天建成社会主义。什么事都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一天等于 20 年”，要求过高过快，不仅要赶快建成社会主义，还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实现了全县人民公社化。

一味地反右倾鼓干劲，推动大跃进，物极必反，越反越左。从发动之日起，就开始反右倾，领导手中都拿着棍子和帽子，随时随地抓人的辩子，打人棍子，给人戴“右倾保守”、“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帽子，丢掉了群众路线的好传统，堵塞了言路，许多事情都是上面压出来的，逼得下面弄虚作假搞浮夸，报喜不报忧。

领导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切不从实际出发，不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去办事，而是以主观愿望出发，比如早字当头，越早越好，密植越密越好，抗旱大兵团作战，推广一季晚粳和双季稻，盲目地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交通等，大灾之年不领导群众救灾，而去大办水利等等，都是让社员的汗白流。

不讲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大跃进中时时处处不讲政策，不讲所有制，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提倡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什么你的他的，统统都是我的，归大堆一拉平。领导喜欢赶浪头，出风头。初级社还未办好，马上实现高级合作社化，高级社未站稳脚跟，一阵风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侵犯了群众利益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不讲法律，当时，虽然，国家有宪法和其他的法律，但是，有法不依，法律成了一纸空文，从上到下的干部，没有法制观念。随意侵犯群众的人权、财权和其他权利，为什么干部敢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因为权大于法，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干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和“左”的路线横行无阻，得不到人民群众、新闻媒体、法律和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滋生腐败。

所以，归根结底，大跃进失败的真正教训，是权力不受约束，所造成的恶果。

这些血的教训，我们应该汲取，永记不忘。

1961 年 5 月，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精神，缩小公社的规模，撤销管理区，以管理区建立人民公社。1962 年贯彻《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确定“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提高了社员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其后，在学大赛过程中，由于忽视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行大赛标兵工分制（即政治评分），将社员的正当家庭副业、自留地一律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还有少数大队，大搞穷过渡，盲目将生产队核算过渡到大队核算，使社员进一步滋长了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思想，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大队和生产队核算的管理体制才宣告终止。1984 年恢复区、乡建制，撤销人民公社。

(笔者系离休干部)

—— 原载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Friday, July 30,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略谈河南两次大饥荒的异同

高伐林

1942 年，河南处在抗战相持阶段的艰难岁月；1959 年，河南处在中共建政第十个年头的和平建设年代。1942 年，当灾象初呈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1959 年，年初，毛泽东收到了河南省某些县里农民的信。1942 年，国民党政府对外出逃荒的灾民放任自流；1959 年，政府对外出逃荒的灾民严格禁止。

河南真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据说在二十世纪以“乞丐之乡”闻名。仅从英国记者贝克《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姜和平中译）和中国学者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两本书来看，从 1942 到六十年代初不到 20 年，饿死数百万人的大灾就至少发生了三次——中间的一次是 1946 年，据贝克的书里所记载，1946 年的大饥荒席卷中国 19 个省份，河南也在其中，据说也死亡数百万。英国记者约翰·里德利写道：“经过那些残破的土屋，总能感到屋里发出尸体的恶臭。”

我在阅读贝克和宋致新这两本著作时，随手写下一些读后感。整理了一下，这里我简明扼要地列举一下 1942 年和 1959 年饥荒的异同。以下史实，除注明者外，均引自这两本书。我得提醒读者注意：贝克控诉他认为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和中共的心情溢于言表，而宋致新在抨击日寇侵略者的同时，谴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也毫不掩饰。

1942 年，河南处在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第五个年头、相持阶段的艰难岁月，日寇占领了全省三分之一土地。

1959 年，河南处在中共建政第十个年头、“大跃进”的和平建设年代（不过，正如信济所说，这一年发生了达赖出走的西藏事件，三年后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42 年，当 8、9 月河南灾象初呈时，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识到危机，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为 250 万石，又命令立即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把陕西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但蒋介石采取这些紧急措施，是为了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这一年 12 月，中央政府虽然拨给了河南 2 亿元救灾，但同时下令：军粮征收不能再减免。

1959 年，年初，最高决策者毛泽东收到了河南省某些县里农民的信，信里明言有人死于饥饿。毛置之不理，反而认为农民是因为抗拒交出私藏粮食，才招致干部殴打。这一年 2 月，毛在省级干部会议上说，“只有 5%的干部违法乱纪，我们应该看成是个别现象……如果我们夸大这些缺点错误是不对的。”（此外，众所周知，这一年的“庐山会议”，本来中央有意图要纠“左”，但毛泽东因为彭德怀上书称“大跃进”“有失有得”，掀起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狂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

1942 年，国民党政府以“国难当头”“不得影响抗战士气”等理由，进行新闻封锁。《大公报》因为披露灾区真相的报道和发表抨击当局的社论而被整肃，罚停刊三天；幸亏河南省南阳的民营地方小报《前锋报》，派出年轻记者流萤（即李蕤），发表《豫灾剪影》系列通讯和相关社论，随后该报社将系列通讯辑录成书出版。（图片说明：贝克著，姜和平译，《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1959 年，中共当权者以“捍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等理由，禁止报道真相。继 1957 年“反右”运动之后，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一片对“三面红旗”颂扬之声，中央到地方所有报刊对灾区都只能进行“正面报道”。（但据杨继绳《墓碑》和他接受我采访时所述，当时的记者还是秉持良知，采写了大量“内参”，将严重的灾情上报中央）

1942 年，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31 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

1959 年，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向中央报告：前一年“大跃进”获得伟大胜利，本省粮食产量“放卫星”，达到 3,500 万吨，比实际产量 1,250 万吨高出近三倍！吴还保证河南省要争当全国“第一个扫盲省”、“第一个水利化省”和“第一个实现共产主义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说，谁敢说 1959 年产量低于 1958 年，谁就是“阶级敌人”。

1942 年，国民党政府对外出逃荒的灾民放任自流，不闻不问，致使灾区社会状况极为混乱，加重了人民的困苦。幸亏当时陕、甘各种社会慈善机构，出面组织各种募捐赈灾活动和设施，设立“粥棚”“孤儿学校”“收容所”。（另据有关资料，当时国民政府在陕西山区划定了移民区，号召河南灾民自行前往接受安置，并发放安置费，每人 2 块光洋。）

1959 年，共产党当局对外出逃荒的灾民严格禁止，设卡堵截，路宪文将逃荒者也列为要镇压的“三种障碍”之一，下令主要干道、铁路由民兵把守，游民一律逮捕，连路边乞讨的孩子也当“罪犯”抓起来，各级政府还命令严禁收留逃荒者。仅固始一县，就有 15,000 人因为企图逃荒遭到逮捕关押和送去劳改。这一时期，社会上已经基本上没有任何慈善团体了！

1942 年，少数外国记者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气，如《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冒著危险深入到灾区进行采访，不仅对西方报道中国真实情况，而且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各级统治者直率建言。

1959 年，西方记者对河南灾情的采写报道情况尽付阙如。贝克在其《饿鬼》中，点名批评了包括埃德加·斯诺、韩素音、新西兰诗人路易·艾黎、费正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些著名西方记者、学者，认为他们在大饥荒的年代访问中国，却并没有揭示实情。

—— 原载 作者博客

Friday, August 06,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所知道的“特殊案件”

肖磊

笔者读了 2009 年第 10 期《炎黄春秋》刊登的安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尹曙生同志关于“特殊案件”的文章。此文以无可置疑的事实披露了三年严重灾害时期,安徽全省因饥饿发生大批非正常死亡及人相食 1289 起的骇人听闻事件。在那只准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的年代里，安徽省公安厅能将人相食的这种“特殊案件”材料完整地保存至今，确实不容易。这是那段不寻常历史的铁证。否则，历史最悲惨的一幕将被模糊，甚至被淹没。

几年来，笔者从一些报刊上读到了三年严重灾害时期人相食的事例，虽然不是完整的数字，但也说明,人相食事件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发生。人相食是饥饿到了极限、生命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发生。这时即便有一点树皮吃(笔者在山东益都县亲眼见到树皮树头都被吃光)，也不会吃人的尸体。真不敢想象那让人恐惧的可怕场面。

史料记载，各朝各代都有过灾荒，有过饿死人，也有人相食。但如三年灾害期间饿死人之多，其规模波及全国，人相食事件之惊人，都是绝无仅有的。

三年灾害期间，笔者工作在山东。据吴玉林主编的《中国人口》山东分册记载：1959 年至 1961 年山东非正常死亡 319.9 万人。人相食事件虽无全省数字，但从部分案例中，说明全省各地，特别是灾害重点县，均发生过人相食事件。1960 年春，山东日照县检察长发现本县和相邻的莒县，不但大批饿死人，且发生人吃人。为了情况可靠，他还亲自到事发地点作了核对。经初步核实，日照县一个生产大队发生人吃人三起，吃掉尸体五具。莒县的三个生产大队均发生人相食的事件。他将情况转告莒县领导部门。因事关政治影响，未敢向本县领导人汇报，没过几天，又相继发现人吃人事件。这时他想起在省检察院任检察长的本县同乡陈雷。陈是 1926 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向他反映，一定会得到重视。这位县检察长急急忙忙到省检察院向陈雷汇报了人吃人的情况。陈雷听了甚为震惊，认为如此严重的问题，应立即报告省委主要负责人。此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开会,住北京饭店。陈送走了日照县检察长，连夜乘火车赶到北京饭店，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日照县人相食的情况。陈雷满以为会得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重视，但出乎陈的意料，主要负责人态度冷漠，且不耐烦地问陈：“你谈的这些情况是听说的呢?还是亲眼看见的呢?”陈雷从问话的口气里听出省委主要负责人忌讳听饿死人、人吃人的事件，涉及严重灾情、继续饿死人的情况陈未敢往下汇报，只好悻悻而返。据笔者当时得知，有许多干部向省委汇报饿死人、人相食的情况，都被以“听信传言”顶回去,并告知全省各地“禁止传谣”。有传播这方面情况的，要严加追究。1960 年春，济宁火车站一外流人员被劝阻站劝阻(那时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均设阻止人员外出逃荒的机构，名曰劝阻站)。这位外流人员说：“饿的人吃人了，还不让逃荒。”外流人员当即被送到车站派出所，以“污蔑大好形势”的“罪名”关押审查。也是这年的春天，胶济铁路辛店火车站挤满了外流人员，要求上车，被劝阻站阻止。其中一外流人员带着全家数口外出逃荒，被劝阻站挡住，令其全家返回原地。这个外流人员说：“要不是饿的人吃人，谁往外逃荒。”劝阻站的人员说：“你这是造谣破坏。”互相争吵起来，劝阻人员对其打骂。

外流人员从携带的炊具中抽出一把菜刀相威胁。适有公安战士在此等候上车，见外流人员手中拿着菜刀，立即端起冲锋枪将这一外流人员击毙。事后政法机关为此发出简报，通报全省，要求劝阻工作不要激化矛盾，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1960 年冬,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受到批判。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到山东主持处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对批判不服，称自己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自己承担"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想不通。但又说对不起山东人民，在批判大会上，鞠躬向全省人民表示谢罪。在对其批判中，有些地、市干部揭露了大批饿死人，以及人吃人的问题。曾因向主要负责人汇报人吃人事件遭到冷落的省检察长陈雷，也壮起了胆子揭露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人吃人事件时遭到的非难。

批判省委负责人会议的最后阶段，曾希圣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破坏耕作制度"、"大刮五风"、"大批饿死人"等严重错误，还特别提到："据初步发现，全省人吃人事件七十余起。"曾的《总结报告》书面材料发至全省各县委及省委派出的工作组。省委驻金乡县工作组长刘若克(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读了曾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提到人吃人的问题时，引起了他对金乡县是否发生过人吃人事件的注意，为此派工作组员肖锡宜到金乡县胡集公社胡集大队调查摸底。胡集大队十五个生产队，有两千多人。经座谈会调查与个别访问，1959 年冬到 1960 年冬，全大队发生人吃人事件九起，支部书记四岁男孩饿死煮熟后，全家吃了一天。这九起人吃人事件，直至曾希圣总结报告时未能发现。

三年严重灾害期间，山东各地都曾发生人吃人的事件，虽然缺少全省的统计，但远不是曾希圣报告中所提到的七十余起。1961 年春，笔者参与省政法工作组检查莱阳县检察院批捕、起诉质量时，阅卷中，发现二起卖人肉案件，二起作案人均是复员军人。审讯中一作案人供称："二年内盗挖饿死后新埋上的尸体十多次。一具尸体能割十几斤肉。最初，因全家饿的快要死，吃了几次人肉没饿死。往后盗了尸体煮熟推到大集上当牛肉卖，每斤五元，都抢着买。"另一作案人供："二年内盗尸煮了当牛肉卖，共有七、八次。卖人肉的还有几个人，他们盗尸体卖比我多。"这两名罪犯各判徒刑四年。

据莱阳县检察院介绍：1959、1960 这两年，全县盗挖尸体案件时有发生。已破获七、八起，还有五、六起未破。有的盗尸体吃了自己死亡了，还有的死亡在盗尸现场。莱阳县城相公社(城关公社)两位五十多岁的男社员，他们是邻居,白天他们二人还病恹恹地坐在门口石台上说话，都说自己不行了。到了夜间死了一位。当夜其亲属将死者埋到莱阳城东南一里远的丘陵上。活着那位邻居饥饿难忍，在这天的下半夜，背上筐，带着铁锨和菜刀奔向城东南丘陵，掘开邻居的土坟，割下死者两条腿装进筐里。在背着人腿返回时，摔在梯田下死亡。天亮后被过路行人发现，报告了城关派出所，经民警检验认为：盗尸人严重水肿，身体极其虚弱，加之偷尸劳累、恐惧，跌撞而死。通知了盗尸者亲属及被盗尸体亲属各自作了掩埋。

人民用生命写下的历史是无法抹掉的。

(作者 1942 年参加抗日，1990 年离休。"文革"前和检察机关重建后，任检察员 38 年。"文革"中停止检察业务。本文刊于《炎黄春秋》2010 年第七期。)

—— 原载 炎黄春秋
Monday, August 23,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饥荒中的昌乐县委书记王永成

马钟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 1959 年至 1961 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 1700 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 3471 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 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3250 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二）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 1959 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

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一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可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颗，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二百多颗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 18 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贡献。

昌乐在大饥荒年代，通过红薯、南瓜大丰收，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 1960 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

（三）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以“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增产粮食救灾渡荒。他认为：第一，农民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农民能够认识自身利益，也能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努力；第三，农民最懂得应该怎样种地，有能力种好自家的土地。

于是，王永成在增产粮食、保证多收的目标下，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农民意愿的作法：

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在那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认真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农民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 20 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 20 户。

第三是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 5%至 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 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第四是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

第五是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

第六是鼓励工作上的积极创新和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王永成还身先士卒带头探索，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 年天旱，为了保证种麦质量，王永成在找干部商议后发明出了一个“水耧”，既节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错；为了提高植树绿化的效果，他还搞了个“绿畦”，改变原来栽柳树的传统作法，先把柳树条养在畦里边，等它生根成活以后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损坏原有的柳树。

昌乐县在这场三年大饥荒当中，不仅全县没有饿死人，粮食还获得了丰收，除了完成统购统销向国家卖粮的任务外，昌潍地委还多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昌乐县先后五次向地区增加统购粮。

1962 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受到了冲击，有不少地方被强行解散了。王永成他们却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相邻各县的鲜明对照：一边是昌乐县的有买有卖人气十足高高兴兴，另一边是相邻县的物资贫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于是人们反映说：“一个地区，两种景象”。

（四）

1964 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以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名义调来北京。陈少敏就是

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多次在大小会上提起的深受人们敬佩的那位刚正不阿的大姐，就是“文革”中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不举手、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不认可“文革”倒行逆施行径的那位中央委员。

王永成来京后，不久带队去参加“四清”运动，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文革中，他到五七干校参加过劳动，之后被调到北京大学设在陕西南部大山地区的汉中分校。在汉中分校他仍然是关心群众、保护百姓，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一次次保护教职工和学生免受四人帮的种种迫害，支持学校各种教学科研活动，调出陈佳洱等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走上教学科研领导岗位。

1978 年冬，全国总工会恢复工作时王永成调回全总，担任全总机关党委书记和全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当时党委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全总那几年平反的各种案件（人）约 1000 余起，其中仅改正错定的“右派”就有 91 人，数量之多、难度之大、受害同志的安置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永成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更是一位朴实无华心里装着平民百姓的实在人，离休后还是有求必应，常常忙着给人们题诗写字，忙着他那部名为《绿化之计》的组诗。2006 年春节后不久，王永成因病入院住在一个单人间。不久医院收了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需要一个单人间护理，但这时缺少单人间。王永成听说后主动提出给老人家让出单人间，经病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让房的美谈传出后，更增加了人们对王永成这位已逾八十高龄老人的敬佩之情。

三年大饥荒至今快有半个世纪了，昌乐百姓心里始终想念着当年同他们一起渡荒救灾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附：王永成诗作两首

种南瓜

设计度荒风，以瓜代谷粮。
明前先育种，入夏现花黄。
秋禾方齐藤，早瓜已硕长。
甘醇适口感，堪好充饥肠。
南社销青市，北区卖远乡。
虽云有所获，细论犹惶惶。

昌乐县六一年生产救灾记事

受命营陵负重任，救灾生产克时艰。
寒冰未解理瓜畦，飞雪护秧保大田。
作业推行责任制，自谋建设小家园。
购销不失民为本，天道酬勤喜过关。

大饥荒中的昌乐县委书记王永成

马钟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 1959 年至 1961 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 1700 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 3471 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 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3250 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二）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 1959 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

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一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可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颗，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二百多颗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 18 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贡献。

昌乐在大饥荒年代，通过红薯、南瓜大丰收，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 1960 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

（三）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以“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增产粮食救灾渡荒。他认为：第一，农民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农民能够认识自身利益，也能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努力；第三，农民最懂得应该怎样种地，有能力种好自家的土地。

于是，王永成在增产粮食、保证多收的目标下，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农民意愿的作法：

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在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

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认真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农民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 20 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 20 户。

第三是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 5%至 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 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第四是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

第五是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

第六是鼓励工作上的积极创新和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王永成还身先士卒带头探索，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 年天旱，为了保证种麦质量，王永成在找干部商议后发明出了一个“水耧”，既节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错；为了提高植树绿化的效果，他还搞了个“绿畦”，改变原来栽柳树的传统作法，先把柳树条养在畦里边，等它生根成活以后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损坏原有的柳树。

昌乐县在这场三年大饥荒当中，不仅全县没有饿死人，粮食还获得了丰收，除了完成统购统销向国家卖粮的任务外，昌潍地委还多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昌乐县先后五次向地区增加统购粮。

1962 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受到了冲击，有不少地方被强行解散了。王永成他们却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相邻各县的鲜明对照：一边是昌乐县的有买有卖人气十足高高兴兴，另一边是相邻县的物资贫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于是人们反映说：“一个地区，两种景象”。

（四）

1964 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以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名义调来北京。陈少敏就是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多次在大小会上提起的深受人们敬佩的那位刚正不阿的大姐，就是“文

革”中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不举手、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不认可“文革”倒行逆施行径的那位中央委员。

王永成来京后，不久带队去参加“四清”运动，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文革中，他到五七干校参加过劳动，之后被调到北京大学设在陕西南部大山地区的汉中分校。在汉中分校他仍然是关心群众、保护百姓，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一次次保护教职工和学生免受四人帮的种种迫害，支持学校各种教学科研活动，调出陈佳洱等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走上教学科研领导岗位。

1978 年冬，全国总工会恢复工作时王永成调回全总，担任全总机关党委书记和全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当时党委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全总那几年平反的各种案件（人）约 1000 余起，其中仅改正错定的“右派”就有 91 人，数量之多、难度之大、受害同志的安置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永成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更是一位朴实无华心里装着平民百姓的实在人，离休后还是有求必应，常常忙着给人们题诗写字，忙着他那部名为《绿化之计》的组诗。2006 年春节后不久，王永成因病入院住在一个单人间。不久医院收了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需要一个单人间护理，但这时缺少单人间。王永成听说后主动提出给老人家让出单人间，经病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让房的美谈传出后，更增加了人们对王永成这位已逾八十高龄老人的敬佩之情。

三年大饥荒至今快有半个世纪了，昌乐百姓心里始终想念着当年同他们一起渡荒救灾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附：王永成诗作两首

种南瓜

设计度荒风，以瓜代谷粮。
明前先育种，入夏现花黄。
秋禾方齐藤，早瓜已硕长。
甘醇适口感，堪好充饥肠。
南社销青市，北区卖远乡。
虽云有所获，细论犹惶惶。

昌乐县六一年生产救灾记事

受命营陵负重任，救灾生产克时艰。
寒冰未解理瓜畦，飞雪护秧保大田。
作业推行责任制，自谋建设小家园。
购销不失民为本，天道酬勤喜过关。

读者推荐　　转载请注明出处

Tuesday, August 24,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新中国首例开仓放粮

陈官煊

中国的各个县，都建有「国家粮库」，顾名思义，粮库是属於国家的，县级政府只有看护的义务，并无丝毫动用的权力。

这些上面都有明文规定，如有违反，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但当党的纪律和群眾发生尖锐矛盾的时候，竟然有人不怕死罪，创下新中国首例「开仓放粮」，这个胆大包天的人名叫纪俊仪，开仓放粮时他担任重庆市长寿县县委书记。

一九六〇年农历腊月二十一，春节即将来临，但在重庆以东七十六公里紧傍长江的川东產粮大县长寿县，却没有半点节日的喜庆，相反地，全县竟都笼罩在一片饥饿与恐怖之中。

县公安局李副局长向县委书记纪俊仪匯报后，只短短几天，渡舟区已饿死了五百多人。

纪俊仪立即驱车赶到渡舟区，刚过一天，饿死的人已上升至七百多，死因完全相同：水肿病，且多是老人和青壮年男人。

人长时期飢饿，四肢便会肿胀，表示臟器已经衰竭。日渐衰弱而又没有粮食的飢民，把树叶、观音土、穀糠统统用来裹腹，虽然想尽千方百计来填饱肚子，但还是没法遏止水肿病的蔓延。

纪俊仪看了渡舟区饿死人的现场后，他意识到饿死人的事态不会仅限於渡舟区。於是，他组织干部到其他公社调查到腊月二十七。

全县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出来了，全县十个公社每公社都和渡舟区差不多，饿死少的几百人，多的近千人。

长寿县是一个產粮大县，国务院还为此颁发过奖状。一九五八年冬，全国掀起大办钢铁的热潮，长寿县组织了十多万人的劳动力上山砍树、挖矿石大炼钢铁。

对於五十万人口的长寿县来说，这十多万劳动力相当於全县的全部劳动力。能劳动的人都上山炼钢铁去了，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地裡的庄稼没人种，成熟了的没人收，致使全县的粮食產量减少一半，至此，饥荒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来重庆搞调查，纪俊仪当场匯报了长寿县缺粮的有关情况。

李井泉和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副书记辛易之，当时决定调拨四〇〇〇〇万斤救济粮支援长寿，同时确定集体食堂每天保人均四两粮。

长寿县因缺粮出现的水肿病越来越严重了，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因为上级的四〇〇〇〇万斤救济粮一粒也没兑现。

纪俊仪到重庆找到副书记辛易之，辛易之要他直接找省长李大章，李大章在电话裡说：「这件事是李（井泉）书记定的，你们市裡看著办吧！」

很久以后纪俊仪才知道，省上确实给了长寿四〇〇〇〇万斤粮，但中途被市裡扣了二〇〇〇〇万斤，另外四〇〇〇〇万斤迟迟落实不下来。迟迟落实不了的后果是：长寿县平添了上万座新坟。

到了腊月二十九（这一年腊月小，二十九即为大年三十），本该是吃团年饭的，但长寿到处都是「饿死鬼」。

纪俊仪见状，立即驱车到重庆找到副书记辛易之，他含著眼泪说：「我们不能守著粮食让群眾饿死。千刀万剐我来担当，开仓放粮吧！」辛书记没办法，答应第二天（正月初一）到长寿去现场察看。

正月初一那天，纪俊仪带著辛易之下乡察访。有一家刚饿死一家三口，乡道两旁到处都是新叠的坟墓。

辛书记说，不看了。他问纪俊仪：「你说怎麼办？」纪俊仪恳切地说：「开仓放粮，救命要紧，杀头就杀我的头。」辛易之说：「这是大事，我作不了决定，回到市裡研究了再通知你。」

一九六〇年农历正月初二，辛易之在电话裡告诉纪俊仪：「市裡同意，每人每天半斤标準。」纪俊仪立即召开县委紧急集会，并通知各个公社务必让全县人民一个不漏的在当晚之前吃上粮食。

这一年，长寿县一共动用了国库粮食四七〇〇〇万斤。纪俊仪没被杀头。

—— 原载 世界日报
Monday, August 30,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学者：大饥荒至少死四千五百万人

据《南华早报》 报道，在香港大学讲学的伦敦大学教授弗兰克-迪科特在他的一本新书中说，中国 1958 年至 1962 年大跃进期间，至少四千五百万中国人死于饥荒。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弗兰克-迪科特在他的新书中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偏听偏信荒唐的生产指标；加上当时无人敢于向他的错误挑战，结果导致农村饿殍遍野的惨况。而毛泽东稍后又固执地要以食品偿还所欠苏联的债务，使得饥荒更加恶化。

美国三一学院教授、中国农业问题学者文贯中表示，有关中国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有几种颇有出入的数据：

“因为大跃进饥荒到底具体死了多少人？一般的估计有底的大概一千多万人. 这个大概比较接近国内半官方的一些数字。我记得杨尚昆在有关谈话当中就承认至少死了一千多万人，比较高的数字大概是四千多万人。我记得陈毅有类似的数字大概是四千五百万人。我和我的合作者也在几个地方发表了论文，我们一般不具体说死了多少人，但是我们自己采用了一个数字是三千多万人，这是美国的一个很严肃的社会学家，也是搞人口的一个人口学家，那么, 经过他的推算。”

文教授说，有关大饥荒的造成，他同意前中国领导人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估：

“大跃进造成各方面的损失在哪儿？ 包括农民生命的损失，这个教训我觉得是比较大的。刘少奇当年的评论认为这是只有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这个评价我觉得基本上是比较正确的。当然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如果中国当时不是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又是在意识形态上不是极为激进的这么一种左倾的思潮，本来就不会发生这场大饥荒。”

这位学者说，大跃进期间所犯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以办大食堂的形式强迫对农民口粮实行集体化：

“在人祸方面我们发现当时实际上是搞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把农民的口粮强迫集体化的一个极为错误的一个政策。它是怎么样做的呢？就是它在五八年秋收之前，在全国强迫成立了人民公社，然后在公社成立之后，各地又成立了所谓大食堂。很多地方把各个社员自己家里面的厨房都砸掉了。当然等到五九年的春天的时候呢，春荒普遍的发生了。这是有记录的，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这个人是从来不认输的，他本来还想等一等夏粮，就五九年的夏粮如果好的话，他可以继续落实这些所有这些问题。但是五九年六月份的时候，他已经得到各地的秘密报告。他已经知道全国的夏粮收成不好。所以他决定要开庐山会议，把彭德怀贬职，把他打下去。庐山会议就把公社食堂一五一实把它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又要全国一定要搞食堂，所以在五九年夏粮欠收的情况下，全国又被迫地搞起公社食堂。”

文教授说，导致大饥荒的根子在于：毛泽东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剥夺了他们的自由：

“我想归纳一下，就是说不管什么生产组织或者消费组织尊重农民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违反农民的意愿，在公社食堂这个形式下，一开始名义上说起来是农民也是愿意进入的，但是一个自愿的组织一定要保持进退自由。而公社食堂里至少是违反了退的自由这个原则。”

《南华早报》援引迪科特的话说，在过去四、五年中，中国当局对相关档案的开放程度，使得有关大饥荒的严肃的研究工作成为可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 原载 自由亚洲电台
Monday, September 06,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饥饿的母亲

依娃

「感谢上苍！从飢饿的 1960 年挣扎活过来的母亲没有把我生成一个弱智儿，或者不健康的孩子。」

当我年逾不惑，知道了更多母亲从前的故事，常常不寒而慄同时又万分庆幸；惊惧於我这偶然来到人世的生命孕育於一个极端飢饿的子宫，安慰於我四肢健全，头脑不算聪明，但还正常，能识数认字。

从小到大，每当同学朋友介绍起自己的母亲是医生、教师、职员，哪怕是卖菜的做饭的看孩子的，都叫我难以啟齿说出母亲的真实身分，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叫化子，1960 年从甘肃秦安逃荒要饭两年多，最后落户在关中一代。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母亲是要饭的。那时的中华大地，要饭也是一种职业，数以千万，多是种植粮食的农人。

「六〇年，没啥吃，把人饿得路都走不动，碗都端不住，悽慌得很。」

过去五十年了，家裡粮食打得多得吃不完了，母亲还是这麽说。这几句话自我有记忆时就听她絮叨了无数次了，只是那时候并没有兴趣听，更没有兴趣多问。上小学中学时，教科书上

也常提到六〇年，反覆强调是「三年自然灾害」。我这天真的脖子上繫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想，既然是自然灾害就是天命不可违抗，就像打雷和下雨，就是老师就是大人谁敢怀疑敢说是人的错？那是要被当现行反革命枪毙的。学校裡马路上的大喇叭裡天天都高歌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共產党，像太阳，照到哪裡哪裡亮。」每当我跟著唱〈东方红〉的时候都禁不住地心潮澎湃神圣无比，即是需要营养的小肚子天天用白菜土豆填得半飢不饱，也幸福得如花儿一样，因为地球那边美国的孩子在做童工，台湾的孩子在吃香蕉皮，还没有太阳晒。我想「暗无天日」的意思就是没有太阳。

「地裡不打粮食吗？」

这些年回家，我总是找机会追问母亲。外婆已经去世了，带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家族往事。我抱著义不容辞的使命感欲抢救活著的歷史。做为女儿，应该知道母亲的过去，这个家的渊源。

「打哩，咋不打？那时候又不用化肥，一亩地打不下三、四百斤麦。人家非要说你一亩能打下上千斤，县裡公社都派人来收麦哩。不给还抢呢，打人哩。人家是政府嘛。我村裡两家子，粮食一拉走，夜裡就上吊了，父子俩齐齐掉在房梁上，看著害怕得很，人那脸都黑了。农民嘛，没啥吃，就害怕了。」母亲没有激动没有愤慨，因为那时候这样的事情见多了，过一阵子就有人上吊、跳井、喝农药。一个女人去磨麵，一袋子麵被人偷去了，女人害怕回来没法交代，就跳井了。

「那就白死了？」

「乡下嘛，谁管哩。是你自己寻死哩，又不是政府把绳子繫到你的脖子上，没人叫你死。」母亲的意思是，政府只是拉走了粮食，并没有给你绳子让你去上吊，用牵牲口綑粮食的绳子上吊是你自己想不开，性情太烈了。母亲认为人都是有命的，有些人天生命不好。

「妈，你识字吗？」六岁时在村上庙裡的小学开始读书，我这样问母亲。

「识哩，谁还不识字？」

「那这是什麼字？你唸。」

「到一边写字去，妈忙著呢。」母亲臊得脸都红了，低下头忙手裡的针线。她从来也没有拿起过我的课本，更是没有唸过一页半句。只是安静地看著趴在石桌上写字的我，眼睛裡溢出羡慕，像没钱的人看著人数钱。

「妈，你到底识不识字？」

去年回家，我又不依不饶地追问母亲，因为她从不看我写的东西，这让我多少有点失望。

「识几个，能识几个。」母亲坚持说，能识几个也是识，不能说是文盲。我终於悄悄地发现，母亲说的几个字就是「1234」。她到镇上买东西，手裡攥著一张纸，说年纪大了，记性差了。

上面歪歪扭扭画著「3、2、10」，意思是三斤盐、两斤花椒、十尺被单布。

我不忍心戳破母亲那一点点自尊，不再多问。就让母亲以为我以为她是识字的吧，因为母亲认为如果我知道了她大字不识，会看不起她是个睁眼瞎。就让一生贫困艰难体弱老迈的母亲觉得在我这个女儿眼裡，她是一个多少有点文化的人吧。我只是不能相信，生於 1944 年的母亲，没有裹过小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后的 1949 年，正是背书包上学的年龄，却从来没有上过学识过字，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饭都吃不饱，谁还让你念书呢？」尤其是山区的乡村，尤其是个女娃子。

「妈，你是哪一年跑出来的？」

我从小就知道母亲是甘肃秦安人，1960 年飢荒年跑出来活命的，却不知详情。

「那几年，怕怕得很，人死了都没人埋，拿啥埋哩？一张蓆子都没有。人饿都饿死了，没啥吃，粮食留得少得很嘛，树皮、野菜、玉米芯都吃哩。为一个饃都能杀人，我附近村子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走著走著就栽过去了，没气了，和闹鸡瘟样的。死娃娃都有人煮著吃呢，人饿慌了。你婆眼看没办法了，领上我和你舅，半夜跑的，怕叫人逮住了。公社不叫出来，怕县上开会斗人哩，说给政府抹黑哩。肚子饿得熬不住，人没饿过，不知道那受罪，叫你吃泡屎就给你吃饭，都有人抢著吃呢。人肚子饿了，啥都顾不上了，还有啥体面？」

听母亲这麼回忆的时候，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个头矮小，梳著纂儿，有著一双粽子样小脚的四十出头的外婆，挽著包裹著几件衣裳的包袱，领著十七、八岁面黄肌瘦细如竹竿的母亲，十多岁成天吃不饱只会喊叫「饿、饿」的舅舅，先求人坐上牛车赶到县城，在熙攘拥挤的人群中混上火车，也许那是他们第一次坐火车。母亲说那时火车上查票鬆，一火车十个人有八个人都是出门要饭的，许多年轻的男人，地也不种了，说种了也还是没啥吃。外婆夜裡也不敢打会儿盹，唯恐包袱裡几个黑石头样的饃叫人偷去。一对骯脏的儿女依靠在她单薄的肩头上昏昏沉睡，车窗外的星光给她一丝希望。

想到一个大字不识身无分文的小脚女人，千里迢迢走路爬车风裡泥裡带著两个孩子走乡串户乞讨要饭，让卑贱如蚁的性命得以苟延残喘，我对那个名字叫刘梅花的外婆產生出英雄般的崇敬，谁说炸碉堡堵机关枪的才是真英雄？不从那个山旮旯裡逃出来，就会活活饿死，几条命都会饿死。没有母亲了，也就没有我了。

我婆就你和舅两个娃呀？」我是明知故问，从小到大，我知道母亲就舅舅一个亲兄弟，住在我们家不远的北耕村，个头又瘦又小，比两个铁桶罍起来高不了多少，还患有胃病贫血。外婆总是说：「你舅这个病殃殃，都是小时候给饿的，娃就没有吃过个饱饭，饿成那鬼式子了。」我这一米六出头些的外甥女站在舅舅面前像个巨人。

「你婆生养了五个哩。」

「五个？我都不知道。」

「没给你说过，娃都没成嘛。我是老大，下面一个兄弟，吃了人家打了药的水果，闹死了，娃饿慌了，吃得太多了，发现的时候都没气了，你婆哭的。还有一个妹子到人家地裡偷玉米

去了，叫人家给打死了，头都打成玉米花了，那人叫政府给法办了，娃就想给屋裡偷些玉米棒把命送了。你舅上面的兄弟没到关中就得了病了，烧得和炭一样，眼看著娃闭眼睛，人穷没办法。我和你婆把娃埋了，现在连坟都没有了，找不到了……那几年，人可怜得很，难养娃。」

躺在老屋土炕上，我整夜整夜地不能入眠。总是看见那几个飢饿的孩子、我两个舅舅一个小姨的面孔，他们总是望著我，瞪著眼睛，不说话。我到四十多岁了才知道，我还有他们这些本该活在人间的亲戚，他们在八岁、十一岁、十四岁的时候就夭折了，「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滋润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下。」其实，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是谁，就知道是当今北京城裡的皇帝，想干什麽就干什麽，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会活万万岁。凝望这三个飢饿、恐慌、病弱的面孔，我一阵阵心酸，眼泪一股股流到枕上，悲伤不已。被毒死打死病死的孩子，他们是我这一生无缘见面的亲人。既是他们早入阴间化为鬼魂，他们也是我的亲人，我想念他们。如果有一天见面，他们会对我说什麽？

「咱是要饭的嘛，有啥条件呢？」

蓬头垢面困倦疲乏的母亲逃荒要饭到我出生的那个叫富平县流曲镇的村子，就再也不走了，因为她被人收留下来。那个村子裡刚好有一个二十四、五的穷得讨不到媳妇的小伙子，父亲去世了，母亲领著两个弟妹嫁人了。热心的婶子嫂子们一说捏，母亲就成了这个小伙子不用花一分钱娶回家的婆娘。虽然她瘦弱得像块木板，虽然她脸黄得没有人色，头髮焦燥如麦秸草一般。可她是个女人，女人就能做饭纳鞋能生养娃。

「我都快二十了，身上那个还没有来。没啥吃，人不好好发育，就像地裡不上肥，庄稼就不好好地长。把你婆吓的，怕我生不成娃了，没人要了。」母亲一脸皱褶笑话著自己当年的发育不正常的身体，我却吃惊得睁大眼睛，难以置信飢饿能阻止一个女子生理现象的自然来临。我自己是十二岁来的，有的同学十岁十一岁就来了，很少有女孩推迟到十六、七岁。母亲补充说：「胸前平平的，啥都没有。那时候傻，啥都不懂。」

我彷彿看见 1963 年的母亲，她十九岁了，可看上去就如十二、三的女娃子，一点也不见青春女子的风华秀美水灵妩媚。逃荒的路上，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在没人处脱去补丁的衣衫光著身子歇凉。我能看见她乾瘪平坦的一对乳房，只不过是两片长出乳头的乾皮而已。可这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中被逼迫流浪乞讨的一个年轻女子的乳房，就是八亿人疯狂地叫喊著「拯救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英明统治下的乳房，三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沉溺在飢饿深渊中的乳房。

「我结婚三年了，才怀上你。你大（父亲）还怕我生不了呢。背后都被人笑话死了，说这一门子没后人了。」母亲为自己的肚皮争气得意著，却从浑浊的眼睛裡流出辛酸难过的老泪来，用衣襟不住地沾著揩著。真不可想像，父亲同样劳作终日不得饱食的精子，怎麽顽强地在母亲贫瘠荒芜的子宫裡安营扎寨，怎麽不可思议地倔强生长，孕育成一个胚胎，以长年累月的红薯玉米苜蓿野菜榆钱酸菜让这个小东西长全眉眼五官、手足器官和大脑小脑，长成一个不是他们所期盼的女娃子。

「为了攒粮给我坐月子，你大大半年都没有沾过一点儿麦麵。一年一个人分二百多斤麦，咋够吃哩？又是下苦的人。捨不得捨不得，要攒下给我坐月子呢，怕我身体不好，下不来奶，

那时候又没有牛奶奶粉。大人没奶咋餵娃哩？」

想到如一隻刚生出来的耗子般弱小婴儿时的我，在母亲的怀抱裡，吸啖著自然灾害还延续的瘦弱不堪的母亲的乳房，怀孕后生產后稍微隆起丰满些的乳房，酝酿出温热甜美浆白乳液的乳房，想到年轻的母亲殷切看著我用力吞嚥的眼神，感受著母亲本能的爱，我心疼如锥，眼睛顿时潮热。我怎麼来感激飢饿的母亲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孕育养育出我这凡俗却健康的生命？我再仔细回味，还能体会出那乳汁的香甜母亲的味道。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但那乳汁顽固地渗透在我的身体裡血液裡骨髓裡，依然滋养著我。让我记得，我曾和母亲一起飢饿、一起抗争了过来……。

到母亲生二妹的时候，因为体质虚弱，彻彻底底地没有奶水。除了从邻家那裡要来的一点儿羊奶，母亲总是在嘴裡嚼一块白麵饃，嚼黏了稀了，一点点餵给妹妹，用嘴对嘴地餵给妹妹。今天文明的人们，肯定会说太不卫生。但是一个没有奶水的贫穷母亲怎麼养育自己的孩子？她只能像屋簷下的燕子一样，啄来虫子，亲口餵给嗷嗷待哺的雏燕，把她养活养大。我猜，母亲也这样餵过我吧，忍受肚饿，把自己口中的粮食毫不犹豫地吐出给我，大嘴对著小嘴。这幅人间炼狱中的慈恩图让我泪水潸然……。

那天在西京繁华的大街上，路边有两个脏得没人捡的馒头，母亲不怕丢人赶紧捡起来，用手帕包上放进袋子裡，心疼了一路。「脏了，人不能吃了，还能拿回去餵个猪。现在这些娃，糟蹋粮食，是没饿过。六〇年就是想吃也吃不上。」1960 年是母亲一生的烙记。

「要饭是甘肃人的习惯。」当时的混蛋省长这麼解释，甘肃是名列前茅的饿死人最多的省分。五十年了，伟大领袖的画像还是释迦牟尼佛像一般地供在天安门城楼上，没有人敢追究那个饿死至少三千万人的 1960 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但相信苍天有眼，有一日终会公昭天下。

—— 原载 世界日报

Monday, September 20,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武汉截粮事件

杨凯

1959 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和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各地都面临着粮食短缺问题，为确保首都北京和全国各重要城市的粮食供应，从中央到地方都召开了粮食问题紧急会议，对此问题高度重视，但是就在此时四川开往上海的运粮船在武汉被截，此事甚至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那么，此事的前因后果如何？武汉港的工作人员又有何胆量截运粮船呢？

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时期，正值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人们头脑发胀，各地不实事求是的虚报和浮夸之风盛行。1958 年的全民大炼钢使粮食丰而未收，再加上自然灾害，使得全社会物质匮乏，粮食短缺。

粮食短缺到什么程度呢，据统计数据，到 1960 年 6 月，北京库存粮食只够 7 天的销量，天津仅够 10 天，上海已无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度日，连一向为中国粮仓的东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

北京上海尚且如此，武汉的情况自然也好不到哪去。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武汉市内粮食库存最低时仅有 120 万公斤，人平不到 0．5 公斤，供应极端困难。中央及时从吉林、黑龙江、内蒙、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区调入 1．5 亿余公斤粮食，才使武汉渡过了难关。湖北省曾规定：从县到省，除特殊需要外，一律停止供应肉食。1959 年 4 月，武汉市将停止肉食供应的范围扩大到餐馆、合作食堂、点心铺。偶有供应，群众排队如长龙。[1]

为应对粮食危机，湖北省召开了粮食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湖北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武汉是中南地区的最大都市，近 300 万人口的粮食必须得到保证。会议决定从省内各县调粮，尤其是要从鄂北孝感地区和江汉平原这两个湖北产量大区调粮。为此，省委、省政府安排省粮食厅承担以鄂北随县和荆州洪湖为粮食主要汇集地的积粮任务。省交通厅承担粮食调运任务，确保武汉，支援北京和上海。但是下派到各县的任务都非同小可加上各县本身粮食也十分紧张，省粮食部门的集粮的任务艰巨可想而知。而交通运输问题也面临着更加困难的景况。当时湖北的铁路干线仅有京广线，省内物资运输全靠公路和水路。而当时的公路交通比较落后，从随县到武汉仅有坑坑洼洼的三级沙土路面的简易公路，而监利和洪湖到武汉还没有公路，只能走长江水路。于是，会议决定：在随县集并的粮食用汽车运达孝感花园车站装火车，再转运武汉和北京。在洪湖和监利各地集并的粮食，通过木船运送到两县的长江港口装大驳船再转运到武汉，部分将调运支援上海。

湖北省交通系统为此召开了多次会议，部署安排运力，除保证重点工业的生产运输，保证刚上马的丹江水库枢纽工程的物资资料运输，和各城市的日用生活物资的运输外，凡能抽调的车辆，全部都投入到这场粮食运输会战中。据时任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党委副书记的秦忠（时交通厅汪进先厅长已调湖北省丹江口水利枢纽工作，秦忠负责交通厅全盘工作）回忆：因为没有路，骡马车、汽车进不到地头，我们马上指挥各县，动员当地群众抢修、铺设临时的简易道路。车辆不足，我又找工程师商量，给交通厅下属的汽车修造厂下达任务，赶造拖斗车让汽车加挂。由于该厂没有充足的钢材，我建议拖车大架、桁梁、厢板全部采用木材。没有新轮胎，我让省厅汽车旧件厂翻新废旧轮胎顶替。没有弹簧钢板，我竟出馊主意提出用楠竹替代，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2]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又传来了国务院从武汉紧急调两天粮食北上，已经在江岸车站装车的消息，这就意味着武汉几百万市民面临着随时断粮的危险。情况万分紧急，为了加快筹粮速度，在接到消息的当天深夜，秦忠在老战友闵学胜（时任武汉军区参谋长）的陪同下一起找到了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从睡梦中被我吵醒的司令员与我也不生分，隔老远就大声嚷：‘秦忠，你搞么鬼呀？深更半夜不让人睡觉，吵死人的。’

‘陈司令，你吃不吃饭呀？’我也学着赵辛初书记的口气说道。

‘我又没病，哪能不吃饭呐？！’

‘可是，武汉人民快没有饭吃了，我是来求援的，你无论如何要帮忙啊！’我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

司令员听着听着就坐不住了，眉头紧皱，双手叉腰，来回在客厅里踱着步子。司令员的夫人张双群同志给我们送上切好的西瓜。大家手里拿着西瓜却顾不上吃，厅内一阵寂静。

司令员停下步子说：‘这事紧急，耽误不得，部队一定要支援你们。我看这样，先调部队支援，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

我一听有门，心中一阵狂喜。

陈司令员同闵参谋长商议着，说这事让闵参谋长直接办理。这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3]

军队的车辆有力的缓解了粮食运输紧张的局面，但是在当时的道路、运输工具条件下，仅靠这些运力还远不够按时完成调运武汉 300 万人口口粮和调运北京的任务。

恰在此时，省航运局传来消息，称有一个万吨的运粮船队，从重庆起航运粮开往上海，要求沿途航线通畅。《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记载，1958 年 11 月或 12 月，四川调往上海的粮食在武汉被湖北强行扣留。下令扣船的正是秦忠，此事非同小可。秦忠准备截留该船队的同时，又电话通知了各个方面，让荆州地委和行署敦促监利、洪湖各县加紧打粮，突击转运。同时又电告洪湖港区，粮食装运速度必须加快，船队沿途不准停歇，全速航行，限期到达武汉。

上海方面获知粮船被截的消息后，立即将此事状告到了国务院。

秦忠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这是省长的直通电话）响了起来，传来张体学省长的声音，他大声吼道：“秦忠，你好大的胆子，不请示不汇报就敢拦截上海的粮船？人家把状都告到了国务院，总理正在追问此事，你叫我怎么说？”

秦忠答道：“省长，要解武汉的燃眉之急，也要解北京之急，你让我怎么办啊？我先斩后奏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先借他的粮用用，洪湖的船队已经起航，正在途中，最多两天就能到武汉，粮食一到我马上就还人家。他们上海船队在长江上还要走好几天，加点速度不会耽误它的。”

张体学问道：“这可不是儿戏，要不得半点滑头，你敢肯定两天能凑齐还人家？”

“省长，军中无戏言，我说到做到，敢立军令状，保证还人家粮食!”

张省长口气平缓下来：“截都截了，那只有这样了啊！秦忠，你给我保证的啊，我这就回复国务院，给你兜着。这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你以后少给我惹祸。”[4]

在截留上海粮船的 29 小时后，洪湖的粮船终于抵达了武汉。湖北方面在武汉港与上海方面完成了交接工作。此事上海方面没有再追究，国务院也没有再追问。

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对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问题作了检讨。他说湖北这几年自以为是，“五风”俱全。1958 年大办钢铁，大办公社；1959 年大办水利，大搞治山、治土；1960 年夏季大搞开荒。这都表现了“左”倾蛮干。湖北在全国最先宣传“水稻亩产 36000 多斤”，“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王任重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当时我们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湖北 1958 年的粮食产量只有 197 亿斤，却向中央报了 450 亿斤，因为多报了粮数，多上缴，致使形势恶化，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庐山会议后继续恶化，人死得更多。王任重的检讨，很大程度上是就粮食问题而作的。[5]

从王任重的检讨中可以看出当时武汉的粮食缺乏是非常严重的，秦忠的做法虽然有违规定，但是在特殊时期的非常之举，却有力缓解了武汉粮食短缺的燃眉之急，从这点上来讲，秦忠对武汉人民做了件好事。

[1] 引自香港中文大学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转引自高华：《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2 年 8 月号总第 72 期。
[2] 秦忠（口述），秦亚平（整理）：《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积粮运粮会战》，《武汉文史资料》2009 年第 8 期。
[3] 秦忠（口述），秦亚平（整理）：《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积粮运粮会战》，《武汉文史资料》2009 年第 8 期。
[4] 秦忠（口述），秦亚平（整理）：《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积粮运粮会战》，《武汉文史资料》2009 年第 8 期。
[5] 唐正芒：《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党史博览》2007 年第 12 期。

—— 原载 炎黄春秋刊外稿
Saturday, September 25,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谁制造了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

林辉
不久前，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上个世纪大饥荒的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将人们的目光再次引向了那悲惨的时代。

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这场灾难，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一直是个谜。二十多年前，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咨根据赵紫阳的指示，做过一次调查统计，结果是大跃进期间饿死、打死、病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500万。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另据香港《争鸣》杂志2005年11月报导，在中共内部解密文件中透露：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合计全国饿死3,755.8万多人！具体数据如下：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万多人。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而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2.4%；1960年为负4.7%，1961年为负5.2%；1962年为负3.8%。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字只是部份地区的统计数字！

2007年，海外学者丁抒先生在《阳谋》一书中，指出大跃进一共造成了3,500万人到4,000万人被饿死的严重后果。

2009年底，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首度提到当年大饥荒时饿死了4、5千万人。2010年初，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公开讲座中称，根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了3,000万到3,200万的死亡人数。

而在冯客的这本专著中，他也提出了4,500万的大饥荒饿死人数。据悉，这个数字是建立在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为此，冯客和助手曾花了6个月的时间查阅了包括省、市、县和外交部在内的二十多个档案馆的内部资料，并采访了许多受害者。在调查中，冯客发现，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远远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而如果依据根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的数字，3,000万加50%就是4,500万。

从不同的渠道判断，死于三年大饥荒的人数是4,000万上下。导致这么一个骇人听闻、令很多中国人难以置信的人数被饿死，难道真如中共在教科书、中央文件上所言是由于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

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根据国家气象局当年的统计资料，那三年属于正常年景，虽有自然灾害，但属于正常范围，而且生长季对于作物增长的影响也没有偏离平均指标。因而说“自然

灾害”原因造成的大饥荒纯属谎言。

那么，是苏联逼债？答案也是否定的。苏联 1959 年撕毁了合同，但撕毁的是只是原子弹方面的合同，跟农业无关。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 600 个合同，撤走在华专家 1390 名，但撕毁合同是在 1960 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这说明大饥荒和苏联是没有关系的。

而实际上苏联并没有逼债，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要提前还债。周恩来在 1964 年的报告中说："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这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而且还可以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据记载，当年曾从加拿大进口一船粮食，已经运到太平洋了，中共中央一个命令，就改变航向，调头驶向了阿尔巴尼亚，而当时的中国人还在挨饿。

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冯客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体制的原因。"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

二是毛泽东的责任。"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只是为了赶上英国，结果失败，也是他结束的。饿死那么多人，他不是不知道，他收到很多报告，还派秘书下去调查，但他不怕死人。""（中共）二、三、四……号人物也都有责任。但是到 1960 年大规模死人后，刘少奇开始怀疑了。到 1961 年刘开始在党内说'人祸'"。"文革打倒刘少奇与大饥荒有直接关系。不了解大跃进就不能理解文革。"

读者推荐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October 20,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亲历 1960 年的饥饿

孙正荃

前言：五十年后的今天再来讲 1960 年的饥饿以及死亡，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或许会以为那一定只是个故事。不，作为省报的一个记者，我亲历了那段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历史，我有责任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包括其中的虚伪和作假），为历史提供比官书更真实更具体的一个文本，因为对饿死三四千万无辜百姓这桩我们民族历史上没有过的滔天罪恶，至今依然羞羞答答，依然没有认真的反思，更谈不上问责，所以一点也不能认为

我的记录已经是一种多余。为了表示我对历史的尊重，哪怕在细节上都不加任何修饰，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名真姓。《炎黄春秋》2009 年第 10 期上发表了原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尹曙生写的一篇文章，也为本文的真实性再次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文章说，1960 年省公安厅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 300 多起。”

1959 年的三月，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愿报名到了青海，被分配至青海日报社。那时候我还不满 22 岁，尽管那里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物资供应同我原来所在的北京也不能相比，可我并没有丝毫受苦的感觉，脑海里装满的惟有“事业”二字。记得四月报到，六月便到“万里黄河第一城”尖扎县去采访了，在那个遥远的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城，我第一次骑马，第一次坐着羊皮筏子在滔滔黄河里颠簸，第一次在人民公社食堂吃饭，第一次走进藏族同胞的帐房，第一次看到从县委书记到生产队长如何带领公社社员“大开荒地，大办农业”，如何在整片整片的林地、牧场上插上“高产田”“丰产方”的字牌，那是一个字足有两米见方的大木牌……那时的我，整个身心都浸沉在年轻人都会有的那种新鲜和兴奋的愉悦之中，青春的激情在体内勃发，我没日没夜地采访写稿，几乎每天都有稿件发往报社，在我心里，真是感到生活多么灿烂，工作多么美丽，“形势一片大好”!

可是没有一年光景，情况就开始大变，每月每人二两油半斤肉和几两豆制品都需要排队才能买到，其他副食品，比如糖果糕点之类，在市场上已经绝迹，抽烟也到了“零吸”至“一毛一口”的闻所未闻的地步（注：一支质量低劣的烟，供烟民们轮流吸，每人一口，每口一角人民币）；最严重的是每月的粮食定量开始大幅度减少（注：从 28 斤减至 22 斤，再节约一斤“支援”灾民，实际为 21 斤，后来又减至不足 20 斤，面粉从“85 粉”到“88 粉”，以至“95 粉”）于是，什么“小球藻”“代食品”“增量法”………不知是谁发明的旨在解决肚子问题的种种新鲜奇特怪异的东西就象“灵丹妙方”一样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迅速传布推广，我所在的单位自然也不例外。记得 1960 年的某一天，省委机关食堂（报社也在此就餐）贴出一张布告，说是“根据领导指示，从七月一日起（这日子纯属巧合，绝非本人有意编撰，所以记忆犹深），粮食定量吃饭不定量”。所有的人都既纳闷又好奇，中枢神经甚至有点兴奋。这是谁发明的呀？谁这么有智慧有才干呀？许多肚子里早已没有一点油水的善良百姓都这样想这样盼：毕竟，从此以后，不至于每次吃完饭肚子依然觉得空空，也不至于一个月的饭票十天就吃得精光。

终于等到了那伟大的七月一日。一大早，食堂门口就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等待开门的人群，谈话的唯一主题就是马上要到嘴边的这顿早饭究竟会是怎么个模样？大门一开，人流便似潮水般涌了进去。恐怕连黑色幽默的大家也未必能想象到这“放开肚皮吃饭”的精彩和滑稽：只见大堂里餐桌旁放着一个个大缸，缸里是切碎的卷心菜青皮和极少杂面煮就的“稀糊”——其实和清汤没有多少区别。不过省委的小“公仆”（干部则另开中灶和小灶）和报社的记者编辑们仍是高兴非凡，有人这一餐竟然灌了三大盆：几乎比一洗脸盆还要多！（后来才懂得，这样下去就出现了大量的浮肿和其它疾病，有的因此而丢了小命。）

就在这个时候，我先后碰上了两件事，至今刻骨铭心：一是“吃包子”，二是“吃人肉”。两件事相隔也就不到一年的光景。

先说吃包子。

大约是 1960 年的头上，我跟随省委主管农业的陈思恭副书记下乡“调查研究”。是在湟中县

的一个山村。湟中县是闻名于世的黄教诞生地。金碧辉煌的塔尔寺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越加迷人。我们一行，包括农村工作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秘书等，在县、公社和大队三级干部的陪同下首先走进一座“敬老院”，撩开雪白的门帘，只见屋子里并排的五张床上是一样雪白的床单雪白的被子，五个老人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没有一丝声响。毫不夸张，当时我真有一种走进停尸房的感觉，当然，我不敢有半点流露半点马虎。陈书记很亲切地对其中一位老人说：“日子过得还好吧？”一个干部抢前一步：“一天三顿，按毛主席的指示，两稀一干，还有专人伺候……”陈书记显然不想继续听他罗嗦，问跟前的老人：“是不是啊？”那个老人一动不动，双眼还是盯着天花板，好像是点了点头。大家见陈书记转过身子，后面的人便先退出了屋门，我听见书记说了一声：“不错嘛！”

接着是“考察”村里食堂。我紧紧跟在书记后面，生怕遗漏了重要指示。真是巧了，我们一脚踏进厨房，只听一声吆喝：“好嘞！”在一片腾腾热气中，只见锅台上包子正在出笼。书记大步走过去，没等开口，身着雪白工作服的大师傅已经递过来一个包子，说：“尝尝，趁热。”书记亲切地微笑着掰了半个，侧过身来把另半拉给了我。是 85 粉或 88 粉，白菜猪肉馅，面粉虽没有我有一次在省委小灶上看到的细洁，但实事求是说，味道不错，至少不比省委大食堂的差。这时只听书记又随口说了声：“不错嘛！”干部接下书记话茬说，这包子，我们食堂一月少说也得吃上那么三几回的。另一个穿得更有干部模样的说，全公社各队都差不离（当地方言，意思是差不多）。书记说：“全省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你们能安排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认真总结经验，不过，还是要注意节约呵，要细水长流呵，要干稀搭配，发动群众收集代食品，充分挖掘潜力呵，啊？”周围的人无不连连点头，还有位始终紧跟在书记身边的人一个劲地说，请领导（或陈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决不辜负省委对我们的期望。从那口气上听，我断定他是这个县最大的头儿无疑。

我们一行还“调研”了几个“点”，最后在公社召开了“汇报会”，先“听取”汇报，然后领导作一番“重要指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与会的都埋头记笔记，没有一点声音，最后，陈书记问了一声：“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大家”中职位最高的那一位就非常恭敬非常谦卑地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整个调查研究当然也就结束了，剩下的写总结呀、给省委的报告呀，以及把省委领导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全省每一个角落”呀，那就是秘书和记者的事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和运作方式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君不见全国各地各级领导依然是如此中规中矩，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老实说，当时我就看出了其中搀杂的假，我也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是预先安排的一场戏。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不想让上级领导说几句表扬的话呢？谁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在众人面前呢？也可能，这里的群众生活虽没有这样好却也确实还算可以呢？等我在这个社会里摸爬滚打，特别是文革中从监狱里两进两出之后，我才真切地知道自己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想想看，1959 年或是 1960 年啊，共和国成立还只有短短 10 年的光景，不少人弄虚作假已经那么驾轻就熟那么有恃无恐（当然，比起后来者，他们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领导而干，他们只需对自己的领导负责。他们需要那种领导，那种领导自然也需要他们。可是他们能瞒和骗于一时，还能瞒和骗于永久吗？他们骗得了领导，可骗得了千千万万人的肚子吗？这就要说到吃人肉的事了。这听起来很是吓人，但确实是真的，是我亲眼所见。

这里，我先得交代一点背景。

青海的人口比较少，所以相对安徽、河南、甘肃这些省份来，饥荒出现和蔓延的时间好象稍为晚一点，1960 年，有的地方已经非常严重，可青海一时还没有显出紧张，大约是在下半年开始，饥饿的情况才愈益明显起来。那时候，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真真切切感到了饥饿状态的“严重性”“难受性”和“可怕性”，于是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喂饱肚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时，省委领导部门又有新的文件出台：干部下班后必须“采集一切可以采集到的代食品”（文件下面还列出若干品种，如灰条、苦苦菜等），好在那时几乎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农场，除了在近郊野地里小打小闹拣拾外，可以派出“专业队”去集中批量采集，少数有“实力”的单位甚至有自己的“捕捞队”，可以到青海湖去撒网打鱼（那时可不像现在讲求什么生态环保，怎么捕怎么打都行，谁捕归谁），他们的日子自然就要好过得多。我所在的报社虽属省委管辖，但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把关”，吃饭问题就不可能做到“无微不至”，省委机关的人比我们好过，当然，我们比一般机关的要好过，更别提百姓了。但是许多人还是没能逃过浮肿这一关，记得全报社得浮肿的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由于老家母亲二姐她们时不时省下一点全国粮票给我寄来，我有幸躲过一劫。那时的总编辑叫乔迁，他是 1938 年在清凉山就办报的老革命，“38 式”，吃的自然是“小灶”（注：处级吃中灶，小灶须厅部级，我有幸在一次早晨送审稿件时目睹小灶的“优越性”，最深刻的莫过于那雪白的圆圆的可爱之极的小馒头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白那么白那么小那么小的馒头。）他说过一句名言（我敢说，当年的青海报人，没有一个会忘记），这句话是这样的：“浮肿的人，不能出去采访，丢社会主义的脸！”他还振振有辞地说：“浮肿，主要是思想问题，有的同志怎么没浮肿，我怎么没有浮肿？”关于办报，他也有精彩的经典名言：“搽粉要搽在脸上，不要搽在屁股上。”这是他一次批评一位愚蠢的记者办了一件愚蠢的事后说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创，但我现在依旧觉得他这话对于所有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无疑具有普遍的指导性，而且，用现在媒体上常见的话说，叫做“既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回过头来再说吃饭问题。由于情况愈来愈严重，偷馒头票乃至偷食堂馒头的事便屡有发生，尽管食堂日夜值班也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单位一位既是我老同学又是我老同事还是本家的“孙记者”，一次外出回来迟了，他迳直到大堂后面去买饭，恰好没人，便顺手牵羊在笼屉里拿了一个馒头，真叫运道不佳，临出门被人逮个正着，这下糟了：“搞宣传的还干这种丢人的事？”“还是省委机关的，连百姓都不如（这话说的，百姓都不如机关干部？）”可怜这位本家连续接受批判三番五次检查且不说，最后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票子也丢了。我们部门的老领导吴仲宣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再担保，才算没有把这位 1958 年的北大毕业生扫地出门。我自然也是发了言的，无非是有辱斯文什么的，可能没有什么过激的话，我是想，一并非有意为之，二毕竟是馒头票太少，肚子太饿，加上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何苦为了一个馍弄得大家没脸面。记得俄国的涅克拉索夫写过一首关于流浪汉的诗，流浪汉因为偷面包被人当成贼而痛打了一顿，我读到这里好象总是很同情那个流浪汉，这或许就是我不断受到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其实那时候的老百姓谁不艰难，我的一位在中学教书的朋友“困难时期”下放到农场劳动，一次回到省城，刚下汽车，在教育厅给我打电话，那颤抖的声音听着就有点不对劲：“老孙吗，我是某某呀，你能想办法弄点吃的东西麽？最好是酥油、白糖……我不行啦。”等他回到早已“下放”在农村的家时，才知一个儿子已经饿死，另一个出世不久的女儿由于家中无人照料，竟然跌入炕里活活烧死，这是怎样的惨剧呀！

绕了一圈，现在再说吃人肉的事就容易明白了。

青海东部农业区有个叫“民和”的县城，滔滔黄河从它的南面流过，静静的湟水则从北面将

它和甘肃的永登县分开。这里的气候是全省最好的，这里的土地是全省最肥的，这里的交通是全省最发达的，向着茫茫西部延伸的兰青铁路和公路，在这里是它第一次歇脚的大站。在历史上，这里一直是青海的“粮仓”，盛产小麦、青稞、玉米，甚至有水稻，至于水果品种之多，恐怕初来乍到的人都难以置信。我在青海 28 年间，到此地来采访的趟数少说也有十好几回。

这一次，我到了一个浅山（本地称呼，即半山）地区的生产队。这一年，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建议不要宣传“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了，而实际上，农村各地的食堂早已散伙，“吃饭不要钱”的美梦似黄粱一样成了笑谈。现在，当农民有了自由吃饭的权利时，却完全没有了自由吃饭的可能：他们被彻底的剥夺了，一无所有，连锅碗瓢盆都没有，真正的要从“另起炉灶”开始。我多次在农村采访，毕竟对农村的情况还有所了解，出发前，我就作好了精神准备：“自然灾害”已经连续三年了，城里干部的日子都不易，贫困地区的农民肯定更加艰难，加上正是青黄不接，那困难恐怕难以想见，那里的农事活动还在正常进行吗？那里的社员家中还有粮食吗？他们还有“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吗？那里的治安情况怎么样呢？那里农民的身体状况乃至生存状况又是如何呢……我设想了许多许多的问题，就是没有想到此次会碰上人吃人这桩让我惊诧莫名难以置信的事，它堵在我心里一辈子，每次只要一想起，便总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特别是后来当我悄悄告诉我几个好友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告诫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更不能向领导汇报……更加使人困惑的是，这样的历史真实，至今仍被捂得严严实实，他们是有意要让后人在遗忘中抹去这段血淋淋的历史呢，还是企图逃避历史的审判呢？这是怎样的一种沉重一种悲哀啊，我常常因之而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懑和狂怒！这些饿鬼的冤魂要到哪天才能安息呢！

一到村里就觉得有些异样。历来到农村采访，在找到支部书记或者队长（即现在的村长）后，一般总是先安排住宿的人家，这也就是吃饭的人家，可是这一回却安排我和一位饲养员住，那个黑乎乎的屋子里只有一张黑乎乎的像钱柜那样的桌子和一铺同样黑乎乎的炕，同牲口棚只是一板之隔，屋子里的霉味、牲口的尿粪味扑面而来。队长把我领到之后，交代说，就跟老慕（也可能是“穆”或者简直就是“木”，一个有些佝偻的满脸黑乎乎的老头）将就着吃吧，粮票和开支（指伙食费）也给他吧。刚要转身，又说，这粮票其实也没啥用，乡里又没粮店，不给也行，多给几块钱。抬脚刚往外走又补充说，明天，你要是参加队里劳动，中午有二两炒面。说完就走了。我怀疑耳朵出了问题，竟有“炒面”？后来才知道那是野燕麦秸杆磨成的粉，炒熟了可以用开水冲成糊糊吃。我试着吃过那种“食品”，无法下咽，粗糙得似乎会把你的喉咙刺破。可为了这二两“炒面”，大家还是会拿着一个碗或者一个布袋，去排队，去等候。看那场面我直想落泪。

夜里，在同老慕说话中，才知这里的艰难非我等可以想象，村里村外，能吃的都吃了，吃光了，先是野菜、榆树皮，那是好东西，后来，只要是地里长的地上跑的都吃了，再后来，挖老鼠洞，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了，见啥吃啥，连“观音土”也吃了，顶饿呀，可那玩意儿涨肚子，拉不出屎……村里呀，没少死人，先是年岁大的，这也罢了，阎王早叫他几年，总要走的，最可怜的是娃娃，哭着闹着要吃，有啥吃呀？好在村里几年没人生娃了，就是生了，哪有奶呀，还不是个死？

“那你日子乍过的？”他回答说，我嘛，一世就我一个，队里照顾我，有啥好吃的，总记着。这不，还有几头牲口在这儿嘛，得白天黑夜地操心。上半年，就有人给牲口捅刀子，公社来人按“现行反革命”治了，要我说，也不能全怪那小子，他是给饿的呵，他是想，牲口死了，

不也能分上几两肉吗？这小子可忘了，几百号人，全指望这几头牲口呢，没有了牲口，你说，庄稼人还有啥指望？

第二天，我在村子里随意走走，采访经验告诉我，往往在不经意中可能会抓到很有价值的东西。我走过一个庄廓，看到大门倒在一边，便走了进去。这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北房比较大，至少有五间，东西房好像只有三间，如果是一家住，那定是个三代人的大家。院子里不见人影，墙根边胡乱堆了几件农具，西南角上还有一点柴草，我高声喊了一声：有人吗？没有回音。我再细细一看，发现东西房的门窗大多已经东倒西斜，心头不由一怔。老慕说过，有的人家已经死得绝种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门走进好像还有人住的北房，立即闻到一股有些异样的味道，我朝锅台走去，锅里冒着热气，我随手揭开锅盖，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分明是孩子的一条胳膊！

我记不得在那里呆滞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更长一点？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脚边，让我越加惊吓不已。我赶紧扶他起来，他却向我一个劲地作揖磕头，好像还在求我什么，可是我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对他说，我不是县里的干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年男子竟然在这天夜里投水自尽了。老慕告诉我，幸亏被人发现，救了起来。老慕说，算他命大（本地话，指能逢凶化吉也有活得长的意思），正好碰上有人到矿上（不远有个铅锌矿）去偷粮食，不然，不是多了个冤死鬼？谁给他吊孝？全家就他了，没人啦。

我象逃避瘟疫一样匆匆离开了这个村子，或许更是担心别惹出更大的麻烦，也可能干脆是自己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地狱般的恐怖和残酷……

那时的报纸，从省报到中央各报，依然是“形势一片大好”，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谁要是说了点肚子饿甚至饥荒之类的话，那必定是“反对三面红旗”，必定是“地富反坏右”的“代言人”，至少也是“思想方法有问题”，“只看到一个指头而看不到九个指头”等等。那时农民有句特别形象特别精彩的话：“报纸上的字（指大标题）越来越大了，碗里的糊糊越来越清（稀）了。”在另一个地方，我听到的版本稍有不同：“碗里的清汤照着天花板上的字（农村多用报纸糊在天花板上），越来越亮（清楚的意思）哩。”

几十年后，非官方公布的资料中说，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的竟有 4300 多万，其中 4000 万是农民（据 2004 年第二期《同舟共进》），位居前列的省份有河南、甘肃、青海等，如果按总人口比例计算，那么青海应是名列第一。可到底是怎样一个比例？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或许会是一个永远的谜。有时我想，每个个体生命一生的遭际怎么那样的不可捉摸和不可预测，人生命运的乖戾、盲目和无情，简直难以解释，然而，有谁能想到，“解放”“翻身”的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竟会如此惨烈地倒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倒在如此冰冷的“母亲”的怀抱里，而且让老天爷承担了罪责至今被生生地死死地隐瞒着真相呢！

又是一年多后，城市的生活已经有了初步好转，当然，食品的供应还是极其有限，买什么都要票证，我亲历的一个黑色幽默故事最能说明这种状况：一天，我在单位附近的食品店买东西，进来一位老婆婆，她看见店里摆着一些鸡蛋，便对营业员说，想买几个鸡蛋。营业员问

老人，有证明吗？老人问，要什么证明？营业员说，出生证呀。这时，老人一脸失望地说，我都六十多了，那东西早不知道扔哪儿了，要知道那纸片片能买鸡蛋，还不得好好保存着？店堂里的人都哈哈笑了起来，这笑声也多少显出了心理上的些许宽松（多长日子了，难见笑脸了）。那时，许多机关，吃“干”的多了，吃“稀”的少了，特别是“高价”食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后来才听说这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作为一条重要政策措施出台的），比如奶糖大体是 15 元一斤（500 克），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五斤。记得我和一位同事，日子稍稍好过之后，晚饭后经常出去散步，出门时我买二两糖，每人可得七颗，走了四五百米就吃完了，于是调头，再由他买二两，刚好到家吃光。当然，如果每天吃三元奶糖那是负担不起的，工资也只有七十来块嘛。不过，这个聪明的抑或无奈的政策毕竟救了一些人，至少，浮肿大大减少了。就在这样的时候，报社领导还是省上领导提出一个问题：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中国农民，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准备怎样迎接生产新高潮的到来？

这又是一个春天。我受领导的派遣，“带着问题搞调查”，又一次到了民和县。这次我选择了一个川地的生产队，在湟水之滨，兰青铁路正好从她身边划过。还没有进村，我就看到了一片果园，那盛开的粉色的杏花一眼望不到头，似乎是到了另一个神话世界，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在我记忆里，怎么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是叫做“川口”的那个我已经来过多次的地方吗？我怀着极大的兴奋，一步步朝果园深处走去，很可能，还哼着什么曲子（我的一位朋友说，我常常会下意识地哼哼曲子，高兴时，难过时，都会这样）。在一棵大树下（好像是棵银杏树），我看到有位老奶奶坐着。我轻声轻气地问她：“阿奶，干什么呢？”她回答说：“看园子呢。”声音很细很小。我又问：“队里的还是个家的（本地话，即自己的）？”她仍是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队里分下的。”我明白了。中央去年有文件，说，困难的地方允许土地承包，说这叫“放宽政策”。这“政策”一“放宽”，竟然面貌立即大变，我因此而常常纳闷：“放”了就“活”，否则就“死”，这叫什么“政策”呢？我把领导提出的“现在农民在想什么”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问这位阿奶，听到的回答却让我半天回不过神，她望着我，一脸的不解一脸的无助，好一会，才说：“同志啊，我想吃个馍啊！三年啦，没吃上一口干的啦！”

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描述这句话对我心灵的震撼，我只记得，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背包里能拿出一个馍呀！将近五十年过去了，“想吃个馍”这句话还时时在我心头回响，每当我懈怠时奢侈时忘乎所以时，那一定是忘了那个老奶奶，而当我对我们的祖国对我们的人民对这个执政的党有一点独特的认识时，那一定是想起了那位老奶奶。她是那样的瘦弱那样的苍老那样的无力，我不知道她在那张破旧的小凳子上还坐了多久，在她熬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她终于吃到一块干粮了吗？

我可爱祖国的可怜百姓啊……

—— 原载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Tuesday, November 02,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饥荒年代的点滴回忆

力达

1）挑着半桶稀粥上坡的二姨夫

1959 年冬，城市居民粮油已定量供应，肉食、蔬菜、糖果日渐稀缺，生活渐趋艰难，可当时的农村，还在吃公共食堂，当然，早已不是最初白米白面，放开肚皮，吃饭不要钱了。

二姨在当时的张寨公社花果大队，小时候母亲常带我们去玩。花果这个名称是 1958 年公社化时起的，可那时哪来花果，只见荒坡连着荒坡。只有在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因地制宜，退耕还林，荒山才逐渐变成了一片片果树林，成了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那年，我还在上小学三年级，放寒假时随母亲去二姨家玩。每天到吃饭时，门前场院里就聚上一群小孩，眼巴巴地往坡下弯弯的山路上瞅着，等着大人们从坡下约一里路外的公共食堂挑饭上来。

我们瞅啊瞅，终于看见二姨夫熟悉的身影了：他挑着装饭的木桶，摇摇晃晃地上来了。

围上一看，是大半桶稀稀的菜粥。二姨拿着勺子，给大家碗里分，大人多点。小孩少点，谁也别想多吃多占。现在想想，我们当年去玩，实际上是占了他们微薄的那口饭，真是过意不去。

吃食堂的年头，不准各家开伙，也不准私留粮食。人们饿极了，只能深更半夜悄悄地煮点私藏货吃。我记得，有几次，半夜里，我都睡得迷迷糊糊了，又被二姨叫醒，一家人关起门，偷偷地喝口偷偷煮的菜糊糊。

好在没二年农村的大食堂就解散了，以后，我们再去二姨家时，可以自己烧饭了，尽管日子过得也很艰苦，但起码不再喝坡下挑来的几乎变凉了的菜粥了。

2）抓紧，小心让人抢跑了！

孩子他妈老笑我，吃大饼时几个指头抓得牢牢的，弄得满手油。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坏习惯是啥时养成的。记得四五岁孩提时，奶奶给我一根油条，怕我不小心掉到地上，叫我攥紧些，说天上飞的有老鹰，看见小孩油条攥不紧就飞下来叼跑了。或许，这坏习惯是怕老鹰养成的。

不过，三年大饥荒时，母亲给我妹妹们的训诫是，手上拿的吃的，要抓紧，小心让人抢跑了。这一关照绝非多余，还真让我二妹给撞上了。

一天，我和母亲、二妹从北大街回小学校。三四岁的二妹一路哭个不停，喊肚子饿，要

吃馍馍。母亲看她哭个不停，就用粮票给她买了个小馒头，吩咐她吃时要攥紧些。见了馒头，妹妹立马破涕为笑，一边吃，一边蹦蹦跳跳的。

突然，从旁边窜来一个穿得破破烂烂，蓬头垢面的的中年人，他一把抢过妹妹手中的馒头，拔腿就跑。妹妹哇的一声吓哭了，我气坏了，立马追了过去。此人一边跑，一边往馒头上吐口水，抹鼻涕，追上后，我用拳头在他背上擂，喊道："我叫你抢！抢！"可这人随你再怎么擂，扒着身子只管吃。

不知啥时母亲过来的，她把我拉开，说："算了，反正也脏了，给他算了。"我这才悻悻走开。多年后，在我成年后，我才理解了，一个人如果不是饿得发疯，是不会如此下做的!!古人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嘛。

3）子夜时分，我差点被电流打死

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菜少，油水更少，还得吃食堂。由于母亲在小学校任教，我们几兄妹就在学校一道吃食堂。按年龄，下午饭我吃三两，也就是四两一碗的蒸米饭划掉一个角。十一二岁的孩子正能吃，这点缺盐少油的饭下肚，管不到第二天啊。我经常饿得夜里心发慌，辗转难眠。

白天饿了，学习、玩耍还能把饿的感觉冲淡一些，但深更半夜就难熬了。这样，我就想了个主意，吃二两，留一两，把省下来得这口饭偷偷藏在学校集体办公室母亲办公桌的抽屉里，待半夜里饿极了再吃了救急。

一天夜里，饥肠辘辘的肚子提醒我，该去吃藏着的那口饭了。于是，我翻身下床，悄悄拉开门，穿过黑乎乎的大操场，从教师集体办公室的窗子翻进去，黑摸着找到母亲的办公桌。趴上桌子，找灯头上的电灯开关。

我刚摸到灯头开关，突然，半个身子麻了。坏了，触电了！我心里一惊，用力甩动接触灯头的胳膊，想挣脱开来。然而，一连甩了几下都没挣脱：强大的电流把胳膊紧紧地吸住了，心抖得缩成一团，身体已开始抽搐。完了！我心头闪过这不祥的字眼，也许是急中生智，也许是出自求生的本能，我在办公桌上猛地一滚，从桌上坠落下来，靠下坠的重力甩脱了带电的灯头，总算有惊无险。

脱险后，我活动着已有些僵硬的胳膊，摸黑把那口冰凉的米饭团吃了，没有任何菜。

4）磨的树叶凭啥光给老师吃

我上小学的年代，处处讲政治，每周都有劳动课。小学生劳动课要做手工或做些轻微的公益劳动。

大饥荒最困难的时候，我就读的中山街小学让学生们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劳动课。

当时，学校还有教师食堂，不知听哪里的宣传，说登青树叶子有营养，磨碎了可以吃。恰巧，学校里就有几棵根深叶茂的登青树，于是，学校就组织学生，利用劳动课时间剪树叶，

把剪碎了的树叶再磨碎（怎么磨的，我年少不知道或记不得了），最后与面粉合在一起蒸馒头。

我吃过这样的馒头，苦涩极了，但由于二两的馒头要比没加树叶的的大得多，一时间老师们还抢着买。后来，大家觉得实在难吃，渐渐没人愿吃了，这股剪树叶的热潮才消退了。

然而，就是剪树叶这种可怜事，竟也引起了一些学生家长的不满，他们向学校提意见说，磨的树叶凭啥光给老师吃，不分些给辛辛苦苦剪树叶的小学生，这不是剥削学生的劳动吗？

不久，教工食堂的登青树叶馍退场了，学校的劳动课也不再剪树叶了。

5）妈妈，我看不见了！

二妹困难时期只有三四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年幼不懂事，老喊饿，动不动就哭。

一天傍晚，她又站在操场里哭开了，喊她回来，仍站着不动，只是一个劲揉眼睛。母亲过去问她咋了，她哭着说：“妈妈，我看不见了！”

母亲一听急了，急忙领她去看医生。医生说是夜盲症，是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 A 导致的，最近常见这样的病例。医生开了些维生素，吩咐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营养。回去后，家里重点保证二妹，给她增加了饭量，过了一段时间，二妹的眼睛才慢慢恢复了正常。

给二妹增加的饭量是母亲口里省下来的，可我们当时知道，她的身体也由于营养不良而非常虚弱了：四肢已明显浮肿，手指一按就是深深的一个坑，久久恢复不了。幸亏当年政府对城市浮肿病人额外特供了一些黄豆粉，才使母亲熬了过来。

6）看有没有掉的粮票

大饥荒的三年中，母亲学校里只有小小的一间宿舍，由于居住条件的拮据，一段时间，我和奶奶、西安来的三姑三人相依为命，煎熬苦度。

饥荒刚起，粮食初定量时，奶奶想不到，困难期将会如此漫长，开始对计划用粮不很经意。渐渐地，粮、菜、油、糖、副食品全面管制，其他商品，大概除了铅笔、文具、玩具、书本外，实在想不出还有啥是不凭票供应的了。我记得，那时居民大都不敢将粮食指标全买成粮，往往把一部分用来买红薯：粮站规定，一斤细粮的指标可买四斤红薯。困难时期吃红薯、南瓜吃怕了，以致迄今再不愿吃这些东西了。

一段时间后，粮本上的指标早早用光了，寅吃卯粮，奶奶只有东拉西借，拆了东墙补西墙，后来实在借不动了，就卖本来为数不多的旧家具，换点钱买高价“黑市”粮度日，有好长一段，煮半个清水南瓜加一把米就是一顿饭。

记得有天傍晚，奶奶拉着我在街上走（是中山街），她突然对我说：“狗子（我小名），咱俩分开走，你走那边，我走这边，看地上有没有掉的粮票。”

那年头，粮票就是命，一两粮票都是珍贵的，哪可能轻易丢了！想捡到它，仅仅是几乎陷入绝望的人下意识产生的幻觉罢了！

7）“黑市”摆到公安局门前

改革开放前，尤其是公社化时，除了蔬菜可有限制地在市场买卖外，粮、油、棉、肉、蛋、豆类品等几乎所有农产品都只能卖给国家，国家对城市居民按各种定额票证供应，不允许市场交易。当局把违反规定私下偷偷买卖的交易称作“黑市”，一直严厉打击不贷。

然而，到了大饥荒困难的时候，街头巷间渐渐地出现了一些提着筐筐叫卖的“个体户”，有无业的居民老太太、老头，有乡下的农民，卖的有糠饼、麸子馍，野菜糊糊、地耳包子、蒸红薯等，偶然，也能见到贵得惊人的纯面馒头。这类黑市的出现虽不合法，但可给陷入饥饿中的居民提供定额外的食物补充，深得人心！

开始，当局还派员驱赶这些“个体户”，取缔交易，后来看到防不胜防，禁不胜禁，居民又确实需要，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随它去了。渐渐地，这类买卖从僻街小巷，移到了大街上，沿街都是，最后，竟公然摆到了公安局大门两边了，警官们出出进进，就当没看见。

不过，困难时期刚一过，此类“黑市”又被坚决取缔了，以前做过“黑市”买卖的居民在各居委会里受到清查和批判，此是后话。

8）难忘的西郊机场

汉中西门外的飞机场是抗日战争时修建的，为抗击日寇，争取民族解放做出过历史贡献，在三年大饥荒时代，又成了城市居民觅食求助的希望之地。

那年头，尤其是收获季节时，几乎天天一大早，城里的大人小孩就成群结队地背着背篼，提着篮子到机场四周的地边剜野菜，捡麦穗，刨土豆，觅地耳。夏收开始后，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背个背篼，和左右邻舍的小孩子去机场周边一带了。

那时还是公社化，机场旷野处东一块，西一块的的麦地，都属生产队，没等社员割完收完，田边就密压压地蹲满了等着捡麦穗的人群，最后一捆麦子还没挑走，人群就不顾社员的阻止，蜂拥而入了。种土豆的地块，也和麦地一样，没等社员把土豆收完，刨剩土豆的人群就扑了进去，在社员挖过的地里再挖一道又一道，如果刨出个鸡蛋大的土豆，就笑得哈哈的。

雨后，是觅地耳的最好时候。今天的年轻人恐大都不知什么是地耳，更不会吃了。那是草地上，尤其是薄层硬草地上雨后自然生出的薄膜状菌类，混杂着碎草皮，很难弄干净，但那时也顾不上了，能入口就行。

还有寻猪草，当年私人不许喂猪，寻猪草实际是寻野菜，猪吃的人也能吃。我就是在那几年认识了野芹菜、季季菜、灰灰条等野菜，也知道鹅儿肠不能吃，五朵云是有毒的。

9）一场奇特的厨艺宣传

困难时期提倡“瓜菜代”，意思是用瓜和菜来代替粮食，此外各地还为填饱肚子想出了不少“奇招妙术”宣传推广。

一天，我见街上吹吹打打，就出去看热闹。只见一队人马抬着标语牌，拉着蒸笼、饭食、各式菜蔬瓜类在做宣传，内容有如何用菜蔬做吃起来和真肉味道差不多的人造肉，有如何把二两米饭做的有三两那么多的复蒸法，有如何巧做南瓜、红薯的新厨艺，还配以实物演示。

其他的厨艺介绍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复蒸法是把米放进大碗里，多加些水，蒸成稠糊状，放凉后再蒸一道，使之显得硬些，也多些。当时人小，只觉得这些宣传挺有意思，也以为真有效果，以后年龄大点儿，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米是固定的，多加点 H2O 管用吗？至于那种人造肉，能有肉的营养和味道吗？答案不言而喻。

不管咋样，当年有关部门能想出这些“奇招妙术”。出发点还是为了解决人民疾苦，应当肯定。

—— 原载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有删节
Wednesday, November 03,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毛时代大饥荒见闻

荀真湘

一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中国大陆处于全国大饥荒的高峰时期，当时我是上海医学院的学生，在附属广慈医院进行临床实习。

广慈医院本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医院，景色优美，各个诊疗室所在的大小楼宇，错落有致的坐落在这座美丽的大花园中，病友们在如花似锦的庭院中散步，自然感到心旷神怡。

医院领导却动员学生把医院里的草坪和道路旁的灌木丛统统铲除，改种瓜菜，说是苏修背信弃义，追讨抗美援朝的债务；加上自然灾害，粮食发生暂时困难，因而要求把医院里的土地利用起来播种瓜果蔬菜。党委一声令下，学生们立即行动，园丁们长期精心呵护的美丽花园瞬间变成了瓜菜地。但是学生们都是些门外汉，瓜和菜能有多少收成，就只有天知道了。

受定量限制，职工食堂卖出的米面主食总是分量不足，菜肴更少，大家都吃不饱。为了防止炊事员等人偷盗食品，医院建立伙食委员会，我被选为委员，负责监督食堂，每当开饭结束

后，随时把剩余饭菜和米面等能吃的东西统统锁起来。

一九六〇年，我被分配到上海市一个医院做内科医生，在门诊中看到许多全身浮肿的人就诊，给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医生出了一道难题。课堂上，老师只讲过浮肿是心肾疾病的一个征象，在心肾疾病严重时才会出现，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不可能像传染病那样在短时间出现许多病人。现在面对这么多的浮肿病人，一时真不知如何诊断和治疗，只得向老医生请教。老医生压低声音神秘地告诉我，这是严重营养不良性浮肿，因为体内的蛋白质极度缺乏，大量水分滞留在组织细胞间隙中，表现出全身性的水肿，此种情况过去十分少见，现在出现这么多的浮肿病人，显然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

有一天，一位朋友私下告诉我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一位在公安分局担任局长的老乡被突然抓了起来。原因是他上个月回山东农村老家探亲，发现全村人已经饿死了一大半，家人也是奄奄一息，景象凄惨，怵目惊心。可是村干部还在那里继续骗人，讯息完全被封锁，连他这个公安局长也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他回到上海后，公开说出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想不到此事被有心人回报给市领导，他便立即被捕，以「传播反革命谣言」罪开除了党籍公职，并押回农村监督改造。显然党和政府不许人民知道农村发生了大饥荒，继续严格封锁消息，毫不手软的严惩泄密者。因而，人们在公开场合总是避谈大饥荒，即使在私人通信中也不敢写出农村的实际状况，全国人民只能看到自己周围的小天地，对于外地情况一无所知。

有几位来自青海的病人，只有四十多岁，身体却衰弱不堪，走路要拄著木棍，两条腿肿得像粗木桩子，小腿和大腿一般的粗。据说他们原是从上海到青海的支边人员，那里农村大食堂早已是无米下锅，只能挖野菜充饥。他们为了活命，只有坐火车到上海投靠亲友。他们本是上海人，现在既没有了上海户口，也没有住房。亲友家每月按定量买的粮食不够自己吃，没有余粮，哪里有可能再长期招待客人呢？处境十分可怜。

这些病人肝脏肿得很大，血浆蛋白含量极低，处于严重衰竭状态，但是医生却不能做出营养不良的诊断。医院领导按照上级指示，不准暴露大饥荒和人民挨饿真相，只能使用新造的病名「浮肿病」来掩饰，有的地方干脆用数字「304」当饥饿性浮肿病的代号，使外人摸不著头脑。

二

治疗「浮肿病」的药物称作「浮肿丸」，成分是粗细面粉加少量红糖，每个病人限购一包，也只能是暂时维持生命罢了。日后才得知，「浮肿丸」也只是上海这样的国际著名大城市对病人的「优待」，全国其它省市的灾民是连这点少的可怜的「浮肿丸」也是无权消受的。

我当时在春节期间到河南安徽农村探亲，所到的村庄都是冷冷清清，行人极少，往日常常看到的老人们在街上相聚聊天和孩子们欢乐玩耍的景象现在不见了踪影。村中大食堂只供应稀汤，人人饿到有气没力，静静地待在家里。老人们因为把有限的食物省给年轻人吃，大部分都饿死了，人们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当时报上宣称人民公社大食堂能够让人敞开肚皮吃饱饭，实现中国几千年没有解决的难题，言犹在耳，农村食堂却只有大锅清水汤。共产党把打饥荒的原因归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修逼债造成的暂时困难」。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以来，党政各级干部不但强迫农民交出土地牛马等生产资料，还任意强夺农民家里的桌椅盆罐等等生活资料，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青年们忽而被派出去砍伐树林，大炼钢铁；忽而又挖沟开渠，深翻土地，地里成熟的庄稼却无人收割，集体喂养的牲畜大量死亡，以致犁地和播种等都要依靠年迈人力牵拉，耕作粗糙，产量大减。明明农业减产，干部们却还在讨好上级，胡说亩产达到了几千斤、几万斤。

毛泽东为了和苏修争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要把大量粮食支持外国，就必须向农民多征购粮食。征购粮食的数量不是按照实际产量，而是透过三级干部会，强迫生产队多报产量，把实事求是报产量的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残酷的批评斗争，直至撤职和开除。因而生产队长只能按照上级要求的「大丰收」，胡报出远远高于实际的粮食产量，粮食局便根据假产量征购粮食；更因为卖粮价格由政府决定，极低的卖粮价使农民无利可图。

三

生产队为了完成粮食征购数量，不得不昧著良心把农民的基本口粮也交上去，食堂存粮不足以应付农民的基本需要，农民家里的粮食和锅灶早已被搜括一空，政府派民兵把守村口，不许人们外出逃荒。如此一来，农村中除了干部能够多吃、多占之外，广大农民就只有等待上级开恩回销口粮，或者饥饿而死。

地方政府不敢向上级如实报告缺粮情况，更不肯开仓放粮，许多村庄食堂连续多日完全没有食物供应，农民们把草根、树皮、野菜吃完以后，大批饿死；有的村庄，除了干部之外，农民全家死绝。

在河南、安徽、四川、山东等地，许多农村甚至出现「人吃人」和「易子而食」的惨象，成为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

有些农民忍受不了饥饿的痛苦，试图到政府粮仓偷抢，都被军队逮捕入狱，或遭无情残杀。

由于毛氏的党中央凌驾于各级政府组织之上，各种政策命令从北京直插到全国各个角落，大饥荒遍及全国性，各地只是因为自然条件不同而有轻重差别罢了。

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甚至邮局，都奉命封锁饥荒信息，谎言充斥著一切新闻媒体，身在城市的人竟然对于广大农村陷入大饥荒的惨状毫无所知，世界人民更是一头雾水，有些外国人还在盲目赞扬「毛泽东拯救了中国」。

处于大饥荒中的城镇居民，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度，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职工，每人每月供应二十八斤粮食，居民只有二十六斤，工矿工人的劳动强度较大，定量可达三、四十斤，儿童则按年龄计算口粮。副食品油、盐、肉、蛋、蔬菜更是奇缺，每月不足半斤，食品商店

里货架空空，各类饭馆一律凭粮票供应。

城镇居民依靠有限的食品得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比起极度缺粮的广大农村来说，可以算是天堂了。

当时在上海还采取出售「高级点心」、「高级饭馆」的政策，商店食品价格高出平时的五至十倍，一斤糖果几十元，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上海的资本家和有钱人，纷纷变卖黄金首饰，买高级食品救急，却苦了我们这些工资微薄的普通职工。

我每月的工资四十几元，要供应住在城市的四口之家和在农村忍饥挨饿的父母，面对市场上的高级食品，只能是望洋兴歎了。

我的父亲原本是县里著名的中医师，合作化以后，诊所和药店都无偿的交给了生产队，本人成了赤脚医生兼记工员，靠工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

父亲当时身患多种疾病和营养不良性浮肿来上海看病，我想无论如何要让他吃一顿饱饭，我们一起到著名的国际饭店十四楼餐厅，吃了四小盘菜和两碗米饭，竟然花去了一个月的工资，使我们感到这些所谓的高级货，只是政府乘机赚钱的工具罢了，我们这些一贫如洗的职工，再也不敢问津高级食品。

四

有一天，我接到一位家在山东老解放区的老战友来信，因为生活困难得几乎维持不下去，要求我寄给他五块钱和五斤粮票。这个要求本不算高，但是我却迟疑了许久才决定寄出。因为我每个月已经寄给父母亲粮票五斤，如果再给战友五斤，我就难以维持基本生活了。

果然两个月后，我也出现了肝肿大和下肢浮肿，整天感到昏昏然少气无力。好在我能买到「浮肿丸」充饥，菜市场尚能买到咸肉咸鱼，虽然咸得难以下咽，用水浸泡以后，也能多少补充些蛋白质。

想不到几个月后，新寄给战友的信被退回来，信封上写著「无处投递」，再寄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了消息，不知是否全家人都饿死了？让我伤心难过了许久。

毛泽东为了应付全国大饥荒，实行严酷的城镇农村户口隔离制，强制把中国人画分为两个等级，城镇户口的人可以买商品粮和少量副食品，而农村户口不供应商品粮和副食品，口粮只能自己解决。城镇户口可以转为农村户口，却不许农村户口转入城镇。

失去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农民，每天被干部驱赶著从事超强度的奴隶式劳动，却分不到应有的口粮和零用钱，只能记录几个「工分」，到了结算时，一个工分只值几分钱，一年的劳动成果还不够买基本口粮，许多生产队甚至把农民应得的口粮也卖掉了。

当时农村青年不能外出做工，工矿企业只招收城镇户口的人，户口制度加缺粮使得农民陷入了绝境。

在全国大饥荒的年代里，城镇居民靠少量定量粮得以维持住生命，四千万农民被活活的饿死，受难的人数之多和范围之广，超过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一次灾难，正应了毛泽东的「万户萧疏鬼唱歌」了。

在全民勒紧腰带苦苦挣扎的日子里，只有军队受到特殊照顾，士兵吃饭不限量，军官有酒肉，军人复员以后还可以安排工作。我曾经参加几次招兵体格检查，有机会和军队共同生活，目睹了军人主食随便吃，天天有肉菜的伙食，深感毛泽东视军队为命根子的奥妙。

因此，农村青年把报名参军看做是「鲤鱼跳龙门」，如同脱离苦海登上天堂一般。毛泽东有可靠的枪杆子，实行铁血统治，可以把任何反抗消灭在摇篮之中，即使全国饿殍遍地，也未能发生历史上常见的大规模饥民暴动和农民起义，大饥荒的全面真相被隐藏的严严实实，至今不为世界所知，保障了极权专制的延续。

—— 原载 世界日报
Monday, December 20,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跃进期间浙江大饥荒

杨继绳

有一条江横穿浙江省，上游称为新安江，中游称为富春江，下游称为钱塘江。这三条江首尾相连，却弯成一个“之”字，所以称为浙江。浙江省是一个沿海省份，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气候温湿，自然条件好，加上这里的人民勤劳而富有韧性，有很强的奋斗精神，有经商的习惯和头脑。因此，这里是中国的富煦之地。但是，在 1958 年以后的三年间，这里的农民也饱受饥饿的折磨，经历了历史上一次重大曲折。

一、从农民口中夺粮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面积不到一亩。新中国成立以前，浙江是个缺粮省，据国民党有关记载的材料，每年要从外省调进 2 亿到 5 亿斤粮食。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实行土地改革，粮食比建国前多了一些，但是，不仅没有粮食调入，还承受了沉重的粮食征购任务。1954 年到 1955 年度征购了 51.24 亿斤粮食，1955 年春出现了“人人谈粮食，户户等统销”、“人叫，猪叫，牛叫”的紧张局面。1956 年到 1957 粮食年度，又因征购过多，使得 1957 年春

天，余姚、上虞、慈溪、桐乡、金华、仙居等县发生了闹粮事件，垮掉了一部分合作社。

到了大跃进年代，征过头粮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也与浮夸风有关。1958 年，上报粮食产量为 320 亿斤（实际产量为 142.1 亿斤），1958－1959 粮食年度，开始省里向中央认购 58 亿斤，后落实征购任务为 48 亿斤，到 1959 年 4 月 20 日，实际征购 57 亿零 6 百万斤（其中本省销售 37.6 亿斤，纯上调 10 亿斤）。尽管大幅度超额完成了任务，但中央 20 日给浙江电报称，“为了支援上海和出口粮食，浙江除完成 58 年上调粮食 10 亿斤外，现又增加 1.4 亿斤”。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中央表示：“省委研究坚决支持这一措施，同意分别在五、六月份调出。”

粮食部的数字和江华说的数字略有差异，但明确地反映，大跃进以来，浙江粮食连年减产，1961 年的产量只有 1957 年的 86％。详见表 9-1。

表 9－1　1957－1961 年浙江省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45.00	157.00	155.00	129．00	125．00
贸易粮	126．09	136．52	134．78	112．17	108．70
征购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销售	34.48	42．23	43.81	31．66	26．90
净拥有	118．16	131．06	125．33	110．84	102．63
总人口（万人）	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人均净拥有（斤）	472.02	511.25	482.35	423.55	385．36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 1962 年 8 月 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浙江》。

表 9-1 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其中，口粮大约占三分之二。如，1958－1959 年度，人均净拥有 511.25 斤，其中口粮大约为 340 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粮以后，农民平均有 300 斤就不错了。再经过一层一层地尅扣，吃到农民嘴里的远远低于 300 斤了。

1959 年春天，全省各地出现了粮荒。据安吉等 11 个县调查，每天口粮不到 12 两的（即 0.75 斤）占用膳人口的 50％以上，其中安吉县占 80％以上，兰溪、桐庐占 70－80％，建德、吴兴、义乌、龙游、占 60－70％，诸暨、天台、浦江、桐乡占 50－60％。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 224 个食堂有 168 个停伙，病人大量增加。天井生产队社员孙本根、受荣生产队社员汪明发，因断粮，病势加剧而死。省粮食厅反映，有些地区粮食紧张，表现在：1，食堂断粮停伙，吃麸皮、糠饼、草子、野菜等；2，摘青吃青情况严重；3，排队抢购副食品。安吉县 5 月 1 日到 7 日，全县 193 个生产队中，有 87 个生产队的食堂断粮停伙。农民上山下地掘笋、拔野菜、吃青蚕豆的情况相当普遍。群众因吃代食品过多因而引起脸脚浮肿、泻肚子、中毒等现象。据 5 月上旬 10 天的统计，已死亡 50 多人。上于县东关公社从 5 月 16 日开始有 6

个大队 62 个食堂断粮停伙。

1959 到 1960 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为 58.12 亿斤，统销指标为 40.12 亿斤，扣除本省统销数，纯上调粮食任务为 18 亿斤。这个任务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80％，比上一年实际增加了 58％。任务一下达，各级干部态度坚决，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从 1959 年 10 月 1 日到 12 月 7 日，只用 67 天时间，全省就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破了历年征购工作一定要跨年度的常规。到 1960 年 2 月 10 日，共征购入库粮食 59 亿零 2 百万斤（最后统计实绩为 60.2 亿斤）。与此相对应的是，省内销售量到 1960 年 2 月 10 日止只有 24.82 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1.66 亿斤（最后统计数为 47 亿斤）。为什么能完成得这么好呢？“在粮食登场后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四快、四边”，这里说的“四快”是指收、打、晒、运四个环节要快，“四边”是指边收，边打，边晒，边运，及时入库。更为重要的是，“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去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批判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揭穿和打击退地主富农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行为……插红旗，立标兵，掀起学、赶、超、帮的群众运动，组织粮食入库高潮，一鼓作气，短期内把粮食起来。”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其所以能完成任务，采取了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了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批评、处分了一批干部。为什么销售粮食比上一年度减少呢？“减少的主要办法是对产粮缺粮队实行增产抵消”，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征了过头粮，过去要靠“返销”来解决，现在不“返销”，靠生产队自己增产来解决。

1961 年春天，更严重的粮荒又来了。温岭、黄岩、平湖、嘉兴、兰溪、余姚、新登等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这些情况下面再作介绍。

1960－1961 年度，严重的饥荒使省里不得不总结前两年“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教训。当时算了一笔帐：1955－1957 年度上调粮食 23.98 亿斤，而 1958－1960 年度上调了 33.59 亿斤。浙江省粮食征购任务占总产量 30％左右比较适当，1958 年这个比重为 40.9％，1959 年达 43.2％。23 个重点产粮县 1957 年每亩平均负担为 220 斤，1958 年达 260 斤，1959 年达 290 斤。结果，“得虚名落实祸”。因此，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 50 亿斤，统销 36 亿斤，纯上交 14 亿斤。但口粮还是很紧张，如果把农村口粮恢复到 1955 年的水平，全省不仅不能完成中央的上调任务，还要调入 11.31 亿斤，如果口粮水平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全省要调入 1.08 亿斤，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1961－1962 年度，征购任务为 45.8 亿斤，统销指标为 34.5 亿斤，纯调出 11.3 亿斤。同时动员 30 万吃供应粮的城镇人口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一年浙江灾害严重，征购任务调整 43.7 亿斤。扣除本省销售外，这一年上调中央 9.6 亿斤，计划外支援四川省 2100 万斤。在这一年中，虽然城乡供应是紧张的，部分农村曾发生逃荒、破产渡荒的现象，但情况经上一年好一些。

这里引用的浙江省粮食部门的数字和表 9-1 中国家粮食部的数字略有差异。可能是原粮和贸易粮换算的误差，也可能是生产年度的粮食年度的误差。我把两种数字都列在这里，供今后专家研究。

从表 9-1 中粮食部的征购和销售数字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年都是征购数大于销售数，即每年向省外净调出粮食，而且净调出粮食数年年增加 1961 年，浙江省委办公厅对嘉兴、海宁、嘉善等 17 个重点粮食县进行了调查，写出了 17 份调查报告。本书作者将 17 个县的数字综合于表 9－2 中。从表中可以看出，除温州每年调进粮食、绍兴部分年度调进粮食、衢县、

海宁县个别年份少量调进粮食以外，其余各县在这些年间都是大量调出粮食，而且调出粮食不断增加。因此，这些鱼米之乡不仅“低标准，瓜菜代”，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民外出逃荒，浮肿病、青紫病等营养不良性疾病大量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有出现。温岭县 1959 年是个平常年景，但在“入库高速度，队队满堂红”的口号下，征购入库强调“先下手为强”，征购数占总产量的 47.4%，把农民推入了饥饿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1959 年下半年到 1960 年上半年外流人口 2800 多人，浮肿病人达 8698 人。其它县也有类似温岭的情况。

表 9－2　　浙江省主要产粮县调出粮食数　　　　　　单位：万斤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嘉兴	13593	19574	15055	16943	14135	19764
海宁	－206	3686	3855	5487	6794	6370
嘉善	6477	11823	9107	14145	11131	6976
宁波	5662	10310	9387	7334	13033	7132
余姚	10910	10298	9214	9854	7284	5546
上虞	6373	3795	2514	4606	3866	3231
绍兴	－489	742	－1076	－604	－2748	2709
诸暨	7678	13818	9832	8815	11754	11329
奉化	5219	2318	4947	6848	6575	4749
衢县	2422	1140	－415	1577	－183	4154
兰溪	180	697	2103	1850	3130	2325
温州	－8071	－9125	－11611	－8744	－7894	－6791
瑞安	4476	1611	4163	7246	6738	6658
温岭	8554	7407	6047	13206	13820	9035
黄岩	1771	6907	6800	8079	8120	6729
临海	7319	2558	6102	6143	6538	5028
金华	2435	2459	3056	3812	2869	3212

资料来源：《重点粮产县粮食情况调查》（之一到之十七）

一般说来，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大面积的、持久的饥荒。浙江省是一个有商业传统的地方。在刚刚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这里还有着活跃的农村集市。当时，浙江省农村市场集中于大、中、小三种集镇。大集镇（包括县城），人口 1 万左右或 1 万以上，这里大都有国营商业，私人工商业在三百家以上，这是农村的经济中心，这样的集镇全省有 70 多个。如杭县的临平、塘溪，萧山的临浦，余姚的周行。中集镇私人工商业有一二百户，如杭县的乔司、三墩、瓶窑，余姚的天元。小集镇有数十户私营商业户，分布在广大农村。那时合作社（供销社的前身）兴办不久，在大集镇还不能与私营商业竞争。1953 年，大集镇上合作社所占的比重很低（临平占 33.2%，临浦占 24.48%，路桥占 20.54%），中集镇占 50%左右，小集镇占 70%左右。农村商业集市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私人商业所占有。在大集镇，私人商业的资金数倍于合作社。详见表 9-3。

表 9-3 1954 年初浙江私营商业和合作社的资金状况　　单位：亿元

	大集镇	中集镇	小集镇

临平　临浦　路桥　天元　桥司　戴村　亭趾
私商 46．8 28．1 25．2 5．4 6．6 2．2 1．9
合作社 14．4 4．4 2．8 4．5 5．0 2．6

资资资料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农村市场基本情况调查》，1954 年 3 月 18 日。

这份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调查报告，实际上是省合作社组织撰写的。他们搞这个调的目的是为了和私商进行斗争，为了用公有商业取代私有商业。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私商大幅度减少。经过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商基本消灭，再经过 1958 年大跃进，不仅没有私商，连商品经济也没有了。本来十分活跃的浙江农村经济也变成了一潭死水。农民完全被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再没有其它生路。

二、江华紧跟毛泽东

“共产风”不是群众中自发地刮起来的，而是来自上面。像全国其它各地一样，1958 年中共浙江省委也吹响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对毛泽东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紧、非常快的。1956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反对这个估计，但事隔不到一年，在 1957 年 9、10 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经讨论，就一人断然推翻了这个估计，独自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7 年 12 月 9 日，江华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 12 月 17 日看到了这个报告，于凌晨 2 时给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请于今日上午 8、9 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 7 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 1 时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事后，他又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报告，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者按强调“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江华的报告为什么引起毛泽如此高度重视呢？主要是这一段话：“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独自一人推翻中共“八大”决议以后，第一个响应、并较系统阐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华。

在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浙江也不落后，这一伟大的进军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与收缩的较量中开始的。1955 年，浙江省农业集体化过急过快，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引发了农民的抵抗，“仙居事件”影响最大。1955 年 4 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对浙江省的合作社采取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从 53000 个合作社中解散了 15000 个。毛泽东对此十分震怒，说这是“胜利吓昏了头脑”、“犯出右的错误”。据说浙江省委当时就批评了中央

农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泽东表扬“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是正确的”。1955 年 9 月 13 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发文向浙江作检讨，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这说明，在合作化一场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这无疑会加强浙江省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信心和决心。
浙江省委不仅在 1958 年大讲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在“大跃进”失败后的 1960 年，在农民处于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浙江省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还吹得很响。

1960 年 3 月 3 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以《高速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灵魂》为题，向全省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作报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气，向听众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个世界、两个体系存在。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客观事实，连瞎子也会看到。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一切都要贯穿着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要不断地进行改造，用不断革命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一种是停止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巩固一个时期是可以的，长期巩固或永久巩固是不行的，那是违背马列主义辨证法的。社会主义建成了，还要不断前进。第二种是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不满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把共产主义建成为止。第三种是把社会主义开倒车。在这三种思想中，我赞成第二种，要不断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1953 年，毛泽东在北京批评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过渡。1960 年，江华在杭州批评了‘巩固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这大概是对毛泽东的“紧跟”和“活学活用”吧。就在江华高呼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前后，各地饥饿的报告频频送向浙江省委。

1960 年 3 月 21 日，在大华新大厅，江华在向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中说：

人民公社一定要过渡，不过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国家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这两种经济基础长期并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必须把这两种所有制向单一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怎么过渡？江华说：“第一步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变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厂一样。”鉴于“共产风”带来的灾难，江华要求县委书记们不能急于过渡，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创造过渡条件，并且开出了过渡的时间表：“第一步过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时间，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华在这次讲话中再三强调，要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面临着“谁战胜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我们的目标，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在这场斗争中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下中农包括新的、老的），团结经过改造的富裕中农。现在地主、富农在大多数地方搞臭了，现在就是中农，特别是富裕

中农（包括老的新的），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抵触情绪。我们要团结中农里面大多数经过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愿意改造的少数中农，特别是上中农”。他要求县委书记：“你们回去查一查，每个生产队，是不是贫农占优势？是贫雇农当家还是富裕中农当家？”他还要求县委书记们要敢于改造自然，他举例说：“四川有一种茅草和麦子交配，一个麦穗长 1500 粒。牛和猪交配，生下猪来就是几十斤。”

省委领导人旗帜鲜明的讲话，党报党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宣传，使浙江省的“共产风”连年不断。自 1958 年以来，浙江省较大的“共产风”刮了三次。第一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以前。当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热衷于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现了大量的“一平二调”。郑州会议以后，根据中央精神，批判了“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但长期灌输造成的共产主义情结很深，1959 年下半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又刮起了第二次“共产风”，以办水利工程、大办畜牧场、大办社队工业的名义，再次大搞“一平二调”。1960 年，为了“加快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种行为可以从上面引用的江华讲话中找到理论根据），大力发展公社经济，提高公社的经济实力，又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粮食、现金和物资。据 1961 年 3 月统计，公社化以来，全省一平二调的总金额共达 20184.8 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被无偿“调去”36 元多。平调的有土地、劳动力、耕牛、房屋、家具、炊具、现金等。当时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平均不过几十元，36 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调去”的不仅是当年农民的收入，还把农民过去的家底也调走了。这里说的“调”实际就是掠夺。这种掠夺，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浙江省“吃饭不要钱”是靠“大辩论”推动的。建德县大洋公社卫星生产队地处山区，只有 154 户、695 人。1958 年，“由于粮食大丰收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以后，广大群众思想觉悟大提高，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纷纷要求实行吃饭不要钱。但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存在着右倾保守情绪，他们对粮食估产过低，认为吃饭不要钱没有条件。”生产队党支部根据公社党委指示，及时引导群众开展辩论。“在辩论中极大部分社员拥护吃饭不要钱，但也遇到少数社员（主要是富裕农民）的反对。通过辩论，驳倒了富裕农民反对吃饭不要钱的种种论调，不仅在两天内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一致拥护吃饭不要钱。经过公社党委的批准，立即宣布吃饭不要钱。”

共产主义强调有计划的生产，而“周密的计划”必须指挥权高度集中。生产上的瞎指挥是生产指挥权高度集中的必然产物。像全国各地一样，自 1958 年以来，生产上的瞎指挥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浙江省农村干部打骂农民，扣饭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农民和处境十分悲惨。平湖县新埭公社黎明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自称“小皇帝”，他和生产队长、副支书三人随意吊打、捆绑农民、不给饭吃、任意扣罚、抄家。据不完全统计，仅 1959 年被他们处以打、吊、跪、关、冻、扣、罚、改造、没收、抄家，不给饭吃的有 91 起，有的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1959 年夏季社员没有口粮，他们却向上级谎报有粮食，还挨户搜查，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没收。因而饿死 30 多人。

温州地区永强公社 1959 年 11 月 3 日至 10 日，在群众大会上重点批判了 63 人。其中，被戴高帽游街的 2　人，罚跪的 14 人，被捆打的 9 人，被吊的 12 人。该社永新大队总支书记韩某，将买卖 500 斤蕃薯的一个妇女戴上四顶高帽，帽上写着“套购蕃薯 500 斤在轮船码头上挂了牌，叫她自己敲锣，叫她女儿在一旁喊：“我母亲套购蕃薯 500 斤，大家不要学她样。”金化地区兰溪县游埠公社万善大队确定了 24 个批判对象，其中 7 个是富裕中农，其余是贫下中农。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1959 年 10 月 24 日到 11 月 1 日，共开了 11 次斗争会，

被斗争的 20 人当中，罚跪的 16 人，被打的 4 人，受伤的 3 人。这个大队 10 月 13 日在清路召开了四个生产队的斗争大会，将 12 个斗争对象排列跪在两条长凳上，举起双手，从开始一直跪到结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遥枪托打手臂，从凳上跌下来民兵就用枪托打屁股。南山生产队毛岩林（中农），因年纪大，从凳上跌下四五次，被打后罚跪 7 个小时，身受重伤。这个大队干部卢某、蔡某指使生产队干部对 13 小队的 24 户社员逐户搜查，翻箱倒柜，共搜走粮食 1800 多斤。

浙江省的反右倾斗争也是很积极的，曾经揪出了“沙、杨、彭”反党集团。沙即沙文汉，杨即杨思一，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负责干部。

三、鱼米之乡的饿殍

“共产风”破坏了生产力，高征购拿走了农民的粮食。上级农民留下的口粮已经不多了，到了公社，还要层层尅扣。安吉县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粮时，公社从 11 个生产队的供应数中扣留了 35459 斤，到余庄生产队，又扣了 4800 斤。

从 1959 年春天开始，全省各地的饥荒报告频频送到省委。1959 年 5 月 25 日，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两个材料：

《安吉等县口粮情况的调查》称：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 224 个食堂，已有 168 个停伙，占 75%。全社生病的 1042 人，已死亡 35 人。建德县农村食堂吃饭人数 263000 多人，据 5 月 10 日统计，每人每天用粮食 12 两（16 进位，12 两即 0．75 斤）以下的占 55%；8 两（即 0．5 斤）以下的占 11%。大同公社上马大队 5 月 9 日到 11 日，断粮 3 天。龙游县在农村食堂吃饭的共有 20 万零 6 千人。平均每人每天用粮 12 两以下的占 70．7%，8 两以下的占 2．8%；海宁县澉浦公社从春耕生产开始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吃到 4 两稀饭，许多食堂停伙，有的食堂已经散伙。

《有些地区粮食很紧张》说，省粮食厅反映：长兴县虹溪公社 28 个生产队有 27 个因断粮停伙，社员以麸皮、草籽、野菜充饥。平湖县 100 多个食堂每天只有大米 6 两（即 0．375 斤），91 个食堂无法开饭。余姚县的横河、郎下、低塘、四明、环城五个公社口粮很紧，全县吃青 3300 亩。部分社员上山挖葛藤根吃。安吉县 5 月 1 日到 7 日全县 193 个生产队中，有 87 个生产队食堂断粮停伙。据 5 月上旬 10 天的统计，全县已死亡 50 多人。据南湖、安城、递铺三个公社的统计，患病者有 3047 人，占总人数的 4．2%。嘉兴县部分生产队断粮，陶庄公社南王、火星生产队断粮。上虞县东关公社 5 月 16 日开始有 6 个大队 62 个食堂断粮。历海公社 5 月 17 日有 26 个生产队断粮。

在浙江省档案馆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

1959 年 5 月 25 日，金华专员公署报告，据兰溪、浦江、义乌、金华、桐庐五个县统计，发生大量浮肿病人，仅兰溪县 4 月分就发生 41135 人。

1959 年 6 月 7 日，嘉兴专区安吉县南湖浮肿病报告，5 月 10 日最高发病人数为 1126 人，占总人口的 4.86%。病情为脚部麻木，全身疲乏无力，以后发展到足背浮肿，二、三天后逐渐肿至膝部，严重的肿至大腿及腹部，甚至产生腹水。

1959 年 7 月 26 日，金华专署卫生科报告，建德县浮肿病人大量发生。

1959 年 8 月 4 日，景县卫生科报告，据对四个重点村调查了 338 人，其中有 176 人有浮肿病，有病者占调查人总数的 52.07％。

1959 年 8 月 9 日 24 时，瑞安县人民委员会电报称：我县南田、学口、大学、珊溪、黄坦王壶等公社，浮肿病大量发生。仅据南田、学口、大学、珊溪四个公社不完全统计，已有 4800 例。

1959 年 8 月 18 日，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称，近来，瑞安、景宁、平阳等县发生大量浮肿病，其中瑞安县 8 月 24 日统计，就有 10985 人。

1960 年 3 月 30 日，黄岩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人 2263 人，死亡 4 人。主要发生在新桥、三甲、全清天个公社 13 个生产队。

1960 年 5 月 20 日，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称：从 4 月上旬以来，我县开始发现浮肿病人，据 6 个公社上报数统计，共有 1072 名病人。

1960 年 6 月 4 日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中说，据 1－5 月份统计，浮肿病发生人数为 11873 人。

除浮肿病以外，浙江省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肠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状，卫生单位认为，这是由于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亚硝酸盐中毒，使正常的血红蛋白变成了高铁血红蛋白。1958 年到 1959 年均有发生，1960 年突然升高。1960 年 3 月 1 日以来，全省 27 个县市的 188 个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发病人数有 11762 人，死亡 365 人。其中金华地区最为严重，发病的有 11 个县 79 个公社，病人 6809 人，死亡 233 人。这个专区的兰溪县 8 个公社中就有 7 个公社发病 3869 人，死亡 131 人。发病和死亡的多是 15 岁以下儿童。另据兰溪县游埠公社调查，全社 76 个生产队有 68 个生产队发现病人，从 3 月 2 日到 24 日，18 天当中，共发现 1120 例（不包括再发病人），死亡多人。

没有粮食，各级政府号召农民吃代食品。组织农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县青山公社大里生产队 1960 年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又多卖了 3 万多斤粮食。就"书记动手，干部带头，老农为师，大搞群众运动，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 92000 多斤"。葛藤、郎鸡根、野苧麻根、金刚刺都成了很好的食品。1961 年 12 月，江山县搞了番薯藤叶、橡子等代食品二万二千五百多担。

1960 年 5 月 10 日，林乎加在黄岩召开的"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讲到，落后队有几个特征，这就是；病、饿、流、荒、坏、官。病：根据系统 29 个县的极不完全统计，从 3 月 1 日到 4 月底，生浮肿病的有 72600 多人，死亡 270 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芜。坏：是指坏干部当道。官：是指官僚主义。所谓落后队，并不是个别的，据路桥镇调查，占生产大队总数 35.5％。林乎加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反动势力复辟"，归罪于"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统治势力还没有摧毁"。他的这一看法和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看法相似。不过，林乎加这种法比毛泽东早了半年多。

虽然有饥荒，但浙江省还算比较轻的省份，饿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我们还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统计资料作些研究。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 1959-1961 年的三年中，历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 3.85 万、6.68 万和 1.37 万，合计为 11.9 万。另外，根据同书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进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约为 113.14 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的数据，用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的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10.77 万人，少出生 105.17 万人。大饥荒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为二者之和，即 116 万人。

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浙江省衢县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原来是万田乡的一个自然村，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人均耕地 1.4 亩，高于平均水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个富庶丰足之地。1953 年这里有两个互助组，1954 年，两个互助组发展为两个初级农业社。1955 年，这两个初级社在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平均每人口粮 650 斤，每个劳动日分红 1.2 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红和家庭副业收入）。

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从 1956 年以后，很快进入贫困，进入饥荒，而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

问题是从 1956 年成立高级社开始的。当时，这两个初级社和万田乡的其它 12 个初级社合并为 1116 户的高级社（一乡一社），称为胜利高级社。开始，炉头的农民认为自己的收水平较高，与其它初级社合并要吃亏，不愿意合并。但上级领导认为“合作社愈大愈优越”，逼炉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在炉头河滩上筑了一道防洪坝，故意在炉头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威胁炉头：“不参加大社，管叫炉头村变成炉头滩！”炉头被迫参加大社以后，就来了一个土地大调整，上百亩好的水田被调出。在年终分配时搞“穷富拉平”，炉头农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农民说：“泥鳅黄鳝一样长，多产不多吃，多做不多分，还有什么劲头搞生产！”

面对社员生产积极因素不断下降情况，高级社的领导人不分析原因，不纠正平均主义的错误，却期望用高压的手段来提高生产积极性。1957 年整风之后，他们制定了《胜利高级社劳动纪律》，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必须做多少工分，只能超过，不能短少。要服从领导，听众指挥，农活不合干部标准的一律返工。不经组长或队长批准，不得外出。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分配的要罚款或扣除口粮。从此，干部不仅掌握了社员的劳动权，还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

1958 年 8 月，县委又在这里重点试办“共产主义公社”，又把周围的 5 个高级社合并了进来，组成了一个 1639 户，长 12 里、宽 7 里的大核算单位。10 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来的“共产主义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万田生产大队。这一年自留地归公了，社员家庭饲养的猪、蜜蜂等都归公了，做饭的锅收去大炼钢铁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劳动力大调动，土地大调动，农具大调动，房屋大调动，社员说，这一年是真正的“共产年”。主要劳动力都调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当时还大搞“吃饭不要钱”，其它生产队来吃，小学生来吃，中学生来吃，过路人来吃，从 1958 年 10 月到 1959 年 3 月，整整吃了五个月。

1959 年上半年，传达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听说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养猪了，社员很高兴，有的真的养了猪。可是到了 12 月，管理区（在公社和大队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大搞千头养猪场，把社员新养的 50 多头猪全收走了。群众说：“共产党是上半年骗，下半年变”。

为了达到公社下达的出勤率指标，大队干部把社员都赶下田，让食堂把粥桶抬到田头，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头吃饭。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头才能吃到饭。在田间的人必须通宵达旦地干，下雨也不能回家。干部守在路上，见谁回家就打，连喂奶的妇女也不准回家，孩子在家里哭，妈妈在田头哭。对于不听话的社员轻则骂、扣饭，重则吊打，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管理区私设的监狱，先后关押了 200 多人。

1960 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温低，不是谷种烂了就是秧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还是荒了 100 多亩田。仅这一项炉头就损失稻谷两万多斤。原来炉头的 100 多亩番薯是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那里的土质适宜番薯生长，管理区为了成片种植，硬让炉头把番薯种在东面的白塔山上，结果没有收成，损失了三万多斤番薯。管理区要求密植，还规定株距为 5×2，社员觉得太密，就改成 6×2，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发现社员没听他的话，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员的头发，狠狠地将他按在水田里，命令大家把秧拔起来重插。如果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欢迎，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1960 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从炉头抽 180 个劳动力去蒋家滩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误了收割，损失粮食 15000 多斤。

共产风，瞎指挥，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大队上报的产量数却是连年上升。1959 年，炉头大队产量实有 34 万斤，比“三包”产量 53 万斤少了 40%，大队上报的“核实产量”却是 72 万斤。年终分配时，为了掩盖谎言，让会计专门做了一个“超产粮”分配方案，把虚报的数字分配到每户的帐上，作为社员口粮。1959 年，全大队需要口粮 265800 斤，种子 33700 斤，只能卖粮 51300 斤，由于浮夸，一下子卖出了 127675 斤，还上交储备粮 5700 多斤，支援其它大队数千斤。到了 1960 年 2 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断粮。7 月夏收后，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库，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连夜收割，脱粒，连夜挑送粮库，社员得不到粮食，以致秋收后又断粮 20 多天。在断粮期间，只有下田的劳动力每天 4 两米（相当于 0.25 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给。只能以树皮、野草、树叶充饥。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活活饿死。贫农邵根福的妻子临死时还挣扎着用筷子刮着空碗，说：“给我吃点饭呀！”贫农邵双土 27 岁的妻子因为把萝卜省给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肿病死了。贫农邵石依饿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肿病，一个 4 岁的孩子得了干瘦病，双脚瘫痪了。邵石依饿死时，有人告诉大队长周某，周却说：“人多了要吃饭，多死几个就好了。”贫农邵渭才，原来是初级社社长，夫妻二人 1958 年和 1960 年先后死亡，只留下 4 个孤儿。

经过几年的折腾，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 年全大队产量 361363 斤，1960 年只有 298317 斤。社员的平均口粮由 1955 年的 650 斤，降到 1960 年的数 57 斤。

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2001 年 10 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做了 20 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

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2000 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 15.13 亿元，飞跃牌缝纫机 60%外销，出口到国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16 个国家设有 17 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集团，这家公司 2000 年销售额达 13.1 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发达赞叹不已。

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路桥镇公社共辖 31 个大队。据 1961 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岙等 11 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 35.5%。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 29%。剩下 11 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 35.5%。这 11 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

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荒的情况非常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况。如戴家大队，1960 年和 1958 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 15.3%，总收入下降了 8.5%，发生了 22 人非正常死亡。有 30 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22 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 10%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 6 个浮肿病人和 8 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 1959 年以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人员嫌疑最大。

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1960 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 14.9 元，口粮只有 255 斤。倒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 96%，平均每户倒挂 76 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了 12 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 60 多人。仅 1960 年就死了 46 人，其中 31 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亡 17 人，干瘦病死亡 14 人）。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两年来，社员卖掉 20 间房屋全部拆了，有 9 间房屋拆了一半，有 96 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
“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 1958 年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 年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 1958 年开始，“共产风”一直刮到 1960 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两个大队在 1958 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 1959 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

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 1958 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

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

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率、施肥数量、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浮夸严重。1957 年粮食减产 8%，却上报增产 10%，1958 年亩产 810 斤，上报 1440 斤，1959 年亩产 650 斤，上报 1019 斤。1959 年粮食减产 7 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 16 万多斤。
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

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有少数的患浮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

1960 年和 1956 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 32%，总产量下降了 31%。社员每户收入下降了 68%，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 31%。据 1960 年 4 月调查，有 189 人患病，占总人口的 26%，其中患浮肿病的 50 人，干瘦病的 28 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 32 人，子宫下垂的 36 人，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的 13 人。两年内死亡 88 人，占总人口的 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 75 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 24 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 12 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 8 户，结婚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1958 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 28 人，被拧耳朵的有 175 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 192 户。1960 年 1 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1960 年 7 月，13 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1960 年 10 月，社员陈小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 17 天口粮，陈已怀孕 8 个月的妻子带着 5 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

这个大队从 1949 年到 1958 年，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后，特别是 1959 年和 1960 年两年，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征购任务增加，农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吃草、吃糠、饿、病、逃，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员说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卖家具多、送儿送女多、妇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讨饭的多、偷窃多。从社员蔡庙寿的变化可见一般。蔡家公社化以前 12 口人，三个劳动力，家里生活比较殷实，大小家具齐全。1959 年春，口粮不足，为了买番薯丝吃，出卖家具五件共得 13 元：席床二件，4 元；织布机一部，4 元；铜火炉一个，3 元；铜盆一个，2 元。1959 年 9 月 11 日，大儿子蔡小玉因浮肿病死亡，留下老婆和两个小孩（一个 8 岁，一个 4 岁）。二儿子蔡小头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到了 1960 年春，全家 11 口人，没有吃的，为了到路桥买一角二分钱一斤的菜叶，一角五分钱一斤的番薯藤，再卖家具：共卖出 26 件，得 117.6 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卖光。1960 年 3 月，大媳妇带两个小孩改嫁，全家 12 口人只剩下 8 人。

从 1959 年到 1961 年，为了买吃的，利丰大队有 190 户（占总户数的 87％）变卖了家具、农具、衣服，有 51 户（占总户数的 23％）拆房子卖砖、木料。

表一 1931—1934 年江苏省江阴县农村人口贫富死亡率（千分比）

1、普通死亡率

年 度 富有者 安舒者 贫穷者 总 计

1931—1932 26.5 39.6 45.6 42.8

1932—1933 32.3 31.0 39.6 36.1

1933—1934 33.9 49.3 56.0 52.0

1931—1934 平均 30.9 39.9 47.4 ——

2、婴儿死亡率

年 度 富有者 安舒者 贫穷者 总计

1931—1932 161．3 219．8 198．2 203．4

1932—1933 275．9 240．2 239．2 241．8

1933—1934 379．3 373．5 403．4 309．3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1936 年）。

野草注：之所以选择 1931—1934 年的该地资料，原因在于手头没有全国性的资料（恐怕以当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调查），而该地在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

1933 年富裕的苏南农村的死亡率，比解放后最困难的 1960 年的全国农村（包括广大内地和西部，且被右派称为大饥荒年）平均死亡率高出近一倍。1931-1934 年苏南农村平均死亡率比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正常年景的全国农村平均死亡率高出三倍，比七十年代高出 6 倍。

读者推荐　　转载请注明出处

Monday, January 17, 2011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关于爷爷的想象以及其他

风落雪影

1958 年 7 月初四，赣北庐山脚下的某个小村里，出生了一个男婴。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让他年轻的父母激动甚至惶恐不已——他们不大知道如何为人父母，他们太年轻了。然而激动还没有过去，不安便完全笼罩着他们。自从那股风刮起来之后，家里基本没什么粮食了。8 个月后，这个年轻的男人，抛下了他美丽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用了一种最古老的方式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上吊自杀了。

小时候，奶奶总是无限伤感地跟我说：“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爸！”我是长孙，很早就听着奶奶这样的自责，我甚至是在她这样沉重的自责声中长大的。听奶奶说，爷爷的俊美在那个时候是远近闻名的，这点我也从不少与爷爷同辈的老人那里得到了证实，同时得到证实的还有奶奶年轻时的美丽。那是一个穿上绿军装出去转一圈，就能让所有女孩心神不宁的时代，所以，爷爷因招兵还去过南京的故事还颇为流传。在一辈子的活动范围都不会超过方圆 50 公里、上县城回来都会被尊敬的村民看来，南京——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我对爷爷的想象，一直是非常纯粹的，这是因为爷爷在奶奶心里，已经成了一个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符号了。奶奶可能永远也不明白，那决不是她的错。多少年来，她的心里一直承受着这样沉重的负荷：她以为是自己逼死了爷爷。在那个荒诞的岁月里，成为父亲的那个年轻男人成天空着肚子负重。终于有一天，背着妻子，偷吃了瓦罐里炖着的稀饭——那是妻子炖给他们才几个月大的孩子的。被发现是很自然的事情，妻子看着空空的瓦罐，绝望、悲痛与怨恨的混合物充斥心里：“你吃了去死哦！”第二天，妻子惊恐地发现了悬在草绳上的他——他早已打算“吃了去死”！我现在，真的无法想象奶奶当时的痛苦，丈夫的离世让她几近崩溃，我无法想象奶奶是怎么度过那段木然的日子的。奶奶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要不是实在不放心幼小的父亲，她肯定会随爷爷而去了。

当然，奶奶并不知道，孩子出生之后一年的 1959 年的 7 月 14 日晚，就在家后面那座高高的山上，彭德怀在史称“庐山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交给毛泽东一封信，讲出了实情，但被毛泽东认为是“忤逆”，16 日断然中断了刚刚启动的对“左”的修正，转而全面“反右”。奶奶也并不知道，就在父亲出生前两个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次会议将“大跃进”真正地发动了，谎言充满了“神”州大地。但是，这其实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而仅是表象所在。问题在于，解放初期分下来的田地两三年之后又被收回，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听从拥有土地的“国家”命令，不仅土地，这个“国家”掌控了一切社会资源，甚至其子民的人身自由——村民要外地，需要证明，无论出省出县出乡，甚至出村都需要向生产队长请假。这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由列宁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传统皇权专制形成的混合体——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国家”拥有对全部社会资源的绝对配置权。当时的情况正如刘少奇所说那样：国家需要的粮食，同农民愿意交的粮食有着尖锐的矛盾，连年的政治运动使得粮食总量缺口极大。由于工业化以及国防的需要，必须先满足工人与军队，当然，还要满足“金字塔”上层的奢侈，农民只能挨饿。挨饿的人同时也失去了出去乞讨的权利，被抓回来往往会被打死——当一个以“国家”名义号令天下的政府形成极权体制时，农民失去了所有的生存资源，甚至求生的权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死。这的确是一个恐怖的时期，在新华社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统计，1958 年到 1962 年间，全国饿死人数为 3600 万，远远超过一战全世界死亡人数 1000 多万，接近二战全世界死亡人数 4000 多万。这，不是天灾，决不是。吴敬琏一听到电视里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提法就骂娘，这的确是一个有良心的学者。

奥威尔曾在他的《英国式谋杀的衰落》里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经典的谋杀往往发生在一个秩序比较稳定的社会，一个“被伪善左右”的社会。我想这个写过《一九八四》的家伙的确是一个深刻得令“稳定”社会厌烦的人，但如果这个稳定的社会继续异化，成为一个超刚性的极权社会时，情况会怎么样？答案在汉娜阿伦特所提到的三个典型极权社会形态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斯大林在国内的大清洗，毛时期的大阳谋与大饥荒——这样的谋杀不

再是单个的，而是体制性的。权威主义体制下，我们可能一起去做一件好事，也可能一起去做一件坏事，显然，这是真正的可怕。

对于现实中的问题，我们总是寄希望于那些掌握资源的人："他们知道！"、"慢慢会好的"。我们总是愿意逆来顺受，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知道"，所以只会"慢慢变坏的"，改变，不过是狼换成了牧人，而牧人总是比狼聪明的，我们，终究还是羊。我们最好的心态似乎就只是吃着自己的草，否则，只会被体制碾得粉身碎骨。但事实上，指望"翻然悔悟"这种感觉的普遍来临，是最不靠谱的，他们手里的资源让他们觉得历史是必然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历史决定的，具有历史天然的合法性。然而，历史，其实绝对不是必然的，××党夺取政权不是必然，共产主义也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更不必然会现实。1921 年，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范围只有 57 人，有多少人认为他们会必然夺取这个国家的政权？哈维尔，在"布拉格之春"之后只是极少数异见人士之一，与他和昆德拉同为捷克文学"三驾马车"的伊凡•克里玛甚至失去工作，不得不长期做着清洁工，谁能想"天鹅绒革命"之后，在 1993 年哈维尔成为了捷克总统？那些垄断信息、控制规则的人，其实真的不应该自负地认为自己就掌握了历史的绝对真理，在历史面前，还是应该谦卑一点好。在《难以预知的历史》（2009 年 10 月 31 日《世界报》）一文里，哈维尔说得好：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马克思曾说，历史是每一个人的历史。在难以预知的历史面前，我们真的不应对其冷眼旁观，参与对自身历史的变革，是人人都应该有的担当。

事情可以掩盖一时，但罪恶不应被遗忘。对祖辈父辈身上痛苦的旁观与冷漠，代价终将是自己惨淡的现实人生。现实在经济正确的巨大麻痹下，令人心生一丝悲凉。历史，真的是不可预知的么？

—— 原载 作者博客
Friday, April 15, 2011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检讨

王达夫
（原中共信阳地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信阳地区行署专员）

我以十分严重的心情来检讨信阳事件中所犯的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我坚决拥护中央、中南局和省委对信阳事件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我坚决拥护省委、地委对我的停职反省决定。我完全接受广大干部对我的错误事实揭发与批判。我十分感激地委和全党同志对我所采取的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我愉快的解释党给我的宽大处分决定。

关于我在信阳事件中的责任和主要错误事实检讨如下：

一、我在信阳事件中应负重大责任的。

信阳事件是一九五九年冬和 1960 年春发生的。这个事件的程度是十分凄惨的、痛心的，这是历史罕见的，这给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与恶果是不可估量的。（1）十分痛心的是葬送了大批阶级兄弟的宝贵生命，由于饿死、打死人的地区广、时间长、程度严重，不少公社、大队村庄，死亡人数占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比例；特别是许多村庄和许多户，成庄成户的死绝，致使死人无人埋、人食人现象的发生，造成老者无儿女，壮者无夫妇，幼者无父母。这种凄惨情况是目不忍睹的。难以忍视，忍目的，这一损失也是难以弥补的。（2）由于事件严重不仅丧失了大批劳动力，而且也严重地摧残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在全区范围内的浮肿病、妇女闭经等各种疾病发生，严重的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育。（3）在人民生活上，造成了严重灾难，房屋严重倒塌和失修，室内十有九空，生活资料损失也大，家底十分空虚，广大社员受缺吃缺穿缺住之苦。（4）生产元气遭受到严重破坏，由于天灾人祸（主要是人祸）严重，不仅丧失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大牲畜死亡也是严重的。各项生产资料大量的破坏。大部分的村边、路旁、树木和山林，砍伐净光。大量良田严重荒芜，这些生产元气的破坏和损失，没有三、五年或者十年难以恢复的，这不仅直接影响和破坏了生产元气，而且也严重的破坏国民经济基础，给今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和困难。（5）在政治上损失也是严重的。在政治上不仅破坏了三面红旗、工农联盟、干群关系和毛主席的威信，而且也严重的给阶级敌人利用自然灾害困难和工作中的错误，进行疯狂的破坏留下可乘之机，他们一时兴风作浪，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破坏社会主义事业。（6）在组织上，由于以路宪文为首的原地委常委严重的错误方针政策和错误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不仅原地委成了瘫痪，而且某些县、社、大队党的组织年也成了瘫痪，甚至变了质，特别是一大批领导领导骨干迷失了方向，犯了严重错误，少数一直发展到蜕化变质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阶级的泥坑，其恶果是极大的，广大农村形势曾一度呈现，一片凄凉严重危机局面。这是我们在社会建设上打个大败仗，在阶级斗争上打个大败仗，也是在党的建设上打个大败仗，这一教训是十分严重的，深刻的，终生难忘的。

信阳地区在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〇年春的形势是十分严重危机的。信阳事件给党给人民造成的损失和恶果，与以路宪文为首和我的错误政策和错误指导思想都有直接关系的。这一事件的政治责任除路宪文外，我应负重大责任，信阳事件造成程度如此严重时间如此长，地区如此广，情况是十分凄惨的，信阳事件是以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把严重灾情当丰收，把实际问题当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特别是认为有敌人破坏，尤其是一九五九年全区广大群众处在严重饥饿情况下，而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如反瞒产、大扑杀牛和破尸体犯组织大收外流人员等）我在这些错误政策执行上，在某些问题与向路宪文提出不同意见，但路不接受之后，我不但没有坚持下去，反而积极的区执行路的一些错误措施（反瞒产、批准扑人、收外流人员），特别是发生重大死人情况时，没提到原地委常委专门讨论以制止死人，又没有积极提议或亲自报告省委，这一政治责任应由我来负的，如果我坚持原则，不支持与执行路宪文的错误方针政策，同时将死人问题交原地委常委会议讨论，采取断然措施，或报告省委

让省委早知道信阳问题，信阳地区人民也不会遭受到这样严重的摧残，也不会拖延半年之久，仍然揭不开盖子。

我是信阳人，长期在信阳地区工作，我又是地委常务书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地委常委分工，我分工主持地委常务工作，省委未批示），因此信阳造成这一极为惨痛的死人事件，我是应负重大责任的。

二、我在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〇年春，信阳事件中所犯的主要错误事实：

1、关于推广鸡公山假现场会议问题。鸡公山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安排群众生活中，搞出粮食七百万斤的经营报告（兑现三百万斤）在全区推广。实际上粮食是假的，造成恶果是极大的，这是应由我负重大责任的。鸡公山是地、县委整社重点，是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转入安排群众生活的，工作组除王秉林同志负责外，县委徐国梁也到该社去搞安排群众生活的重点，十二月上旬有一天路宪文在原地委常委办公室说：鸡公山已突开，地委召开个现场会（杨玉璞同志也在场）有教育意义，我没问怎样突开的，我认为鸡公山有粮食，我同意路宪文意见，开现场会的通知是我叫原地委办公室发的，在会议前鸡公山挖出的粮食的经验，分别在电话会议和县委农业书记会议上都作了介绍，县委会议未开前我曾叫地委办公室给鸡公山打电话，问粮食清点怎样？能不能开等，王秉林同志答复说：个别队有问题，大多数队没有问题，可以开。这样我才决心叫原地委办公室发开会通知（具体日期是十二月十七日）。会议中间，我叫办公室问下会议开的怎样？要求写个简报送地委，送来的简报主要反映会开的好，大家反映很解决问题，我阅后批语：没来参观的组织参观等。到会议末尾，听到炮校胡政委和地专直一个同志除反映好外，还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参观人员快上火车时一个老婆不叫走，提出大丰收就是没啥吃；二是参观某个队谷茓被人挤倒了发现是假的。我听了认为有问题，我又叫办公室通知停止参观，一是问下鸡公山公社这是怎么一回事？该社答复：有问题不很大。这样我又相信了，没有追根到底，直到一九六〇年元月上旬省委检查组汇报鸡公山生活安排不好，有停伙外流死人等问题，我听了后，认为问题很大，也觉得鸡公山搞出粮食有鬼了，叫办公室给鸡公山公社党委打电话，责问有问题为啥不向地委反映？ 应作检查（鸡公山党委和王秉林同志都作了检讨）。群众吃粮问题全部解决（从当时起直到接麦），鸡公山问题教训很大，恶果也是严重的。鸡公山发现问题很早，问题也很严重。如采取断然措施，鸡公山死人完全可以减少，反瞒产早会停止，全区死人问题会被正视，死人程度也会减轻；反之，而采取反瞒产假现场会等错误政策和错误措施，不仅给鸡公山造成了严重恶果和损失，也给全区造成严重恶果和损失。这个恶果是正当全区群众生活紧要关头，正需要解决粮食开伙吃饭等问题，我推广了鸡公山假现场会议这实际上是弄虚作假，混淆了是非，致使真假难辨，也是对人民等于落井下石，结果造成全区严重死人，这一损失应由我来负责的。

鸡公山假现场会的这个政治责任，应由我来负的，因为：（1）鸡公山经验不该推广，现场会不该开，同时这样重大问题，没经原地常委讨论，事后发现问题只跟路宪文说说，又没有向原地常委汇报和讨论。（2）鸡公山发现问题很早，为啥不采取积极的断然措施，而采取错误政策和错误措施呢？开头认为鸡公山有粮食闹粮，停伙外流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情况，我这个观点跟路宪文是一致的。因此对有粮食是肯定的，对会前会中发现问题半信半疑，认为就是有问题也不是主流，而有粮食则是主流，坚持一错再错，一错到底，当会后发现问题严重，只对鸡公山采取了措施，则对推广假现场会的危害和恶果没考虑，因而没有采取否定鸡公山现场会议停止推广接受这个教训，如果这样做，这个恶果的影响是可以减少或避免的。因为没有这样做，所以，我应负重大责任。（3）会前关于鸡公山搞出七百万斤粮食的经验向

省委作了报告，会后发现是假的没向省委作专题检查报告，这是向省委不反映真实情况，事后发现有问题，又没报告省委，是对省委隐瞒错误的严重行为。

2、外流人员和丢小孩的态度问题。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冬因缺粮而停伙外流、丢小孩、弃儿女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我在外流人员和丢小孩的态度上，是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但不同情，反而大肆批评别的同志的同情，我这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这是完全丧失阶级立场的严重行为。在一九五九年初冬（十一月下旬或十二月上旬）我在地专直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讲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形势的时候，举出外流人员、丢小孩统计数目和成分例子，指出外流人员原因很复杂，分为七种人：一是地富和富裕中农逃避斗争（那时正出整社高潮）；二是小商贩投机贩运；三是二流子懒汉怕劳动；四是敌人煽动的盲目外流；五是青年人不安心农村劳动，想到城市找职业；六是农村生活安排的不好；七是流窜犯。这个分析与批判是错误的，特别是我在这个报告大会上还不指名的批判一个营业员、一个路警对外流人员和丢小孩同情流泪的问题，我很严厉的批判他们说：外流人员很复杂，啥人都有调查没有？为什么哭，啥立场等。我在报告中乱发言论，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行为；二是对外流人员情况分析与批判，没有阶级立场与观点，错误判断，歪曲事实真相，混淆了两类矛盾，把生活问题当思想问题，把富裕中农问题当敌我矛盾，把现象当本质，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严重歪曲事实真相的；三是打击了好人，压制了民主，那时全区正处于严重食堂停伙断炊，人员外流，丢小孩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吃饭和生命重大问题，我不但不同情，反而还判断有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批判他们同情流泪，这正证明了他们立场稳，为人民外流、丢小孩同情流泪，我为啥不丢小孩，我为啥不调查，我为啥不同情流泪，反而还批判别人同情流泪是立场问题，我是个啥共产党员，是个啥领导，是个啥立场呢？这些言行充分暴露我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付人员外流和丢小孩的态度和立场，这是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和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我应向他们道歉认错，我应向他们学习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3、我对饿死人的态度，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的，也是对全区人民严重的犯罪行为。信阳地区死人我知道的早，情况也知道的多，我对人民生命关天的大问题不仅不采取断然措施，抢救人民生命，而且抱着无动于衷态度，只是以事论事，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没有提交原地常委讨论，又不请示报告省委，实质上是隐瞒省委的严重行为。在对待死人问题的态度上，我检讨如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王秉林、阎凤西二同志到地委汇报食堂停伙、外流和死人问题，这时我才头一次知道死人，当时认为问题不小，提出三条办法：一是给粮，食堂一律开伙；二是组织力量突击治病；三是正视死人问题，处理通报，这三个办法我与杨玉璞、雷玉俭同志商量同意后，跟路宪文商量，路不同意处理通报，还说：应接受开封教训，死人是坏事，应抓九个指头，不要抓一个指头，不要泼冷水，应从正面抓等。我怕泼冷水，怕犯右倾，当时同意了路的意见，没有坚持到底，不了了之，我这种对人民生命关天的大事情，而抱着怕泼冷水，怕犯右倾的严重个人主义错误是不能容许的。是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的道德品质是不相容的。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接到潢川双柳方仁木给我一封揭发死亡二千余人的信，我阅后，叫雷玉俭同志派工作组去检查，并叫检查同志不要转原信，不要追查谁写的主要检查情况是否属实，问题解决没有等。检查期间，县委梁德柱拒绝检查，批评检查组不应去检查死人问题，我叫雷玉俭批判梁的态度，检查后情况完全属实，地委已拨粮食，县委派人员正突击治病，认为问题已解决了，当时，只提出潢川县委检查处理，梁抗拒不检查，路宪文支持他，检查报告一直没写，盖子没揭开，方仁木受到打击陷害。我在双柳群众来信揭发死人问题上，错误是

严重的，揭发死人正是全区死人严重的时候，如果交原地委讨论，把问题报告省委，信阳地区死人问题，程度是可以大大减轻的，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把群众来信当成儿戏，不坚持党的原则，怕得罪了路宪文，怕影响团结，不支持好人好事，不向坏人坏事作斗争，把双柳死人这么大的问题不了了之，我这种态度还不如方仁木同志关心群众生命，挺身而出揭发死人问题，为人民生活呼吁，而我则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严重行为，这和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是不相容的。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南湾和出山店水库工地死人问题，那时认为是因疾病而死，没考虑到是饿死的，那时只强调解决口粮，口粮包干，管好生活，突击扑灭疫情，要求不死人，对已死人的单位只作了批评，没有采取工程停工或减少土方，对已死人的单位严肃检查处理，保证不死人等根本措施，相反的还大叫大干水利工程，开展土方翻一番运动，这不但是无动于衷，而且也是对人民生命落井下石的态度。

一九六〇年元月底，光山白雀公社给地委一封匿名信，揭发该社生活安排不好，干部说假话，并批评路宪文对农村形势，粮食多得很，食堂停伙是富裕中农进攻等分析，当时我向路宪文提出派检查组去检查，路当时还不同意，之后经商量路也同意了，我交雷玉俭同志去派员检查，没直接当面交代，也没有过问检查的情况，说了就不了了之，直到一九六〇年七月鸡公山会议时才知道原检举人受到打击陷害，我这样对人民生命不负责任，对好人好事不支持，已发展到不能容忍的程度。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信阳市付市长汇报金平小铁路工地民工生活问题，南湾灌渠工地赵子荣汇报工地民工疾病和死人问题，一九六〇年元月分省委工作组刘处长汇报鸡公山公社群众疾病外流问题。信阳县余伴勤同志汇报群众疾病问题。一九六〇年二月地委统战部周春茂同志汇报正阳同中公社死人问题等。我只采取了拨粮食，抓治病等措施，也就是以事论事的作法，还认为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没有采取根本性的断然措施，以有效的制止死人，更严重的是有的连具体措施也没采取，地委办公室刘永泰同志汇报遂平嵖岈山公社一个大队生活安排不好和死人问题，地委工作组李傑同志汇报信阳谭河公社一个大队生活安排不好和死人问题，这些我是知道的，地委把粮食已发了，当前农村主要工作是抓生活，没采取具体措施，这是对人民死亡无动于衷的表现。特别是一九六〇年元月底，专公安处把一九五九年年终死亡二十三万人的报告表送给我，我阅后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对淮滨、潢川、商城等县死亡严重的县，向县委第一书记打个电话，看县委知道否？研究没有？向地委写出检查报告；二是死亡人数应分季度，可以看出是什么时候死的；三是抓紧抓好，以便地委向省委作报告。第二天路宪文从乡下回来，我将公安处的报表和三点处理意见向路作了汇报，路表示同意三条意见，我还不放心，当日下午通知韩仁秉到地委，我向韩说：死人问题路同意你们抓紧抓好，写个材料，地委好给省委报告，我对这个人口死亡统计报告表应负的责任和主要错误：一是认为路宪文、张树潘都知道，我没向原地委常委汇报和提出措施，这是我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是隐瞒严重行为；二是没批准及时上报和报告省委，使省委早知道信阳的死人问题，避免严重死人事件的发生；三是公安处报告表不但拖延了一个多月，死亡数字由二十三万，减少到十九万多人，比原报数少了四万多人，直到一九六〇年原地委常委向省委作了一次死人报告时，是按县委七万数字报告，没按公安处年终死亡十九万人报，我虽向路宪文提出过这个死亡数字和公安处数字不符，路一再解释，死亡不（在）多少，主要是吸取教训，县委数字没减少不算隐瞒，结果我没坚持到底，同意了路的解释，还是按路宪文意见办事，这些都是我与路宪文欺骗省委作了假报告，也是严重违犯了党纪。从上述许多人口死亡的事实看，我对信阳地区死人知道的早，也是知道的最多，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冬正处在死亡关键的时候，

我没有挺身而出，采取断然措施，抢救人民的死亡，正当这个时候我怕泼冷水，怕得罪路宪文，怕犯右倾等严重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坚持党的原则，不揭死人的盖子，不支持好人好事，不交原地委常委讨论，不上报省委，甚至对死人无动于衷。我与路宪文意见，虽有分歧，但不坚持原则，丧失立场，这些都充分暴露了我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关心人民生命的大问题，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这是我蜕化变质的表现，也是我对信阳地区人民犯罪的具体表现。

4、关于在审批逮扑案件问题上，是对信阳地区广大人民专政和镇压的政策，大扑宰杀和刑事犯罪案，我是积极执行路宪文错误政策的，信阳地区在一九五九年冬是个严重缺粮、断炊停伙危机形势，把广大人民因生活所迫而宰杀耕牛、抢劫等情况，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采取了大扑措施，这些都是对人民实行专政和镇压政策，致人民于死地的严重罪过。特别是我在具体审批案件上，经我批准逮扑大批案件（批扑数清查档案），这些案件都是为生活所迫，这些人都是无辜的劳动人民，我在审批案件上缺乏对人民严肃负责的态度，没有识别真假，没有区别两类不同的矛盾。而把实际情况当思想问题，把是当非，特别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这是我对人民实行专政。特别是对审批案件上不严肃，曾有两次经我审阅后让承办人员代我签字，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这是我对信阳专区人民严重的残害行为，也是我对信阳人民严重犯罪行为。
三、我的错误的主要根源和应吸取的教训。

几年来我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也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容许的，特别是在信阳事件中我犯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恶果和损失，我所以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我家庭是一个中农成分，个人是学生出身，入伍后，虽经党的长期教育，由于个人主观，努力差，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树立，参加革命后一帆风顺，总认为个人进步快，没有错误，历次各种整风运动都是整年别人，没有整自己，在群众中虽对个人提出一些批评，个人还不虚心接受，满不在呼，这样以来，欠下了一笔政治账，在“信阳事件”中我犯的错误，就有力的证明欠政治账。一生总是要还的，老账不还，新错必犯，这是我犯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和平环境里过日子，忽视政治原则性，在反动资产阶级严重影响和侵蚀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背上了信阳地区公社、办钢铁、粮食三大包袱，骄傲自满情绪严重的滋长起来，一直发展到信阳地区广大人民正处于严重死亡关头害怕泼冷水，犯右倾不敢坚持原则，竟把这个（应加人——编者）命关天的大事既不提交原地委常务讨论，又不报告省委，这完全是个人主义占上风，这是忘了本，忘了党，忘了人民，者完全是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的道德品质，这完全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完全是站到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我已完全走上了损害党、损害阶级、损害人民、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道路，我深刻地体会到资产阶级个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骄傲必败，骄傲就是罪恶，政治账欠不得；对党必须忠诚老实，这些都是我犯错误的规律和根源。信阳事件与我个人主义严重滋长分不开的，“信阳事件”的恶果就我的个人主义滋长的恶果，我在政治上欠下了党的帐，欠下了全区人民的帐，欠下了使我一生难以还清的帐。

“信阳事件”是严重的，我的错误是严重的，血的教训是深刻的，必须虚心学习，戒骄戒躁，树立和坚定为人民服务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坚决从实际情况出发，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如实的反映实际情况，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论水平，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加强党性锻炼。

我的责任重大，错误严重，党应对我严肃处理，只有如此才能挽回党的政治影响，才能平民愤，也才能有利于我接受教训，改造自己，我保证愉快的接受党给我的处分，分配给我最低的工作，我保证积极工作，团结同志，向全党全区人民作长期的检讨认错，我完全有信心在我的后半生，在今后实际工作中吸取教训，考验自己，重新作（应为做——编者）人，改造自己。来弥补“信阳事件”的损失，因“信阳事件”严重和我的错误重大，尤其是我对个人错误认识不够之处请省委、地委指示，我决心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继续提高认识，真正吸取教训，把坏事变好事，我决心在我的后半生，用最大努力做到小错误不犯，大错误避免。

王达夫

在一九六二年检讨的基础上于一九六三年元月五日重新修正的

—— 原载 余习广的博客
Saturday, June 11, 2011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范子英
摘要：本文指出《“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中的几个问题，这些也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大饥荒的文献中争论最多的问题：（1）森的饥荒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饥荒的发生本质上是因为食物获取权的失败；（2）粮食征购率的解释在统计上可能存在问题，其解释能力可能被高估；（3）公共食堂机制可能更多反映了政策的激进程度，而公共食堂本身只是一个副产品；（4）将不同层面的解释融合在一起时可能各自混淆，集体提留与分配体制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

关键词：饥荒，食物获取权，公共食堂

作者任职于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通信地址：上海市国权路 600号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200433；E-mail ：ivannj @163.com.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发生在中国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灾难，主要是在于大面积和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基本接受非正常死亡人数在 3000 万人的水平（Ashton et al1，1984），如果以 1957 年的总人口 64653 万来计算，相当于 4.6%的人口减少是由于饥荒而造成的。1 虽然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不过其严重程度相差甚大，以相对较严重的安徽省来看，1960 年官方的死亡率数据为 68.6‰，而 1957 年的死亡率仅为 9.1‰，这意味着安徽省仅仅 1960 年每 100 人中就有 6 个人是由于食物不足而死亡，而几乎没有受到冲击的上海 1960 年的死亡率仅为 6.9‰，与正常年份相差无几，这种结构性差异对饥荒的理解非常重要。如果从饥荒大规模爆发的 1959 年起算（Peng ，1987），2 到今年刚好整整 50 年。

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由于一直没有公开相关的数据资料，3 在 80 年代之前主要还是零星的见闻和猜测。4 在 1983 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公布了 60 年代人口方面的数据，引发了大量的人口学家开始进行科学研究，因而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方面，不过由于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和方法的差异，不同研究之间差别非常大，争论也大。后来有很多华人经济学家从其他方面展开研究，对饥荒的发生原因、分布和结束提出新的见解（Yang ，1996；Chang and Wen，1997；Lin and Yang ，2000；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范子英等，2008）。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 1958—1961 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都试图在这些方面做出突破。前者从整个国家分配的视角，认为公社的集体提留过度是导致饥荒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后者则更进一步，认为伴随公社而产出的公共食堂的消费机制是主要因素，公共食堂消费的无效率和负向的激励效应导致了饥荒的发生和终结。因而，从文献视角来看，两者都对已有的研究做了很好的补充和扩展。然而大饥荒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并且由于这段历史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对于当时特定的历史制度框架的复原越来越难，因而关于饥荒的研究需要越来越仔细的推敲。如下几个问题与这两篇文章相关，需要进一步斟酌。

一、关于森的饥荒理论的适用性

1998 年的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对饥荒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与以往不一致的理论。他发现在马尔萨斯和斯密的框架下，人类历史上有很多饥荒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传统的理论都认为是食物短缺造成了饥荒的发生，如 1845—1851 年爱尔兰的“土豆饥荒”就是由于土豆产量的突然下降导致的，但是还有很多饥荒的发生并没有事先的粮食产量的减少，如 1974 年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因而森提出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饥荒发生的原因。在那本著名的《贫困与饥荒》中，他认为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 ）的丧失才是饥荒发生的本质原因，“饥饿是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即使饥饿是由于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个人交换权利下降？？饥饿‘不仅仅’依赖于食物的供给，而且还依赖于食物的‘分配’”（森，2004 年，第 1、4、8 页）。

而食物获取权又进一步划分为直接权利（direct entitlement）和贸易权利（trade entitlement），前者包括农民对自己收获的粮食的处置权，后者则更加复杂，包含了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价格体系，或者是计划经济下的配给制度。

这意味着粮食生产只可能影响到直接权利的失败，而制度和外生的冲击则会改变贸易权利，在前者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后者的巨大变化就足以导致一场饥荒，历史上也确实曾发生过。因而食物获取权是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更大的一个分析框架，任何仅考虑食物供给的观点都可能是不充分的。

食物获取权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将关注重点从食物供给转到特定群体对食物的获取能力（Devereux，2001），森在其理论中强调了对于阶层对比的重要性，某一阶层所控制食物的突然减少有可能使其面临饥荒的威胁，而从总体层面上观察到的饥荒则有可能忽略了问题的重点。例如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农业生产由于自然因素而出现波动，于是粮食相对于其他产品的价格开始上升，这对于以自身产品来交换粮食的阶层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如牧民和渔民的绝大部分消费来自于交换到的粮食，因而“如果一个职业组的产品既要供自己直接消费，又要用于交换其他食物，这个职业组就有可能同时遭受‘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森，2004 年，第 69 页）。而对于农场工人这个阶层而言，由于其本身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进而换取食物，即这一阶层只具有贸易权利，农业生产的波动会使得该阶层首先面临饥荒的威胁。

从方法论上来说，中国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并不是特例。[5] 粮食减产是必要条件，但不构成充分条件，这次大饥荒并没有打击到每一个阶层，比如上海的死亡率仅从 1956 年的 6.6‰上升到 1959 年的 7.8‰，上升幅度仅为 18.2%，而同期四川和安徽的死亡率上升幅度超过 3 倍；即使在一省内部，城市遭受的饥荒也要轻微得多，而大部分农村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因而这次饥荒的发生也仅仅是一部分人的食物获取权遭到剥夺或者降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充足的食物而死亡，并且这种剥夺是具有阶层性的。

所以在分析这次饥荒时，重要的是要弄清楚粮食减产前或者减产过程中的食物获取权序列，即在食物的分配上，那些处于食物获取权序列上最底层的人才会真正面临这次饥荒的威胁。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 1958—1961 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不具备“交换权利”，因而食物获取权的前提条件不成立，认为要扩展出政治权利，这是不正确的。首先，食物获取权理论不仅仅包含交换权利，即需要市场能够配置资源，也包含最基础的直接权利，即对自己生产的粮食具有处置权，中国 1959—1961 年饥荒的爆发主要在农村，并且产粮区的农民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这部分人群并没有太多的财产，即使存在粮食交易市场，交换权利对于饥荒的缓解作用也会非常小，饥荒的发生主要是他们的直接权利遭到剥夺，丧失了对自己生产的粮食的控制权。其次，虽然森在食物获取权分析中采用了市场制度，但后者并不是该理论的必要前提，森曾指出“市场权利甚至可以受到配给制度和票证制度的补充”（森，2004 年，第 3 页），交换权利在市场经济中可理解为价格的作用，而在计划经济中则是政府的配给制度在起作用，此时的交换权利可理解为通过政府间接地与粮食生产者交易。最后，虽然森在比较中印独立之后的情况时，提及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但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在于新闻自由，使得信息的沟通顺畅，政府能够有效避免饥荒的发生，民主制度只是食物获取权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应用而已。中国大饥荒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民更有政治声音，而在于国家的发展战略本身是有偏向的，中国大饥荒更无关于“政治权利”。因而，森的理论是提供一个概念分析框架，该框架同样适用于发生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饥荒。

食物获取权理论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公共政策上。如果是传统的饥荒理论，政府对于饥荒将束手无策，对于大部分政府而言，要在短时间内增加大量的粮食供给基本不可能。但如果我们从食物获取权来理解饥荒，即饥荒是因为一部分人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总量的食物供给不足，则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现代国家就非常重要，那些富裕国家之所以不存在饥荒，并不是就平均水平而言更加富有，而是社会保障系统对那些长期失业的人提供最低的食物获取权。就饥荒的救助而言，在无法增加可得食物的前提下，食物获取权表明绝对意义上的平均主义有可能会起作用。

二、关于征购率的变动

最早研究中国 1959—1961 年大饥荒是从粮食的征购角度来理解。Berstein 于 1984 年发表了他对于这次饥荒的系统性研究，发现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不久都经历了一场较大的饥荒，并且都是由粮食征购引起的，不过两者的具体机制是不同的。苏联革命的成功是基于城市的，对农民的政策是“对内的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从 1927 年开始政府大幅度提高粮食的征购水平，以快速地推进农村集体化，不过这种行动遭到农民的普遍抵制，特别是在 1931 年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以至于斯大林将农民的这种抵制行为理解为对苏联的战争，政府于是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于 1932 年强制性地提高粮食的征购率，对地方农民进行报复性打击。6 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在广大农民支持下取得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更加友好，并且也承诺要改进农民的福利。但是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将大量的资源从农村转移出来，对粮食实行非常高的征购率，直接导致了苏联 1932—1933 年和中国 1959—1961 年的饥荒。但是苏联提高征购率是有意而为之的，中国的征购率的提高是由于对当时情形误判造成的，过高的征购率只是提高征购量一个未预料的结果（Berstein ，1984）。7

征购率的提高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浮夸风”的影响。从 1957 年年初开始的“整风运动”慢慢转变为“反右派运动”，最后演变为“反右倾保守”运动，使得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行为保持高度的一致，甚至在很多情形下造成了下级政府的“过度”行为，这一政治运动是之后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前提条件，使得中央的任何一项政策都被放大数倍。于 1957 年 10 月正式出台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要求 5 年内人均粮食产量达到 1000 公斤，半个世纪内亩产达到 1000 公斤，在经历政治运动后，这一超前的政策并没有遭到任何反面的批评。8 可以说，当时中央的政策对地方官员有“虚报”的激励，任何反面或者落后的意见都有可能被当成是前进的“绊脚石”，9 于是各级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虚报产量的竞争，没有一个省份敢于拖这场运动的后腿，10 后来的“浮夸风”也就成为迎合上级领导的一种政治行为。

从表 1 的数据可以看出，即使是最保守的省份，其浮夸的成分也接近 40%，而最激进的省份虚报的产量为真实产量的 3 倍。

“浮夸风”间接造成实际征购率的上升，1959 年相比 1958 年提高了 10%，接近真实产量的 40%.由“浮夸风”带来的产出相比于正常年份高很多（见表 1），政府有理由分享这一

“丰收”的果实，在原来的征购水平上进一步增加征购量，11 但由于实际的产量要低得多，所以实际的征购率要比名义征购率高（见表 2），即使考虑到返销到农村的粮食，最高年份也达到 28%.这样留在农民手中的粮食反而比之前要少，到 1960 年每个农民人均占有粮食仅 212 斤，有的地方甚至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对于当时还处于温饱线上的中国而言，如此规模巨大的结构性变动势必导致深远的影响。

其次导致征购水平上升的另一个因素是规模巨大的农业工人进城。在“大跃进”过程中，城市工业生产急剧扩大，原有的城市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新增的需求，城市工矿企业从农村招收了大量的工人，1960 年的城镇人口相比 1957 年增加 3124 万人，相比 1951 年增加近一倍。城镇人口短期内的巨大增长对当时的粮食供应体系带来了压力，政府也不得不增加对农村粮食的征购量，即使如此也未能完全满足需要，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库存粮，1960 年的库存下降到 573 亿斤，相比 1955 年减少了 29%.因而在“大跃进”之后的调整阶段，为了缓解城市粮食供应问题，政府在 1961 年遣返了 2000 万的农村劳动力。12 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另一个负面结果就是挤出了农业生产，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粮食产量在原有的水平下进一步下滑，加上不得不增加的征购量，农村的余粮就更少了。

最后一个因素是苏联的债务。中苏关系在 1959 年正式破裂，苏联于 1959 年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撤走所有的技术人员，并要求中国提前归还全部贷款，13 这使得中国即使在饥荒年份还不得不继续出口，1959 年和 1960 年的粮食出口量分别为 420 万吨和 270 万吨，出口量达历年之最，只是到了 1961 年粮食才出现净进口。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苏联的债务肯定是出口量增长的一个因素。

可见，饥荒时期粮食征购率的提高是一系列因素导致的，将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苏联和 60 年代的中国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在提高征购率的动机上完全不同，中国的征购率的提高是征购量上升和对当时形势误判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政府刻意为之。从表 2 可以看出，由于对形势过于乐观，政府增加了对农村粮食的征购，使得净征购率上升到 28%，但是如果不是粮食产量在 1959 年出现大幅度滑坡，当年 475615 万吨的征购量所造成的影响也不致于对生存产生威胁，假设 1959 年维持了 1958 年的粮食产出，则当年的征购率将为 2318%，这一水平仅比 1953 年稍稍高一点。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 1958—1961 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都承认了征购率的作用，特别是前者将征购率与其他因素放入同一框架考虑，更值得斟酌。如果不考察当时政策出台的背景，我们有可能高估征购率对后来饥荒的影响，征购率的变动本身是下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的一种反映，因而那些越激进的地区，其浮夸的成分越大，在征购中也更加不切实际，对征购率的理解不能仅仅从粮食角度来理解，征购率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不稳健的。Ber stein 本人也对征购率的重要性持保留态度，他指出“一些人为或者自然的因素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同时粮食储备又不足以抵消风险，于是饥荒便发生了”（Berstein ，1984）。

三、关于食堂在饥荒中的影响的不足

《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从食堂的角度来理解饥荒，对此取得共识的是大家都认为公共食堂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机制，争议则是该重要性到底有多大。此类研究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难题，部分是因为资料和数据的可得性，部分是因为度量的问题。政治因素在这次饥荒中的作用无疑是最明显的，但大部分的度量都是片面的，甚至可能出现“答非所问”。利用公共食堂来解释饥荒既可能拘于数据的限制，也可能出现度量上的问题，公共食堂本身可能也只是其他一些政策和机制的表现而已。

最早将食堂与饥荒联系起来的文献是从饥荒的发生开始的，1958 年的粮食产量在统计上非常高，是一个丰收年，而恰恰是这一年部分省份出现饥荒，于是很自然地将饥荒的发生归结为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导致了浪费，公共食堂的公共品性质使得粮食过度消费，使得一个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国家由于吃了“过头粮”而出现青黄不接，类似于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居然最早爆发大规模的饥荒（Chang and Wen ，1997）。在承认部分地区于 1958 年出现饥荒的前提下，公共食堂的解释无疑是有说服力的，虽然没有正式的数据表明公共食堂存在浪费，但非正式的记述非常丰富，也间接佐证了这一制度的破坏性。

要确立食堂在解释饥荒爆发中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前提就是粮食产量。

最近的一些研究都发现“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灾害并不比正常年份严重，1958 年甚至还是“风调雨顺”（金辉，1993），从这个角度来说，1958 年应该是一个“丰收年”。但是 1958 年的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兴水利”对当年的粮食生产和收获的影响非常大，以四川省为例，“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 10%左右？？在 220 万吨以上”，14 山东的情况也差不多，“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 3/4”。151958 年，“大跃进”运动从农业开始，并且波及所有的农村地区，考虑到当时的统计体系和统计技术，这部分人为因素很可能完全被忽略，1958 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很可能低于 1957 年，至少“大丰收”是不可信的。

公共食堂大规模建立于 1958 年秋，是人民公社的一个附属品。公社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特殊组织，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配给制，公社的这种特征要求公共食堂与之匹配，特别是在 1958 年年底的新修水利、大炼钢铁运动中，要求同时集中调用上万人的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这样分散的就餐模式就无法保证该运动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而公社人员被强制要求到公共食堂就餐，以此来解放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以从事农业生产，剩下的男性劳动力则可以从事大规模的运动，到该年 10 月份有 70%—90%的农村人口被组织到公共食堂就餐（薄一波，1993，第 749 页）。

到了大炼钢铁的后期，由于无法找到更多的原材料，单个家庭的铁制产品都被集体征收，进一步强化了公共食堂。从公共食堂成立的原因来看，其与当时的政策环境高度相关，越激进的地区，公共食堂的覆盖面和执行力度越大。

从统计上来考察公共食堂与饥荒的研究，大部分使用的是杨大力收集到的数据，该数据集只涵盖了 1959 年，其中河南、四川和云南的参与率最高，而恰好这些省市在政策的执行力度上也更加激进，第一个人民公社和高产“放卫星”就是在河南，而四川的“反瞒产私分”最剧烈，以至于农民的口粮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3/4，16 因而公共食堂的参与率的差异反映

了太多的其他因素，而不仅仅是公共食堂本身，[17] 直接利用公共食堂来对饥荒（如死亡率高低）进行回归，其结果并不能完全解释为公共食堂的作用，公共食堂这一变量存在严重的内生性，即有一些因素（如大规模耗用劳动力参加水利工程）影响到公共食堂的执行力度，同时又直接影响到死亡率。

最后一个与公共食堂相关的问题是关于大饥荒的结束。大饥荒起止与公共食堂兴废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公共食堂最早开始于 1958 年，随着 1961 年 6 月《农村六十条（修正草案）》的公布而正式废除，但时间的一致性并不能直接用来作为大饥荒终结的解释。因为，首先，大量的制度性变革发生在 1961 年，包括遣返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恢复自留地和农村集贸市场，允许家庭经营副业，并将所有制从公社下放到生产大队，其中特别是自留地的恢复对饥荒的结束可能是被低估的；[18] 其次，大饥荒淘汰了近 5%的人口，并且以体弱者居多，饥荒前后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身体素质较好的人存活了下来，[19] 即使没有制度性变革，平均意义上每一个人对于粮食的最低需求下降了，这也会使得饥荒得以终结，因而不能机械地直接比较饥荒前后；最后，公共食堂在实际中的执行程度值得怀疑，有非常多关于食堂无法为继的记述，很多地方的食堂到 1959 年就名存实亡了，这些在数据上并没有得到反映，并且当中央明确食堂可以解散时，各地的反应更是“一哄而散”。

公共食堂在整个“大跃进”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其对饥荒的作用也很重要，但是由于缺乏度量其他激进制度的数据时，简单将饥荒与公共食堂直接联系起来有可能夸大了其作用，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公共食堂是饥荒发生的一个原因，但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肯定不是唯一因素，《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用猪存栏数来代理公共食堂就更有问题，这一变量包含的噪音比公共食堂本身还要多，因而要得到稳健的结论则需要更详细的数据。

四、从几个层次来综合理解大饥荒时的问题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 1958—1961 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试图在综合以往大部分研究的基础之上，重新找到一种新的机制。

饥荒的发生无疑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层面和角度的理解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简单将这些解释糅合在一起则会更加混淆，以此来判断各解释的重要性则可能是错误的。历史上所有的饥荒都是从供给和分配两个角度来理解，在供给制度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时，供给的突然变化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反之亦然。

1959 年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滑是一个重要条件，相对于 1957 年下降了 13%，可以设想在粮食没有如此急剧减产的情况下，大饥荒爆发的可能性极小。有很多研究是从这一角度来解释饥荒的：首先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平均主义，加上无法对农业生产进行有效的监督，“退社权”的消失又使得事后的惩罚完全失效，最终的结果就是劳动力的实际投入下降，粮食产出下滑（Lin ，1990）；其次，整个“大跃进”期间，政府从农村转移了大量资源，包括劳动力、粮食征购和其他上调的产品，这些都破坏了农业的生产（Li and Yang ，2005）；最后，公共食堂除了浪费粮食外，还会对粮食的生产产生负面作用（Chang and Wen ，1997）。

在粮食产量下降的同时，分配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化。1953 年开始实施的粮食征购和

1955 年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都将粮食的处置权上调，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分配体系。特别是在“大跃进”之后强制性地对粮食进行征购，剥夺了生产粮食的农民对粮食的处置权，征购后的粮食首先用于城市人口的供应，其次是缺粮区的农民，而产粮区的农民只对满足了前两者之后的余粮具有处置权，而在公共食堂建立之后，对余粮的处置权也丧失了。

因而产粮区的农民承担了任何粮食减产的风险，所以也是受到饥荒影响最严重的群体。20

而这种分配制度变革的背后是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为了降低工业化投入的成本，国家给城市工人的工资非常低，不过为了保障其生活水平，对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也实行低价供应，农产品的征购就成为保障这一切能够实施的前提条件。农村的情况亦是如此，1958 年年底大规模的“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动员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粮食支出完全由人民公社筹集，公社的“政社合一”和“一大二公”的特征刚好满足这个条件，于是大量的集体提留粮食以用于增加这部分人口的消费。除此之外，很难找到集体提留的用途和原因，而在粮食非常短缺的年份大幅度增加集体提留更是难以理解。

集体是一个介于国家和个人的组织，在生产和分配角度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去分析不同地区的集体的作用时，城市化和工业化是这种作用产生差异的根本，那些集体提留更多的地区是为了实施更多、更大的“农业大跃进”，而这种“大跃进”本身就代表了各地的激进程度。从一个大的视角来看，国家征购、集体积累和个人这三个层次是粮食“收”的角度，而城市人口、缺粮区人口和产粮区人口是“支”的角度，两个角度虽然存在一定的重合，但并不是完全平行的，不能直接将这两个维度放在一起考虑。

集体积累的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集体积累差异的来源是什么？为何有的地方集体积累高，有的地方则不是那么严重，如果这与地方的激进程度相关，那些拥有更少党员或者解放的时间越晚的地区，在这场运动中就表现得更加激进，以获得中央的肯定（Yang ，1996；Kun and Lin，2003），而这种激进程度又会通过其他机制直接影响死亡率（比如食堂），这样集体积累的解释力就会下降，由此得出的结论需要谨慎对待。

因而这次饥荒的发生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倾向是第一层，粮食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分配是第一层的表现，饥荒才是最终结果。在利用不同层面的机制来解释大饥荒时，要区分这些机制是否重合，以及这些新的解释与已有的结论的差异。在研究饥荒的影响因素时，结构性差异较总体变化更加重要，也直接影响到总体的变化。

注释

1、如果算上由于营养不良等因素造成的未出生或推迟出生的婴儿数，这一数字将更大。

2、也有说法称饥荒爆发于 1958 年秋冬，不过大规模的爆发还是在 1959 年（Changand Wen ，1997）。

3、1964 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并没有立即公布，在 1982 年进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后，于 1983 年公布了三普的数据，同时为了比较也公布了二普的数据，并且三普被公认为是非常科学的一次人口普查。

4、如斯诺和韩素音在饥荒年份回到中国时的见闻（Snow ，1966；Han，1980），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从当年流入香港的逃荒者对这次饥荒进行讨论，见 Alsop（1962）。

5、森在其《饥饿与公共行为》中分析了这次饥荒，他并不认为中国大饥荒超出了食物获取权理论的分析范畴。

6、这种征购过程伴随着武力的动用，逮捕了大量的抵抗人员，同时清洗了原有的地方官员（Berstein，1984）。

7、实际上，当时的领导人认为 1959—1961 年的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虽然征购量也提高了，但征购的上升幅度低于产量的上升幅度，征购率反而是下降的。

8、反而是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河南省长葛县？？争取亩产 800 斤；湖北省谷城县提出‘争取一两年内小麦亩产 1000 斤’；安徽桐城县提出当年亩产达到 1000 斤，争取 1500 斤”，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 669 页。

9、比如当时中央领导中持有反面意见的陈云、周恩来等都做了检讨。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第 290 页。

10、其中最有名的嵖岈山人民公社就是以“放卫星”而著名，号称亩产小麦能够达到 2105 斤，后来的“卫星”更是离谱地达到亩产 3 万斤。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 686 页。

11、中央领导人甚至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所以接下来才放手全民“大炼钢铁”。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 690 页。

12、Roderick Macfarquhar1The Ori 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V olume 2：The Great L eap Forward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p.330.

13、50 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总额是 66 亿旧卢布，其中 6218 亿用于军事。见沈志华，《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14、见杨超，《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93 页。

15、见郑伟民，《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94 页。

16、见杨超，《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00 页。

17、笔者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中，曾经咨询过杨大力，他自己表示大部分利用他的数据的研究都存在误读，他在书中列出的食堂参与率旨在说明政策的激进程度不同而已。

18、当时规定自留地面积占当地耕地面积的 5%，部分地区在 1961 年甚至出现包产到户。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第 919、949

页。

19、这可以从一普和二普的数据上看出来。

20、这一点在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的饥荒中也是如此，苏联饥荒也是主要发生在盛产谷物的伏尔加地区（彭尼。凯恩，1993）。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

[2]Alsop ，J .，“On Chinaps Descending Spiral”，China Quarterly ，1962，11，21—37.

[3]Ashton，B.，K.Hill，A.Pizza ，and R.Zeitz ，“Faminein China，1958－1961”，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84，10（4），613—645.

[4]Berstein，T.，“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 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S ociet y ，1984，13（3），339－－377.

[5]Chang ，G.，and J .Wen，“Communical Dining and t he ChineseFamine of 1958—1961”，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46（1），1—34.

[6]Devereux，S.，“Senps Entitlement Approach：Critiques andCounter2critiques ”，Ox f ord Develop2ment S t udies ，2001，29（3），245－－263.

[7]范子英、孟令杰“，对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经济研究》，2006 年第 8 期，第 104—113 页……

[8]范子英、孟令杰“，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经济学（季刊）》，2007 年第 6 卷第 2 期，第 487－－512 页。

[9]范子英、孟令杰、石慧“，为何 1959—1961 年大饥荒终结于 1962 年”，《经济学（季刊）》，2008 年第 8 卷第 1 期，第 289—306 页。

[10]Han，S.，My House Has Two Doors .London：Jonat han Cape ，1980.

[11]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 年第 4—5 期合刊，第 13—22 页。

[12]Kung ，J .，and J .，Lin，“The Causes of Chinaps GreatLeap Famine ，1959—1961”，Economic De2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52（1），51—73.

[13]Li ，W.，and D.Yang，“The Great Leap Forward：Anatomyof a Cent ral Planning Disaster ”，J ournal of Pol itical Economic ，2005，113（4），840—877.

[14]Lin，J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ps Agricultural Crisisin 1959—1961”，J ournal of Polit ical E2conomy ，1990，98（6），1228—1252.

[15]Lin，J .，and D.Yang，“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E2conomic J ournal，2000，110（460），136—158.

[16]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毕健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

[17]Peng ，X.，“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 he Great LeapForward in Chinaps Provinces”，Popula2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87，13（4），639—670.

[18]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苏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19]沈志华“，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83—93 页。

[20]Snow ，E.，The Other S i de of the Ri ver.London ：Gollancz ，1966.

[21]Yang ，D.，Calami t y and Ref orm in China：S tate ，RuralS ociet y ，and I nstit ut ional Change since t he Great L eap Famin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2]杨超，《当代中国的四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23]郑伟民，《当代中国的山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

—— 原载 《经济学（季刊）》2010 年 4 月第 9 卷第 3 期（地方文革史交流网转载）
Thursday, June 23, 2011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共党史》二卷备受争议(二)

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录了从 1949 年到 1978 年的一系列事件。尽管编写过程长达 16 年，但有学者认为，该书仍未准确反映历史真相，有些结论也有欠公允。

争论比较大的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对于那段历史，《党史》二卷并未否认，但是表述方法耐人寻味。

《党史》承认一年内人口减少 1000 万

书中说，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

所谓“困难时期”是三年，可是书里只提到一年，而且没有把自然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对于和平时期出现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几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就不能直截了当给全党、全国人民一个交待而非要采取这种迂回的叙述方式呢？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这种表述沿用了中共党史专家胡绳的方法。

他说：“三年困难时期，它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的书也严肃地、客观地做了介绍，并没有回避这样一个问题。至于具体数字，在胡绳先生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当中，就已经做了权威性的回答和介绍。”

杨继绳：三年非正常死亡 3000 多万人

对于那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估计是，在三千万到四千万之间。杨继绳在香港出过一本书，题目叫《墓碑》，就是专门讲那场大饥荒的。

杨继绳根据《党史》二卷的表述做了一番计算。他说，正常年景下，每年人口是要增加的，出生率减死亡率就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没有饥荒的 1957 年，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 23.23。

他说：“1959 年总人口 6.72 亿，按照千分之 23.23 的增长，那么 1960 年应该增加 1561 万人。但是因为大饥荒，不但没有增加 1561 万，而且减少了 1000 万。所以《中共党史》二卷基本就承认了 1960 年的人口损失为 2561 万。”

杨继绳认为，目前这种表述是个进步。

杨奎松：死亡人数并非查不清

曾经参加《党史》二卷起草工作的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对《南方周末》说，“在官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有 1000 万的人口减少，已经足够惊心动魄的了。”

有人说，当时到底死了多少人，现已很难查清，只好模糊表达了。不过，党史专家、北大教授杨奎松不这样认为。

他说：“用党史研究室的这样一个名义，经过中央同意，全国去搜集材料、去调查。按道理，通过这样组织的力量是没有问题，是肯定可以做到的。但是，没有人做。所以，这个很遗憾。”

围绕《党史》二卷的争论远不止大饥荒一事。其他争议还包括：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该不

该彻底否定 1957 年的反右运动、是否应给“高饶反党联盟”平反、朝鲜战争是怎样爆发的、“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到底是什么关系、毛泽东跟“四人帮”是什么关系 ，等等。

章立凡：中共有退让但仍坚守底线

比如，对于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党史》二卷坚持认为是必要的，而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则表示不能苟同。

章立凡：“当时那些人的言论，也不过就是一个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而已，还不达到现在要求的强烈程度。它(《党史》二卷)也承认反右有错误，比较重大的错误。但是，99%(的人都划)错了，还认为反右是必要的。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够客观。”

章立凡的父亲就是当年有名的“大右派”章乃器。他说，中共在一些问题上有所退让，开始回归事实了，但是仍坚守某些底线，明明错了，也不愿认错。

—— 原载 美国之音
Monday, July 04, 2011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毛的大饥荒》获颁英国文学奖

（题图为《毛的大饥荒》作者冯克）

香港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家冯克（Frank Dikotter）埋首四年，著成了一本有关中国大跃进运动名为《毛的大饥荒》一书。冯克凭着这本历史著作，战胜了其他五名候选人，赢得英国塞缪尔•约翰逊文学奖。

冯克生于荷兰，现任香港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研究中国现代史已经接近 20 载。先前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围绕中国在 1949 年前的历史，但在接近北京奥运会举行前，他开始留意到愈来愈多的档案被解封。他认为，这是寻找 1949 年至 1962 年历史资料不容错失的良机。于是乎冯克籍着这个契机展开研究，用了四年时间遍阅解封档案,并远赴内地农村多地进行采访，著成《毛的大饥荒》。

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由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运动，以"大炼钢铁"、"15 年内超英赶美"为目

标，可是最终以全国大饥荒，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收场。虽然中国官方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 但冯克指出这是"最大的人祸"。他估计，那段时期死亡人数多达 4500 万，远超过一般认为的 3000 万，其中数百万人士饿死、自杀或被打死。

冯克认为大跃进是 20 世纪其中一段最严重但甚少被提及的屠杀。不过，中国政府难以隐藏这段丑史，加上政府规定档案保密 30 年，因此更多党内文件将会陆续供外界查阅。目前在英国的冯克对德国之声表示："当局开放档案对我们这些历史学家而言绝对是一件好事。尽管如此，我相信有大量的档案还有待开封。"

迄今大跃进被广泛地视为是一场空前的经济和人命灾难，当时人民穷途末路，为了生存，不惜作奸犯科，农民从地方政府到邻居偷粮食，甚至被迫卖血、卖子女。冯克称，当时中国经济崩溃，社会道德沦亡。毛泽东目睹农民的苦况，还以"振奋人心"的说话来激励人民："饿死一半人不要紧，还有一半人有饭吃"。

冯克表示，对任何要了解 20 世纪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我们不能够把这些无辜受罪死于非命的人带回这个世界。虽然我们不可以改变历史，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忘记历史，我们最起码可以做的就是去了解事实的真相。" 冯克和他的队友专程到中国的农村地方，采访了大饥荒的生还者。许多农民时至今日还生活在穷困当中。

其实，中国本地也有很多历史学家阅览及研究这些档案。 冯克表示："虽然他们可能因受约束而不能像我那样自由地表达，但是他们也是功不可没的。"《毛的大饥荒》的中文版将会在未来两个月内在香港出版。

—— 原载 德国之声
Thursday, July 07, 2011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开仓放粮第一案”真相调查

南方都市报

纪俊仪 1956 年 5 月至 1967 年 2 月任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

1960 年底，重庆市粮食局关于停止农村粮食供应的报告。

1960 年 3 月，张开华任书记的双龙党委批判“私分国家粮食”。

长寿档案馆中现存的纪俊仪 1988 年口述资料。

1961 年，重庆市汇总各区县肿病发病人数及死亡人数。

来重庆市长寿区之前，记者期待还原一个大饥荒年代动人的“开仓放粮”故事。

某杂志去年刊发了一篇题为《一次冒死的开仓放粮》（作者孙建人、王祖远）文章，讲述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在“三年灾害”期间，抵制左倾路线，为挽救更多人生命，冒着丢乌纱帽甚至坐牢的危险开仓放粮，形成新中国首例“开仓放粮案”。纪俊仪等各级干部一直在努力防止水肿病的恶性发展，在得知饿死人的消息之前，就向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争取 4000 万斤的救济粮，在遭到重庆市相关部门领导的阻挠后，救济粮在 1960 年农历正月初二下发，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生命，而原长寿县双龙区委书记张开华，更在除夕夜开仓放粮 300 万斤，事后受追查时，纪俊仪以“县委”名义为其承担了责任。

这篇稿子经由众多纸媒转载，更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开仓放粮第一案”的说法，最早可追溯到 2003 年，重庆《红岩春秋》杂志刊发孙建人文章《1960，开仓放粮赈灾民》，内容与上述文章大同小异。在纪俊仪的老家长寿，该文成为老干部热议的焦点。当地党史办为此还接到老干部数千言来信，认为文章失实。

“这是假的，不存在。”1960 年任长寿县粮食局秘书股股长的张开金对记者说，当地有好多人议论，说这是给纪俊仪竖碑立传。有老干部特地向他咨询，是否确有冒险“开仓放粮”之事，也有人希望他写文章说明此事，但他一直没有写。

事情由此变得复杂。遗憾的是，张开华早已去世，而纪俊仪的儿子以老人有病为由，婉拒了采访，为我们辨析事实增添了难度。

在长寿与重庆，记者先后采访可能了解决策的官员还包括：原长寿县长宋敬武，县委秘书处秘书郑德芳、王兴华，公安局长李在明，双龙区组织部长张长寿，双龙区 16 营（管区）副支书兼副营长左传荣。为慎重起见，记者还在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长寿区档案馆，查了 4 整天资料，内容包括 1958-1962 年重庆市、长寿县党委、民政、粮食、卫生部门及双龙镇的开放档案，以及相关报刊和史志。

让我们走近那个时代。

大量死人事实并未及时向市委汇报

有人抢粮了。

1960 年 1 月，重庆市长寿县公安局接到下洞生产队一户农民的报案，他们家约 20 斤口粮在夜晚被不明身份的人抢走。局长李在明对此非常重视，带了治安股长和刑警队长亲自赶往现场。

“那时 20 斤粮是要命的事，机关干部每月才供应 19 斤粮。老百姓平均每天最多也就三两粮，农民把观音土晒干了，就吃这个。这东西吃了之后大便拉不出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51 年后，79 周岁的李在明在长寿家中向记者回忆起此事，仍忍不住唏嘘。

到了现场，李在明注意到，报案者阶级成分为中农，家庭非常贫困，泥巴与木板糊成的房屋破烂不堪，床上没有被褥，仅有几张烂油纸盖，院子里席子上晒着观音土。在回答李在明的提问时，这对 40 余岁的夫妇显得非常不自然。

“你们家几口人？”他问。得到的回答是：五口，还有三个娃娃。娃娃都去亲戚家了。

“他的亲戚怎么会给他养三个娃？”面对因饥饿而脸部严重浮肿的农民夫妇，李在明内心产生了怀疑。饥饿此时是长寿县最普遍的现象，浮肿的不仅是农民。“我也浮肿，跑都跑不动，县委书记纪俊仪也浮肿。吃个糠丸———主要是现在用来喂猪的糠做的，那时要县里批准，当治浮肿病的药吃。”李在明说。

李在明要这对夫妇带他们去亲戚家核实情况。他俩的眼泪就下来了，道出实情：孩子没有送去亲戚家，而是饿死了两个。尸体就扔在他家附近，一个准备安插电线杆的一米左右的土坑中，上面简单盖了点薄土。

根本没有人抢粮食，这对农民夫妇是报假警。为什么隐瞒孩子死去的事实？“饿死人了，他们也怕……另外，这样他们可以多领两个人的口粮。”李在明说，他很清楚，这是贯彻错误方针导致的结果，内心很不是滋味。他又去了数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去看了看，发现那里也死了五六个人。

他立即向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做了汇报。纪俊仪是李在明的入党介绍人，两人都是山东过来的南下干部。

“纪俊仪的原话是：你谈的是真的么？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这么大个事，我敢讲假话么？他说：如果确实如此，那我这个县委书记该杀头。老百姓饿死，我都不晓得。他很紧张也很自责，说马上下去看看，向市委汇报要粮。”李在明特别强调，纪俊仪当时不是一般的沉痛。

据孙建人文章，这一天是 1960 年 1 月 19 日，纪俊仪刚刚知道自己领导的长寿县出现饿死人现象：“早在两个月前的 1959 年 11 月，长寿县就有人患水肿病，当时这种现象在大面积饥荒的四川并不鲜见。日渐衰弱而又无粮可吃的饥民把谷壳磨成粉、把野生蕨根和土茯苓挖出来磨成面……但凡能想到的无毒的可以吃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弄来填进了肚子，还是没有遏止住水肿病蔓延的势头。到了 12 月，长寿县数十万人中已有相当多的人得了水肿病，在今

天有案可稽的，是县志上记载有 9 万多人。凭经验，纪俊仪意识到，饿死人的事不会仅限于渡舟一个区，全县所有的区可能都不会幸免。他下令紧急调查全县的死人情况。6 天之后（1960 年 1 月 25 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数据出来了，全县 10 个公社每个的死亡人数都已上百，多者甚至数百！”

在纪俊仪 1988 年对长寿县党史研究办的口述（傅道全整理）中，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说法：“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 3000 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

面对大批人饿死的事实，纪俊仪并没有马上向市委汇报。孙建人文章称，在当时“左”的氛围下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风险是明显的，弄不好，一顶‘给新社会抹黑’的右倾帽子，就会戴在头上。纪俊仪硬着头皮让县公安局向重庆市公安局作了汇报。”

按纪俊仪的口述，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做了长寿饿死人的汇报，此时距李在明告知死人消息已近十天。而重庆市领导同样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也就是 1 月 29 日。“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

“1959 年初秋即开始饿死人”

“如果重庆不支援粮食给长寿，长寿还要多死人。我们发现得早，我们也没有隐瞒这个事情，在长寿，死人这个阶段，长寿县委的我、牟克波、荣春萱、刘克瑞经常下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长寿损失还是有，今天说，还比较大，但是比较起来在重庆市算好的。”纪俊仪在 1988 年的口述中这样说。

纪俊仪没有隐瞒灾情么？他是 1960 年 1 月才刚刚知道长寿饿死人的消息么？

1955 至 1961 年任长寿县委秘书处秘书（相当于现在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郑德芳说，他在 1959 年秋天就知道饿死人的事实，在他的老家———长寿县渡舟公社凡安桥生产队。

“大概 9、10 月份的样子，那时二季稻还在地里长起，没有收割。一天下午，纪俊仪和我说，去乡下看看。”郑德芳回忆，他们还没到凡安桥，因看见一头牛在二季稻田里吃谷子，纪俊仪就让车子停下来牵牛。这时凡安桥的一个老太太拄个棒棒，拿个破钵走了过来。“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去刘家塆的大食堂要稀饭吃———那时哪里有干饭吃，能吃上稀饭就不错了。凡安桥的大食堂早就断炊了，她说冉炳林家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纪俊仪听了就很恼火，他说荣春萱（县委副书记，也是山东南下干部）在这边大食堂驻点，怎么没听反映这个情况。他回去打电话问问。我们这才发现下面死人了。但之后纪俊仪和荣春萱怎么说的，我就不知道了。”

郑德芳的记忆表明，长寿县早在 1959 年初秋即已饿死人，而纪俊仪对此知情。“我记得是这样的。和纪俊仪不一致的地方，以他说的为准。”作为纪俊仪的老部下，郑德芳无意冒犯他。

而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显示，在 1960 年 1 月之前，长寿县并未向重庆市汇报饿死人情况。

虽然爱人和孩子在农村，但 1959 年一整年，郑德芳很少回家，除了“回去没吃饭的地方”，还因为“工作多”。195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是个需要大庆特庆的日子。“每

个县都要写文章，寄给毛主席，‘一县一文’。这是上面布置的任务，长寿县就落在我头上了。”郑德芳说，他写的文章《高山出平湖，灾年变丰年》，刊发在重庆《人民公社好》杂志上。

灾年其实并没有变成丰年。但媒体上每天都是利好消息，甚至于在 1960 年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重庆日报》也几乎没有一篇关于饿死人的报道。

1959 年是大跃进的第二年，长寿遭遇了一场天灾。据《长寿县民政志》，长寿经常出现伏旱，干旱天数常达 50 日左右，而 1959 年 7 月 4 日至 9 月 13 日，连晴高温 72 天———也就是比普通旱年多旱了约二十天。饥荒开始在这里蔓延。

“为啥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炼钢铁，好劳力都去炼钢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在家，农田没人搞，红薯都烂在地里。1958 年没产多少粮，1959 年又天旱，加上四川省领导又充漂亮，收购‘过头粮’（即公粮收购过多）。”郑德芳说。

长寿县真的没隐瞒死亡人数？

虽然减产，但包括长寿在内，各县市仍热衷于放高产卫星。在虚报的产量数字下，公粮的“过头”收购，使农民失去了赖以果腹的口粮。救济的不及时，加重了死亡率。据纪俊仪 1988 年的口述，“我们县里死两万多，涪陵（县）死二十几万，丰都死 15 万，垫江死 15 万，江北（区）死 17 万。”1960 年前后在长寿县委秘书处工作的王兴华则估计，涪陵县饿死人最多，有 20 万，长寿虽少也有 5 万。郑德芳的估计更多些：5 万都不止。

据《长寿县志》，该县 1958 年至 1961 死亡人数分别为 19661 人、23573 人、21030 人、15306 人，而 1955-1957 年死亡人数仅为 4897、6250、6061 人。大跃进期间每年死亡人数较此前高出 1 万到 2 万人。不过，官方人口统计也未必精准。曾任长寿县公安局局长李在明说，1960 年，长寿县公安局做户籍人口统计时，有意将人口数“多加了一些”。

1960 年，长寿县是否如纪俊仪所说没有隐瞒死亡人数？

重庆市卫生局四科 1960 年 1 月 15 日的汇报材料《本市肿病发病简况》显示：“本市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先后在各区县发现了‘肿病’，特别是，到十二月以后，情况更有所发展，据与各区县联系，到最近为止的不完全统计，全市共发现患者 26423 例，死 428 人……发病最多的是綦江，已有 9417 人，沙坪坝、长寿、巴县也均在 3000 人以上。”后面列表显示，刚刚统计的长寿肿病发病人数为 4433 人，死亡 92 人。从中亦可看出，包括长寿在内的各区县的统计数字，均严重缩水。此后的每月统计表，也显示汇报数字的随意性，譬如綦江县，1960 年 1 月 15 日上报的死亡人数为 208 人，但接下来 1 月全月的统计中，又变成死亡 109 人，南桐区则从 75 人回降为 26 人。长寿县 1 月份全月的肿病死亡统计数是空白，2 月仅死亡 49 人（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1089，目录 3，卷号 281，54-56 页，59-79 页）。

或者，是如纪俊仪所说，因为 2 月份开仓放粮，导致死亡人数下降？

开仓放粮，为何春节后仍大批死人？

范清明出现在长寿二中的时候，大概是 1960 年 3 月。

此时，郑克荣在学校读初中，一年后，他将从这里毕业。郑克荣与范清明同为江南镇龙山社区 9 组人，他看见范清明“三根骨头两根棒”———这是浮肿消退后的干枯现象，如不及时治疗和补充饮食营养，将很快死去———在五儿子的搀扶下，进入了校园。范清明的三儿子也在这里读书，比郑克荣低一个年级。大跃进期间，学生也曾停课二三个月修高炉炼钢，但他们有校地种，还不至于断炊。

“范清明在农村饿得要死，说话都没心气了。他三儿子是我叫来的，给他盛了些饭。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姓白，不准他吃，说这是给学生吃的。把饭收走了。他也没办法，就哭一场算了。从学校回去，没走到家，在河滩上饿死了，喊着要吃米汤没吃上。”郑克荣对我说。

1960 年一整年，都在持续饿死人。与郑克荣同组的彭会清（音），是在这年冬天出去野外找食物的过程中，饿死在河边的。郑克荣在学校读书，对村内死亡情况并不全面了解，他印象中，七八十人的 9 组，饿死了五六个。

江南镇距长寿县城不远，越过长江即到。按原长寿县委秘书处工作人员王兴华的说法，像江南镇这类靠近水源的地方，死人相对少些，渡舟镇属于死亡人数中等的地方，边远的山区如双龙等镇，死人更多。

郑德芳 1960 年春节在死人中等的渡舟公社凡安桥度过，他从腊月三十住到正月初二，就返回了县委。“算上我，一家五口人，过年就只吃了我带回去的一个罐头。”他不愿细说自己家乡的死亡情况，“当时还不是死人最高峰。我亲二哥，是在春节后饿死的。”

1960 年长寿总人口 51 万余人，农村人口 45 万。如果纪俊仪争取到四川省拨来的 4000 万斤救济粮，按每人每天半斤的标准及时下放，可以维持半年，完全可以接续上早春麦的收割时节，何以仍有那么多农民没有饭吃，连续饿死？

开仓放粮的真相到底为何？

长寿在收购“过头粮”上更为积极

王兴华说，他记得 1960 年春节前夕，纪俊仪在办公室内说，他向市政府要的粮食，马上可以拨下来了。

这一年的春节前后，有粮食发放到死亡线上的农民手中，应是事实。李在明说，他接到手下特派员反映的情况，粮食发放时，在洪湖公社（现万顺镇），前来领粮的农民，有二三人死在回去的路上，终于没能吃到“救济粮”。“那时正下雨，天冷路滑，水肿病人倒下就休克了。”

李在明已经记不清饥饿的农民一次可以领多少粮食。

纪俊仪一次性争取到 4000 万斤粮食么？王兴华说，4000 万斤粮食应该是逐次分批下发农民手中的。

1960 年 2 月初重庆市粮食局《关于 1960 年第一季度粮食销售计划的安排意见》中提到：“今

年第一季度的粮食统销工作，仍本着‘瞻前顾后，细水长流，以丰补欠，留有余地’的方针进行安排……远郊三个县（包括长寿，记者注）及北碚、南桐区等五个粮食作物区，共有农业人口 195 万人，根据省规定的吃粮标准 1-2 月每人每天吃 4 两（旧称）贸易粮，3 月份吃半斤贸易粮，共需安排 5850 万斤。”

由此可知，最初第一季度下发给长寿等五县区的粮食总量是 5850 万斤，而且，发放标准是每人每天 2 两 5 钱（旧称 16 两为 1 斤），这些粮食根本不能饱腹。可能还需强调的是，这些所谓的“救济粮”是作为贸易粮———即返销粮发放的，并非免费，而且价格比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还要贵一些。这一点和原长寿双龙区 16 营副支书兼副营长左传荣的记忆一致：“1960 年上半年，没有钱是买不来粮的，一斤米 8 分 8，非要现金。村民都去田头采折耳根（鱼腥草），拿去公社换钱来买粮食。到下半年才可以免费领救济粮。”左传荣说，当时提倡生产自救，政府救济为辅，他曾把抗美援朝回来共积攒的 1000 多元钱，去粮站买了三万多斤粮，分给了六个农村“兵团”。

记者在长寿档案馆中查到一份 1960 年 3 月 13 日，长寿县粮食局所作《关于当前农村生活安排情况的简要汇报》，其中透露出，自 3 月 1 日长寿县委召开电话会议贯彻市委关于农村人口每人每天平均吃半斤粮的指示后，才开始贯彻落实每人每天半斤粮的指标。

另外，长寿粮食局《关于 1959 年 7 月至 1960 年 6 月粮食年度统销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1959 年下半年，因农村缺粮而销售的粮食为 735 万斤，1960 年上半年则为 2925 万斤。由此可知，上级给长寿的返销粮食指标在 1959 年下半年即开始，只是 1960 年上半年更多些，但这些粮食一直都不足以满足农民的需求。换个角度说，长寿县 1960 年争取的粮食，和重庆其他区县并无太大差别。

让长寿很多老干部不满的，不仅是纪俊仪所谓争取救济粮的数字，还有他“截住”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要粮的说法，以显示其为民请命的姿态。我采访的老干部中，的确无人知道这个事情。在纪俊仪 1988 年的口述中，也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他可以向市里要，但我觉得不可能直接向李井泉要。”张开金说。

档案中提供的事实，有时反而能证明，长寿县在争取粮食问题上，不如其他区县有力。重庆市粮食局党组 1959 年 12 月 3 日《关于 1959 年至 1960 年粮食购销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称：“今年农村征购后的留粮水平一般是够吃的，但由于严重旱灾影响，蔬菜多，粮食少，为适当照顾农民口粮的粗细比例，已在上年度节余指标内拿出贸易粮 2250 万斤，借给巴县 1500 万斤，綦江 450 万斤，南桐 100 万斤，北碚 200 万斤，调剂群众的细粮需要。但经各地安排的结果，全市尚有 111 万个社员（占 50%），每天吃不够四两粮食。”———这个自相矛盾（一般够吃，但拨了 2250 万斤仍有一半人口每天不及 4 两粮）的报告显示，在重庆远郊 5 区县中，唯独长寿没有获得“救济”———这或许和长寿一直是西南农村工作试点模范县有关？或者是重庆市扣下了纪俊仪从省里争取来的 4000 万斤贸易粮？目前不得而知。

另有一件事，似乎说明纪俊仪比其他县市在贯彻收购“过头粮”上更为积极。重庆粮食局党组 1960 年 10 月 21 日《关于农村粮食工作队会议的情况报告》称，三县两区从今年十月到明年 5 月底止，平均留粮水平，以綦江县为最宽，每人每天合 16.6 两（旧称），长寿县最紧，每人每天 6.2 两（不及现在 4 两），仅略高于綦江的 1/3.

1960 年底至 1961 年初，长寿迎来另一个饿死人的高峰期。

“没听说当时谁敢私自开仓放粮”

孙建人描述的“开仓放粮第一案”，最核心的细节其实发生在长寿双龙区。区委书记张开华在“4000 万救济粮”发放前两天，即除夕夜，自作决定开仓放粮 300 万斤。

据双龙镇志，1959 年末该地共有 3642 户、14076 人。一夜放粮 300 万斤，意味着每人可以得到 200 余斤、每户可以得到 800 余斤。这当然是三年灾害期间的大事，但接受我采访的官员当时无一人知晓此事。“张开华活着的时候，没听他说过，我也不知道此事，没问过他。”原长寿县委秘书处秘书郑德芳说。

“国库的粮要上级批准才行，政府断断续续给各个伙食团放些粮救济，但没听说当时谁敢私自开仓放粮。”时任双龙区组织部长的张长寿对记者说，双龙 1959 年下半年开始没吃的了，1960 年最恼火，种了点粮食，还要上缴国家，饿死了很多人。“没听说张开华向上面要过粮，我们天天在一起。”印象中，张开华下半年主要忙于组织生产，催（缴公）粮催款，上半年安排农民生活。

当时任长寿县粮食局秘书股股长的张开金说，如果张开华有开仓放粮，当地的粮站应该向粮食局汇报，但他不记得有这回事。

双龙当时下设 16 个营（管区），左传荣是其中 16 营副文书兼副营长，家住沙坪寺村。他记得 1959 年冬天断粮的时候，张开华喊他和村民去十里外粮库挑粮食，此时距春节大概还有一个月时间，“我们村里还没死人，有些人脚上的浮肿开始流黄水，水不像水，血不像血。流完就要死了。”这应是 1959 年下半年政府断断续续“救济”的一部分。

左传荣说，“1960 年过年那天晚上，我、妻子和大儿子三个人，只有三两米，第二天就没吃的了。”这一年，沙坪寺村死了 60 人，黄坡村死了 77 人。

张长寿说，黄坡是双龙死人最多的村子，1960 年下半年，他被派去驻村十余天，改造这个“生产搞不好的后进队”。“我去的时候断粮，断了三两天，政府不拨，我也没办法，在食堂吃萝卜缨子，闹肚子好几天，没有盐，更别说油了。”

张长寿要把农民召来开会，教育农民：大家还是好好劳动，把粮食种出来。“那时政府的政策是，主要靠农民自己，大家共同劳动把生产搞好，度过灾年。但是起不到作用，吃的都没有，怎么劳动？大家困的困，坐的坐。”

张长寿驻村的时候，还有个叫张远亲（音）的 50 多岁农民，因为饥饿，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从镇上出去，路上就能看到尸体。”

对张开华和纪俊仪，张长寿的评价是“工作负责任，但还是过左，上面政策照搬，白天督促、强迫群众劳动，饿肚子也劳动，这是上面让搞的。纪俊仪也很左”。张开金的评价是：“张开华文化程度不高，态度比较生硬。纪俊仪当时也是官腔十足，‘文革’后改了一些，没那么官腔了。”王兴华的评价更正面一些：“张开华是直性子人，不怕得罪人，不管别人接不接受

得了，都要说。有人说他德行不好，就是因为他脾气不好。纪俊仪也是急性子人，‘文革’批斗他时说他是暴君，其实不存在。他是不顾情面的人，批评不含糊，有啥说啥，不留一手。”

在重庆与长寿相关开放档案中，目力所及，记者没有发现张开华除夕夜私自开仓放粮 300 万斤的任何记载。仅在 1960 年 6 月 24 日重庆市财贸部《关于长寿县小春粮食收管用方面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瞒产私分严重，双龙公社召开党员大会，党员自报私分数平均每户为 30 斤。”这指的应该是春粮打收入库前的截留。

“文革”武斗时发生过开仓放粮案

虽然减产，但大饥荒年代，长寿乃至整个四川征购公粮的弦仍拉得很紧。在长寿县开始成千上万饿死人的时候，1960 年 1 月 16 日，长寿县粮食局宣称，“（1959）全年调出省外粮食 4628 万斤，完成计划 4568 万斤的 101.24%.”虽然调出很多粮食，但事实上长寿县内各粮库仍有很多存粮，1960 年 6 月底的统计是，该县国家储粮 2449 万斤，公社储粮 1687 万斤，合计 4000 余万斤。粮库甚至还有糜烂粮食（11463 斤），更有 385 万斤遭严重虫害（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1101，目录 3，卷号 291，54-56 页，188-191 页）。

纪俊仪在 1988 年的口述中说，“当时，有的人怕上面晓得死了人没有面子，我就不要面子，要对人民负责。以后，（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问我‘你的人是怎么死的？’我跟他说‘是饿死了的’。他说‘饿死人就要给粮，不给粮还要饿死人’。我说‘对，就是给粮’。”可是，一直到通常意义的“三年灾害”（1959-1961）结束后，1962 年长寿仍在大面积饿死人，仅官方档案中记载就有上千人（仅 1 月 1 日到 24 日就死了 1145 人，见长寿档案馆藏档案《长寿肿病有关情况的调查汇报》）。

王兴华认为重庆市长寿县比涪陵几个县饿死人少的原因是：涪陵可能执行政策更左一些，而且重庆比涪陵工业条件好，物质丰富，更有条件支援县市。长寿一直是模范试点县，靠近长江，水库等建设也比其他区县好。就重庆而言，江北区死人相对多些，这和其面积大人多有关。

“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因为别的区县死人多，我这就死人多。”原长寿县长宋敬武说，关于开仓放粮，他只知道“文革”武斗期间，他调任重庆市任水利局副局长时，发生过一次，但具体不详。从长寿粮食局长职位卸任的张开金说，那是 1969 年，“也很困难，但没有 1960 年困难。垫江县的造反派‘反到底’和长寿的‘反到底’联合起来，打开国家粮库，一起放粮。”

我没有找到大饥荒年代“开仓放粮”的感人故事。至少在重庆范围内，“开仓放粮第一案”是“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发动的。这真是历史的复杂与吊诡之处。

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 发自重庆

—— 原载 南方都市报
Wednesday, August 03, 2011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农业合作化不值得赞美

雷崇功

十天前在网上读白平教授的《喂，你别给老歌改词》后，写了两则跟贴：

雷崇功

农业合作化不值得赞美，它造就了几亿农奴，几年后又出现几千万饿殍，世界最大灾难。这种“辉煌”使人不寒而栗，不信请去问问老农民，谁不诅咒。这首歌尽管曲调优美，但也应该扫入历史垃圾堆。《社会主义好》《东方红》等也是，溃烂的破衣用再多破麻袋片也补不住，别枉费心机。

白平

雷老师，我的看法，政治和音乐其实是两回事，音乐是可以从政治中剥离出来的。

雷崇功

白老师：我敬重你的人品，钦佩你的学问，喜欢你的博客，但是对这个问题与你的看法很不相同，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对你的“剥离”说很难苟同，词和曲无法剥离，是一个整体，我举的《社》《东》等曲调也不错，但很难说它们是好作品。应该说越是曲调优美，毒害越大。我小时候闻过大烟味道，很香的，见过罂粟花，很美的。我曾在农村“改造”十多年，对农村合作化有亲身体会，恕我直言，希望大家多多探讨。

对于老歌改词，我不想再说什么，但对农业合作化我还想多说几句，因为看见网上还有许多人在赞美它的“辉煌”，还在盛赞南街村、华西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壮举，再读读中共近 30 年的正式文件，也一直在为它搽胭抹粉。

先说说我对那段历史的亲身感受吧。

中共建立割据政权后立即有一个“土地革命”，用“分好田好地”来获取农民支持。果然靠着农民的牺牲夺取了大陆政权，中共没有食言，进行了土地改革。用暴力夺过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赢得农民的感恩戴德。当然，地主富农失去了财产和尊严甚至生命，世世代代沦为贱民，能苟延残喘就很幸运了。那时，农民的生产生活普遍蒸蒸日上，共党的威信很高，说一不二，胡作非为也没有人敢于质疑。可是好景不长，农民还只收了两季庄稼，就开始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互助组好接受，相当于换工，合作社要交出土地，改变所有制，农民普遍不愿意。政府在政策上向合作社倾斜，给单干制造困难。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不准参加，

能当“社员”无上荣光，虽然经过天花乱坠的宣传和乌托邦共产主义天堂美景的诱惑，但农民也不是心甘情愿参加。当时说是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小农经济两极分化是自然的，这时还只有一点苗头，生产生活下降的农户不多，主要是缺劳力和有天灾人祸的。还有个奇特现象，土改积极分子，共党的依靠对象，土改往往分的好田好地，“浮财”占得最多，但一单干就不行了，有的甚至打算卖地了。这些人许多是毛泽东所说的“痞子”，也是运动积极分子，搞合作社最起劲，并且企图掌权。共党说统计结果 80%合作社增产，比单干强多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知有没有人相信，反正我相信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不足为奇。一年下来，许多社员羡慕单干户，想要退社，这当然不可能走回头路，并且马上批判“小脚女人”，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也不再计较阶级成分，把地主富农统统赶进合作社。一入合作社，土地耕牛农具统统交公，靠工分吃饭。有老农说，还不如以前当长工和佃户。这是自然，实际已经成为没有一点自由的农奴。一年到头，完全拴在土地上，连人身自由也被剥夺，生产力非常低下，“痞子”们多是瞎指挥，有限的出产还要多吃多占。后来进入“人民公社”，遭遇大兵团作战和大锅清水汤的公共食堂，家里没有隔夜之粮，甚至锅台碗盏也砸了，谁家屋顶冒烟就会冲进来一群天煞星。农民没有一点抗拒饥荒的能力，连逃荒的自由也没有，大家都陷入绝境，无处乞讨，只有坐以待毙，造成几千万饿殍，多起的“人相食”，这在人类历史上真是史无前例的“奇迹”。历史上饥馑造成的农民起义层出不穷，但这一次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于战火的人数，居然没有大规模的反抗，许多人归咎于中国人的人性软弱，其实这主要是中共统治有术。中共的确“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能成为笑柄。不过，擅长“与人斗”瞎折腾的共党的统治手段远远超过成吉思汗和希特勒，用血腥暴力的手段把一大批“痞子”训练成铁血团队，只需几根骨头，通过这个团队就牢牢控制着国土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散沙般的国民，实在高明。

1961 年秋天，我随教师下放队到剑阁县柳沟乡改造，参加过一次人口调查统计。这时刚刚解散了公共食堂，大饥荒才过去，农民的怨气很大。调查中发现过去的三年里死亡的人很多，每个生产队至少 10—20 人，多为壮劳力，还有绝户。在填“死亡原因”时，我这个戴罪之人当然只敢照例填“水肿病”，可是许多农民不答应，说某某人某某人一点没有肿，临死都是皮包骨而已。我想了很久，最后创造了个医学上的新名词：干瘦病。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谎言。在我的记忆里，至少在四川，那三年是少有的风调雨顺，其他省市也许有天灾，但不会很大，不会不可抗拒。在天府之国，尤其是成都平原，感谢李冰父子，几千年来完全是水旱保收。这个产粮大省居然饿殍最多，把最大的人祸推为天灾，老天何辜！

1962 年我被遣回简阳原籍改造，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九死一生。参加了十多年农业劳动，深深感到农业合作化是一条死路，农村经济已濒临破产。一个壮劳力一天 10 分工，只值 1 角多钱，一年下来能挣够可怜的口粮钱就不错了，劳力弱点的年年成“倒找（超支）户”。这时虽已有了一点自留地，挨过了恐怖的大饥荒，但仍有很多的断粮日子，用“水深火热”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土地沙化，地力严重退化，大小树木全部砍光，生态严重破坏，这才真正年年有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运动不断，花样翻新，政治高压，草木皆兵，整人的和被整的都神经高度紧张，红色恐怖下政权得以维持，集体经济终于达到了“一大二公”的最高境界，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19 世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20 世纪这幽灵又游荡到了亚洲和美洲，它与纳粹是孪生

兄弟，是妖魔，人类 1/3 遭到浩劫，21 世纪应该是噩梦的终结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明明知道小农经济还很有潜力，还是要用暴力去消灭它。有个经典的理论：一富就变修，越穷越革命。农业合作化违背人性，违背农业生产的特点，违背农民的意愿，是对农民的掠夺和奴役。共党口口声声要破坏旧世界，连传统的仁义道德也破坏了，对农民是恩将仇报。开始使用分土地的许诺得到农民的支持，用农民的巨大牺牲取得了政权，却用“合作化”把农民刚分的土地连同原有的祖业一并收缴，自由分散的农民全部沦为农奴，低贱的“农业户口”使子子孙孙世代为奴，用“剪刀差”剥夺农民，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大量输血，大饥荒饿殍绝大多数是突变为无产阶级的农民。农民从依靠对象变为改造对象，陷入悲惨境地，应该说，中共太没良心——当然，他们说良心是资产阶级的。

这里顺带再说一件关于良心的事，80 年代初，政府卖过户口，农转非，一个几千元。好些人想了几十年的“脱农皮”居然梦想成真，砸锅卖铁借高利贷也愿。因此生意很红火，无本生意的大利润不知落入了谁的腰包。不久，户口贬值，城市户口没有任何优越，反而原有的自留地承包地都被收走，竞买者才知上了大当，后悔莫及。户口生意渐渐冷清，以致收摊。假如这生意一直红火，就算低价优惠，1000 圆吧，十亿农村户口，全部清仓，应该净赚万亿元，如果分给 1 万个官员，个个是亿元户。或许中共开始定这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就给它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留下一笔可观的财源，预设了这“阳谋”吧。这种户籍制度的后遗症阻碍了工农业的发展，当前几亿“农民工”也是世界奇迹，是什么阻碍他们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呢？

有人说，农业合作化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发展了生产力，是伟光正的，而 80 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发展了生产力，也是伟光正的。分与合都是伟光正，这未免有些滑稽，可以说南辕北辙是可行的，因为地球是圆的。他们解释说，承包制不是单干，因为土地不是私有，是集体的，农户只有使用权。是的，农民解放了，从农奴变为了佃农，共党从奴隶主变为了垄断的大大大地主，是时代的进步。阻碍“三农”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个关键，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了几十年，为什么不归还呢？他们说，承包只是暂时的，权宜的，将来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此言让人不寒而栗。土地不归私有，便于共党掠夺，说占就占，说征就征，血淋淋的“土地财政”当然是暴利。“2011 年初，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宣布，最近 5 年来，中国政府从农民手中成功夺取 3300 多万亩，获得土地暴利 7 万多亿元。仅仅过去的 2010 年，通过毫不留情的土地抢劫和拍卖，中国政府就获取暴利达 27000 亿元。”（引自杜君立先生博客）

土地所有权不归农民，极大地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更无心做长远规划和维护提高土地资质，土地越来越贫瘠，生态越来越失衡，可耕地越来越少。涸泽而渔危及子孙，他日有何脸面地下去见祖宗？土地征用和流转中得暴利的是政府，得小利的是中饱私囊的村官，怪不得那么多人用重金去贿选一个小小的村官乡官。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得警惕啊！

“三农”问题怎么解决呢？合作化是行不通的，苏联、中国、红色高棉和朝鲜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农业的现代化集约化依然可以而且必须建立在土地的家庭经营模式上，发达国家已经一再证明了。鲁长泉先生开出一个药方：土地彻底私有化。他说：“让老百姓有权处置自己的土地，尽量加快土地流转的速度，把大型农业机械开进去，把劳动力带出来；大力加强社会保障，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其

它产业分流剩余劳动力。”我以为很精辟，很可行，完全赞成。不过我很怀疑中共的雅量，因为这不合乎它的“核心利益”，赞成私有制就不是共产党了。

2011.7.30 于岷江畔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August 31, 2011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面对饥荒：一个普通国家干部 1961 年 2 月写的日记

佚名
【提示】笔者收藏有一本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记本，其主人是当时山东省济南市的一位国家普通干部（现在应该称普通公务员）。日记本里既有学习笔记，也有工作记录和个人日记，内容繁杂。这位普通国家干部 1961 年 2 月的工作日记，掀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记忆，记录了当年为战胜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而开展生产自救的真实情况。为保护日记主人和他人个人隐私，对其中人名做简化处理。——沙漠夜横笛

【1961 年 2 月 1 日】

天桥财贸部门关于生产救灾检查内容研究

小组划分二个：①三店一堂 ②财贸系统

抓的问题：

一、□□□□(注：原文字迹不清)。除四项七条外 1、支部如何加强思想指导发动职工；2、对生产救灾是否树立自力更生的态度；3、以食堂为中心搞好职工生活支部是如何抓的。书记下伙房问题，存在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书记下伙房前后变化情况，伙房是否有制度，漏洞是否堵住。4、各项生产救灾措施是否落实。

二、职工生活、粮食定量、参加吃饭人数，按计划及突破计划人数。突破计划的原因，如何解决。

三、当前物资供应工作如何安排，是否落实，服务态度问题。

四、对职工劳逸安排。领导对安排职工休息采取了哪些措施，每天工作安排是否按 8 小时制？全部按 8 小时制需多少人？

五、对夏书记报告中职工家属等几方面生活安排情况。

下午天桥百货商店

1、职工思想情况：传达了曾志报告，农业十二条。通过会议对职工进行教育，使职工树立了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思想。组织送货上门（济洛路），受顾客欢迎、表扬。①三居门市部（国棉）服务态度不好。②供应群众的商品私分（如小纬北路综合商店分配 20 件，私分 20 件。成通门市部五个钢精锅卖一个，四个内部分了。

在职工中存在思想问题：①济洛路门市部营业员（资本家），生活提高了，用毛巾做衣服，小价也多了。②麻袋庄姓李的，请假在家卖茶水。③无影山门市部李某将供应商品要其妻到农村贩卖草纸 100 斤，小孩球鞋 31~35 七双，毛巾 10 条，书包背包等，自己利用工作方便买枣 10 斤，将自己及其岳母皮袄卖了 200 元，在市场上买副食品红萝卜，自己交代 40 斤，门市部掌握 200 斤。④有的对节约粮食不满说怪话，如区店苏某不按计划用粮，说伙房里真坑人。⑤发红萝卜 （朱大娥）：我几天没吃饭没人管，节约粮食找来了。宋兰英：增加粮食找不到我，节约粮食找到我了（上二人均系官西门市部）。

2、当前食堂及职工劳逸问题：分工经理抓食堂。一、三、五经理到伙房劳动，食堂力量进行充实调整。工会主席（管理员）负责食堂，把炊事员宋某（有偷摸行为）调出。伙食委员轮流到伙房，做到日结算、日盘点、日公布产销供情况，健全账目，每月公布账目，召开为圆弧，月底总盘点，保证职工吃足了，足斤足两。

地瓜面、高粱面、豆面，一斤水一斤面，出 2 斤，每个七两五钱（五分），二分的每个五两。大米（干饭），一斤出 4 斤五两（次大米）。麸一斤出斤半，一斤麸八两水。早上晚上吃大米粥。每人八斤大米按六斤发，余二斤喝糊涂。稀饭有时水多，多卖了钱，节约了粮食，即在月底盘存粮食，将结余数加在下月粮食计划粮内。

代食品 交藕 1050 斤、糖渣 740 斤、红萝卜 3000 斤、包心菜 100 斤、芋头 50 斤、洋口 50 斤、白萝卜 550 斤，共节约粮 634 斤，食堂现存 224 斤，交藕 8 斤抵 1 斤，糖渣 80%粮 20% ，红萝卜 8 斤抵 1 斤粮票，白萝卜 15 斤抵一斤，除尚余 130 斤外全部吃完。

现存红萝卜苗 500 斤、干野菜 300 斤（地瓜秧原拨 5000 斤，当时因过新年，答应过新年给而未给）、大白菜 714 斤、白萝卜 123 斤、大葱 43 斤。化验室 20 人在此吃饭每月补 300 斤菜，街道 250 斤，共 1400 斤。每天按 40 斤吃（共 110 人，以上 120 人），只能吃到月底。每顿每人二两菜。每天按 35 斤吃能吃到三月上旬。另外有干白菜叶 100 斤、50 斤海带，化验室补鲜菜 300 斤，这样就能吃到三月底，四月份就没菜吃了。就得依靠春种 3 亩 8 分地的菜（才返地 2 亩，种子还没有）。

搞代食品，搞了 300 盘人造肉，人造肉元月上旬 30 斤，中旬 30.5 斤，下旬 18 斤，平均日出 3~4 斤。每日下午做汤，参加人数 3 人。

劳逸结合问题。在贯彻劳逸结合前，日工作 12、3 小时，星期大休。天成 7 个半~10 小时，济洛门市部 9 个多小时，将卖菜的人调上来参加营业，五个门市部 8 小时，全部按星期休息，采取轮休办法，主要仁丰门市部人员紧些。

济洛路门市部李某 1、2 月粮食不够，缺 2 天（月计划 40 斤），要请假买代食品。苏某月差 1 斤（共差 3 斤），花用差 2 斤。第一个其妻疯将其粮吃了。第二个主要计划不周，原系下放干部，比一般定量高斤半。第三按营业员标准搞技术革新，刘成思差 3 斤。李瑞金差 3 斤（拉车），原因是吃超了借给他积起来的，目前无发展。

1 月底止同志们节约饭票 193 斤（粗粮），32 斤细粮。共 225 斤库存，净粮 108.5 斤。

食堂管理人员 1 人，炊事 7 人。

家属还乡应数 7 户，落实 5 户，实际 2 户，其中 1 户又回来。回乡的李昌绪（5 口人），粮食副食均按社员标准供应。回来的张新达，系自愿报告回乡后有困难，回来后已入户，供应按市民标准。其余未走的 1 户思想不通，2 户有病。

当前物资供应问题：做好春节物资供应工作。首先准备向职工讲清当前形势任务（已做）及十二条，社会主义商业与资本主义商业区别，进一步批判不正确思想（私分、走后门），并强调春节物资供应按政策办事，提高职工觉悟。制定春节物资供应计划向职工传达。继续开展服务良好月，对青菜、日用必需品对老病、孤寡、烈军属、双职工送货上门。

春节物资供应运输问题：至 7 号止全区自身能运 23 万斤，尚缺 18 万斤需要公社帮助解决。

为了安全不发生事故：一、成立业务检查组 2 人，重点①检查供应政策。②商品是否保质保量。③检查度量衡是否足斤足两。④检查商品保管。⑤人员排队，对有不干净行为的职工调离副食。⑥检查供应方法。⑦对进销情况进行检查。二、成立成立安全组，区店应有治保会，调二专职人员负责安全，各综合店成立治保分会，1~3 人，对所属进行巡回检查。三、组织对财会工作检查。以区店会计为主另外抽调二人。检查内容：检查财会制度。

春节期间生活安排：现存 500 多斤干萝卜苗，300 多斤干菜，100 斤白菜，拟 10#~14#每天吃一顿菜团子，萝卜苗掺窝窝，不顶粮食。年 30 日晚上将伙房结余组织会餐，菜不用钱，粮各人分火，保证职工在春节期间吃上水饺。除夕晚上和初一早晨准备馅子，由职工领出包，统一吃大包子。

生活困难户摸底 5 户，已救济 4 户 100 元，尚有一户 11 口人收入 40 元，其生活水平达上等，做投机买卖，亦拟救济 20 元。

全区店长期病人 8 人，水肿病 15 人。水肿病早上喝豆汁，日吃一顿鱼，吃粮食不代地瓜干。对水肿患者休息期间每天三小时或工作半日制，忙工作忙时就不能保证。

菜 24282 斤，其中超计 490 斤，损耗 2268 斤，实际 23620 斤。

全区粮食定量总数：　平均每人：

【1961年2月2日】

国祥13人 下午座谈会

一、生产救灾听了几次报告，提高大家认识。认识到困难是暂时的，支部对职工生活较关心。领导1、3、5定期下食堂，吃到足秤粮食，花样多，吃得热。工作8小时，贯彻劳逸结合前11~12个小时，同志们得到充分休息。

春节供应：召开居民主任、居民代表会议进行研究，除供应附近工厂、流动顾客外，对孤寡、烈军属、双职人员组织送货上门，事先进行摸底。①物资供应部分缺乏：解决办法清仓。②春节即到，任务大，外调职工不调回人员就不够。③对新职工教育不够。④领导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关心病老不全面。

二、过去食堂（救灾前）大家意见多。①粮食不够秤。②水不及时。③菜花样不多。自生产救灾后领导亲自下食堂，群众反映馍馍大了，窝窝头大了。①伙食委员轮流值班中断不好。②要求领导下去要看秤。③食堂管理人员上班晚，应与炊事人员共同上下班，对粮食应心中有数。目前管理人员上班晚，炊事人员饭做好了，用粮光听一报。④门市部仅一个兼职主任（经理兼），精力受牵扯，应有专职主任。⑤徇私舞弊走后门，手续制度不严。虽然杜绝，仍然存在。

三、①领导下伙房亲自动手做饭、菜，同志们满意。②领导对病号关心，早上吃豆汁、鱼，不吃地瓜干，并按病情适当安排休息，5、4、3小时。③凭证不限量的供应物资职工心中无数，希领导下去具体帮助。④送货上门领导重视。

四、商业达到8小时，从前连想也不敢想，会议减少能得到充分休息。①但目前人员少，安排不过来，工作紧。由于人员少大休也就不好安排。②领导下食堂，粮食吃足秤。从前用粮无数，现在每天日清公布。③伙食委员会开得少，不能及时听到群众意见。

五、副食调料组 对8小时工作制副食调料达不到。三个人水肿病，一个痊愈，一个基本好了，一个轻度。①领导抓食堂没有以前抓得紧。②现在吃菜看不到油。③食堂鱼1.5斤（一月份）共吃一次，不够一斤鱼。④现在窝窝头没有开始时大。⑤送货到门副食调料不能正常工作。

六、文具组

①食堂的人早上一顿吃7、8分，定量一样多，别人不敢吃他们敢吃。

②他们吃大米饭不交大米证，吃了大家的。

③粮库钥匙应由伙食委员会值班人员轮流拿。

④应加强对炊事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

【1961 年 2 月 3 日】

3/2 传达市委李健平书记指示

检查工作要迅速形成群众运动，发动群众，检查中抓住先进单位，通过先进的来促进后进的。方法上开座谈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效果，尚有哪些问题不能解决。检查又要抓薄弱环节，抓关键问题，要使广大群众受到教育明确形式，搞好生产自救。代食品问题要广泛发动群众去搞。如茅草根、捕鱼打猎，从而修正生产自救计划。各单位自查要有专人深入下去抓吃、烧、用，缺粮的应帮助解决，要把困难户抓起来。财贸检查重点是散店一堂，对职工生活主要依靠单位自查。

省机械厅家属宿舍 许主任谈：

供应半年 11—4 月每人原 85 斤，实 65 斤。供应的菜受冻坏了，不能储存，因此吃完了。目前缺菜吃。除部分 10 余户有干菜外，70 户缺菜（共 101 户），两星期前登记。（其中：10 余户双职工）。缺菜户由职工在食堂买菜回来共吃，以及咸菜。

吃粮：刘希仁全家 6 口，缺粮一星期，计划总数 124 斤，其妻有水肿病由厅里买部分胡萝卜佃粮外，由农村买了部分菜。这样还得缺 2 天。粮店供粮前两天登记方便群众，贸易大楼供货上了群众满意。

新年副食品供应集体户都买了，街道户口水菜都没买齐。

九居座谈会 2.3

全居 270 户，粮食大部 80%没问题，但也有部分人 20%不够，其中突出二户。47 排 5 栋，李振洪全家 5 口 82 斤计划，已吃 40 斤（25#购粮）。53 排刘某某（女）5 口全月计划 110 斤，已购 20 天的 76 斤。截止 2#尚有 10 斤，五月 20#就缺粮，表现不满，□□□□□，□□□□□□，□□□□□□□□□□□。其家庭成员夫在济南化工厂工人，大的 8 岁，二的六岁，小的二岁。

菜已供应每人 60 斤。供的芹菜冻了带泥多，留不住。好白菜服务站留下来，服务站二个人大楼调来。李某某群众态度不好。有一次买十斤少二斤。菜搭配也不好，群众要他好孬均匀，他说你爱要不要。秤少了称群众找上门不承认。刘某某（女）买好白菜好萝卜晚上用麻袋往家背。现在大多数没菜吃了。马宗英不在家，菜本放在菜店里实际没买，李某某都给他写上。

冯某某（女），其夫偷豆子偷改粮本已在教养。现在家 5 口人，本身有病靠纺棉花（淋巴腺结核），四个孩子，已救济 15 元买菜，每人 82 斤，410 斤仅买 200 斤，其副食品、肉、鱼

估计是娘家买去了（她本人说是她娘家爹买去）。

【1961 年 2 月 4 日】

2.4 姜主任谈

王某某（女）全家 4 口，一个母亲，2 个弟，全家粮食计划 斤。根据其情况按计划是够了，但其做投机买卖在食堂买窝头 30 个到市场卖每个五角，因而发生缺粮。

访问：王某某（女），买十斤菜少二斤，住 51 排 4 栋

方大娘（住 55 排 3 栋），张某某 55 排 1 栋

马某某（女），（住 50 排 4 栋）及 54 排 1 栋王某某（女）

韩某某（女），（住 51 排 1 栋），张某某（女）50 排 1 栋

张某某（女），（住 54 排 3 栋），孙某某（女，治保主任 53 排 3 栋）

□秀云（女），（住 53 排 4 栋）

王某某（女，住 46 排 1 栋）：约 11 月份在菜店买十斤芹菜少二斤（在李某某手买的），找他他说，你当不*秤，这里一共不能短秤（没有补上），芹菜上有泥你给撒掉了，不退钱也不能补充，你去告我去吧。张重点反映狄某某（女）、刘某某（女）晚上往家背菜。

马某某（女）：买菜虽然有坏的，但拉来时其中也有好的，他们挑出来不卖给群众。姜主任说哪有那么多好的，卖什么吃什么。王主任帮助卖大头白菜，将好的挑出来，坏的卖给卖给群众。有一回（想不起时间）来了群众拉菜正碰到服务站的人正在分好的，小的都卖给群众。那时每人一斤，他们分 10 斤。（刘桂香也是）。去年冬天为挣买大白菜，去向李某某、陈某提意见叫他掺和着卖，他说这也比吃树叶好吃。夏天大家菜不够吃，而陈某吃不了就一麻包麻包在屋顶上晒。姜主任说人家没时间出去拔菜人家就得多买点晒了。那时候供应菜少时 1 斤 2 斤，多至 5 斤不等。孙某某（女）：那时一个人买一斤茄子，而他买了不少晚上带到家。陈某卖豆芽一人只能买一斤，而他过午背一包回家。张某某（女）反映：马宝英 4 个月没买菜而盖上章了。现在大家都没菜吃，而刘某某（女）、狄某某（女）家里的菜都烂了不敢往外来。

【1961 年 2 月 5 日】

5/2 工人新村综合商店

下设 5 个门市部，每个门市部供两个居（共五个居），供应居民人数 17092 人（在家吃饭 1600 人）。集体单位职工单人购物证 5000 人。九居和十居共 2744 人。除这两个居外军属 41 户，烈属 3 户，老弱病残 18 户。全店共 71 人（职工），其中正式职工 19 人，其中党员 5 人，团员 3 人。临时合同工 37 人，小业主、小商贩 15 人，临时春节帮忙由公社调来 25 人。

五个门市部中原有 2 个，国庆节扩充 3 个。供应商品蔬菜、调料、食品（鱼肉）、副食（糕点烟酒糖茶）、炊事用具、瓷货、百货日用品。

职工生活：于 60 年 11 月底建立食堂 1 处，就餐人数 53 人（其中包括粮店及食品供应站在内 11 人）。在食堂就餐人员中无吃过头粮，菜已吃超半个月。目前每人每天按半斤吃能吃到 3 月 21 日。食堂粮食有结余（一月份）12.5 斤，一斤麸子出三斤熟食。职工反映干粮小些，原因是炊事员技术问题，炊事员没固定。

货源情况：供应数 30 万斤，尚有 6 万斤没运入。（春节供应物资供应 15 万斤）6 万斤自己有车 14 辆，春节前能满足群众需求。

供应方法：两个居一个门市部，但卖蔬菜一个居一个点，每个点拿出 2 个人专门送货上门。要求对老弱病残、军烈属的物资送上门，除此其余户数要求 60%送货上门。对缺少的物资如脸盆、铁壶通过分社摸底供应。群众反映送货上门方便、满意，不用排队。徇私舞弊走后门，好菜留给自己，孬的卖给群众，一般是有的。

粮 店

原有 16 名，这次充实 6 名。原 16 名中小业主二名，从业人员 1 名，团员二人，预备党员 1 人，合同工 26 名，临时工 2 人，后充实 6 人中党员 5 人，团员 1 人。另外增加临时工 8 人（学生）共 30 人。共 4 个门市部，供应户数 5020 户，5 个居，20741 人。每月供粮 503900 斤，其中西山供应人数多些 5692 人，七、九、十 5084 人，五、六为 4717 人，一、二、三、四居 5208 人，军属 37 户 138 人，用粮 2878 斤；孤老 28 户 88 人，用粮 855.5 斤；烈属 2 户 5 人，病人 3 户 4 人 96 斤；多子女 5 户 42 人 855.5 斤。合计 5664 斤。华侨 1 户 4 人送粮到户。送粮到户共 71 户。38222 人中水肿 5 人。

目前亏地瓜干 8644 斤，亏地瓜面 1600 多斤，亏麸子 360 多斤，高粱面短 258 斤，亏款 360 多元。从 7 月份到现在未割帐，贪污否不敢肯定，正清理中。

对手续制度不严、认账收粮 1 人。执行政策不严，到居民用粮按排来抓。12 月底摸底缺粮户 27 户，原因粮食在编证明单没来。

劳逸结合：目前早 7 时半—晚九时，过去 7..5—12 点后。

买粮短秤少两还有，主要是技术问题，如地瓜面一斤粮秤斤半往往忘了半；瓜干 1 斤秤斤 4 两，往往忘了 4 两。

【1961 年 2 月 7 日】

2.7 小纬北路合作商店 （王、周、杨）

第七门市部（宝华分社九居）负责人刘某某，全店 8 人，均系小业主，无党团员。其中赵某某干过伪保长，写过保证书（国民党员，剥权），一贯道，开过大烟馆，现在有病在家。赵某某（注：与前一个赵姓伪保长不是同一个人）干过铁路伪警。

全居 460 户 1916 人。60 年下半年供货情况：总产值：78567.34 元，七、八、九盘点损益亏款 63.74 元；十、十一、十二月短款 230.25 元，原因：长款系从调料中所出，大部出在油、酱、醋。短：副食品如鱼。

中秋国庆进月饼 48 斤 短 5 斤 每人半斤

肉 456 斤 短 2.2 斤 每人 3 两 574.8 斤

鱼 1520 斤 短 12.5 斤

酒 880 斤 短 14 斤 按瓶不短按斤短，三个票一斤

水菜 1312 斤 短 17 斤

粉条 200 斤 短 2 斤 每人 1 两

春节物资供应凡凭票凭证供应物资按 2000 人安排。

发现问题：存有走后门现象。一月 27 日分小孩胶鞋 20 双，未卖给群众，自己分了。

第九门市部负责人徐某某，全店 9 人，全系小业主，其中：王某某有问题须否，尚未弄清。徐某某说居委赵主任对商店不大满意。进 20 双胶鞋没全卖给群众，私分了部分。

一居张某某买 2 斤粉条少了半斤，人家找回去了。买菜有时也不够秤，群众对他反映不好。张某某无正当职业，在青岛带过班子，解放后从事小商贩。徐某某过去贪污，现在未掌握。

许丙□对计划供应物资填证很松，有私人感情。

以前未送货上门，最近只送调料。一居调料、咸菜供不及时。

【0961 年 2 月 9 日】

天桥区粮食局生活座谈会

五店：

生活方面自干部下伙房后，虽然粮食压缩但能吃饱，调剂较好。吃的做法守旧。粗粮细作搞得不够好。五店王得勤原计划 48 斤，压缩后 39 斤。但反映这种吃法能吃饱没问题。

分局：

当前由于领导抓得紧，粮菜混吃，干稀调剂，能吃粗吃饱，但存在一些问题。

甲、发挥食堂人员积极性不够，学习外单位经验不够，没有搞熟食增量法，同志们要求搞熟食增量法再掺菜。主要是：①思想问题，伙房认为增量法就是多放水；②伙房狭小人员少忙不过来。

乙、吃地瓜干 1 斤顶斤 4 两，同志们意见多买点地瓜干和干饭。

丙、食堂管理上弱一些。有些制度执行的不够好，一度流于形式。经领导抓，轮流下伙房，人人轮流结账，因而改进了食堂。但这不是经常的，而主要靠食堂管理人员抓，而管理人员却依赖领导及同志们。执行制度不是机械就是形式。

丁、吃足定量问题比以前好。以前忽大忽小，现在已解决。但伙房则尽着吃，按他们吃法一月五十斤不够，这样形象同志们吃粮。再伙房吃细粮多，又是一天吃 2、3 个馒头。

王某某由 59 年下放，劳动补助粮标准不知道，后来补得不多，因超过 13 斤。60 年 9 月超 12 斤（计划不好，触发 7、8 天多吃点）。现在现在其欠食堂粮食 25 斤。

张某某（女），月经不正常，好几个月不来。□月 9 日检查发现水肿病，粮食计划 26.5 斤，食堂吃饭拿到家里，小孩也吃，细粮给孩子吃。

上月只吃一顿菜，油不多，吃足定量。有些职工这个月吃两顿菜。伙房人员在同志们吃完后再吃另外加油。伙房不按粮种搭配吃，吃大米麦粉多些。上个月以来没按规定吃，还有 400 斤没买，主要是嫌麻烦。

成本核算也核算了，但做得不细，如做干粮有数但水没数，窝窝有大有小，软硬不一，猜也是这样，多少菜吃多少油没数。以前有的同志没按定量交油票也吃菜（现已改正）。十二月份鱼没有吃够数，一月份没吃，海带、粉条吃得不够数。

炊事员吃饭虽然记账，但一个月吃了多少没数，司务长没结账。局里会统工作达 10 小时左右（目前），基层会统亦用。分局共四人，基层 1 人，人员少。

【1961 年 2 月 10 日】

2.10 天桥 16 门市部

全店供应户数 1200 多户，其中：经常在家吃饭 800 多户，超计划 100 多户，200 多斤粮食，一般超二、三斤，多者 10 来斤。原因：①余额结算差错；②压缩计划转迟了。共 20 户送粮到户，烈属、军属、单孤。

—— 原载 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Monday, September 26, 2011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饥荒 50 周年祭 人吃人能否已成过去式？

美国之音

中国大跃进期间的照片显示人坐在密植的稻子上。当时各地竞相伪造粮食高产，种下大饥荒恶果。

中国的南方都市报近日刊载了回顾中国 1958 年到 1962 年期间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长篇纪实报道，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记录了那场曾经饿死几千万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绝人寰的灾难。 半个世纪过后，那段历史在中国大陆仍是少有人触及的敏感话题。

南方都市报 9 月 28 日以两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首席记者韩福东的长篇纪实报道《跃进过后是饥荒——川东三年“灾害”纪实》。韩福东在四川东部达州市找到了几位经历过大饥荒年代的人，请他们讲述目睹的历史。

* 自然灾害是人祸 *

70 多岁的朱全森老人当年是乡里的一名教师，说起“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地出现的几十起人吃人的案例时，他颇感悲伤。朱全森后来参与了《达州市志》的编纂，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他对南都记者说，那场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更是一场人祸。他说，1959 年到 1961 年，当地连续三年旱灾，但其实栽秧期间稻田里是有水的，在正常情况下根本饿不死人。

川东地区的村民对韩福东说，提到大饥荒就不得不说起大跃进。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

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路线和后来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大力推行，让农民离开土地去大搞工业。这所谓的“三面红旗”还剥夺了农民的自留地，虚报粮食产量的风气也在全国风行。这一切都为后来的大饥荒埋下了伏笔。

大饥荒历史不能忘却

1959 年春大饥荒开始蔓延之际，18 岁的杨继绳是湖北省的一名乡村教师。 4 月里的一天，他被儿时的伙伴从学校叫回家中，因为父亲已经饿得不行了。杨继绳回到家中，发现父亲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饿得皮包骨，而家里一颗粮食也没有了。三天后，父亲与世长辞。

杨继绳(资料照片)

杨继绳后来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在新华社当了 35 年记者。现在，他是政论历史刊物---《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2008 年，他在香港出版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从 90 年代起，杨继绳花了 10 余年的时间，跑遍了中央和中国十几个省的档案馆，走访了大量的当事人，积累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完成了这样一部记录大饥荒的作品。而这个题材即便在那场灾难过去半个世纪后，在中国大陆也少有人碰触。

杨继绳说，父亲的去世和记者的责任感鞭策他完成了这本书。他说，大饥荒是 1949 年以来中国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样一场国家、民族的重大灾难必须要记录下来， 让后人不能忘却这段历史。

集权制度是祸根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指出，1958 年底到 1962 年初全国的气候属正常年景，而这期间中国各地共饿死了 3600 万人，其中山东、湖南、四川、安徽、甘肃、青海等省份情况最为严重。

1961 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 44 天的考察后说，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要毛泽东公开检讨。 杨继绳则认为，大饥荒其实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他对美国之音说，大饥荒的祸根是集权制度。

杨继绳说：“最主要的(原因)是高度集权的制度，剥夺了老百姓创造财富、增加财富的权利，让老百姓自己通过劳动来寻找食物的权利都没有了。政治的权力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大脑，控制着每一个人的肠胃。吃什么、吃多少，都是权力控制的。权力不给他就饿死。 ”

解决危机必须改变制度

杨继绳认为，从大饥荒到现在，中国在政治上虽然上宽松了很多，但基本的政治框架并没有变。他说，从大饥荒中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得到很多值得警示的教训。

杨继绳说："中国当年面临的很多问题，社会不公平也跟这个制度有关系， 所以当年的社会危机比较严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要走出危机、缓和矛盾，也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变。"

否认大饥荒是对历史的无知

《墓碑》出版后受到了以左派网站"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一些人的口诛笔伐。他们质疑这本书的历史真实性，认为饿死 3600 万人的说法毫无根据。一些人甚至指出，杨继绳的父亲并不是饿死的，而是患病死亡。

杨继绳说，批评他的这些人很多都没有看过他的书。他说，不少年轻人对今天的社会不公感到不满，以为过去比现在好。要是说毛泽东不好，他们就不高兴。杨继绳说，其实这种想法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

在《墓碑》的前言中，杨继绳写道，写这样一本书，除了是为父亲和 3600 万因饥饿而死去的中国人立碑外，也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当今中国发展的阶段，几年之内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应该很难再发生，不过在高度集权政治统治下的中国，出现其它灾难，乃至意想不到的灾难却是难以避免的。

—— 原载 美国之音
Friday, September 30, 2011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跃进过后是饥荒 川东三年"灾害"纪实

南方都市报
朱全森：在三年灾害期间，达县专区（下辖达县、巴中、通江、宣汉等县，1992 年撤销），出现过数十起人吃人的案例，让他颇感悲伤。"人吃人不止一地，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并非秘密。

原达县专区碑庙乡中心校教师朱全森，后参与《达州市志》编纂，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

大跃进时期达县专区红星农场培育的江西大萝卜，号称亩产 15000 斤。

50 年过去了，朱全森仍无法忘记那持续多年的饥饿体验。

1959 年，当饥饿在四川省东部蔓延开来时，26 周岁的朱全森，是四川省达县专区（现为达州市）碑庙乡中心校教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数十年后，他参与《达州市志》三卷本的编纂工作，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对那段岁月有刻骨铭心的反思。

朱全森说，在三年灾害期间，达县专区（下辖达县、巴中、通江、宣汉等县，1992 年撤销），出现过数十起人吃人的案例，让他颇感悲伤。“人吃人不止一地，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并非秘密。在王光美、刘源等人所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一书中，也曾记载，刘少奇曾在“七千人大会”后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达州市志》称，1959 年~1961 年，达县专区连续三年旱灾，1959 年 6 月 30 日起，达县、宣汉等地持续伏旱 49~67 天，1960 年，各县伏旱 20~47 天，1961 年夏全境干旱及中南部伏旱（大竹县 54 天），使粮食连续三年减产。不过，朱全森更愿意用“人祸”来形容这场灾害，他和达州市公安局文史工作者何大地均对南都记者说，那三年，栽秧时节水稻田里是有水的，那点干旱在正常情况下根本饿不死人。

给那段惨痛历史做注脚的数字是，1962 年，达县专区总人口 354.2254 万人，比 1958 年减少 30.4396 万人，年均减少 7.6099 万人，年均递减 19.78%；而在 1950~1957 年，人口是呈增长态势的，年均增长率为 16.81%（据《达州市志》）。官方的人口统计是否准确，仍有很多争议。达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在编著《中国共产党达县历史第二卷（1949-1978）》时，就回避了该县死亡人数，仅提及“1961 年春，全县 10 余万人出现水肿病。”据达县县志，1961 年达县人口 88 万余人。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吉文对南都记者说，“统计数字是失真的，和实际与推论不符合，死的人应该更多些。”

“达县专区饿死人的情况，在四川算严重，但不是最严重。专区内部也不平衡，要看地方领导的领导水平如何，有的领导更过火，有的手软些。达县专区 11 个县，灾害最严重的是宣汉县，而宣汉县内也不平衡，基层执行并不完全一致。”朱全森说。

这一段饿死人的故事，是从“大跃进”开始的。

“我叫我儿子、孙子以后都亩产万斤”

周永开，生于 1928 年，是民国时期加入中共地下党的老革命，“大跃进”开始时，他是达县专区巴中县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

“1958 年，巴中县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把农民抽走，农田里没劳动力了，粮食都没收回来，红薯在田里都烂掉了，但后来还算到总产量里去了。”周永开对大跃进的回忆，从农田荒废开始。他对南都记者说，在 1958 年之前，全国经济上升，大环境很好。而转折就发生

在 1958 年。

这一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被提上日程。总路线、大跃进与随后出现的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开始在全国大力度推行。

“大跃进”语境下，达县专区也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工业上号召“超英赶美”，组织了大约 85 万人的钢铁大军，建成土高炉上万座，铁质的生活用品和碑、钟等文物都被拿去炼钢了。仅宣汉县，就有 4557 间农民住房、5997 间牲畜圈舍和 1659 万株成林树木被拆毁砍伐，充当燃料。农业上，则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统一劳动和吃饭供给。

“大办公共食堂，不准自己家冒烟做饭，农民也没自留地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没有三面红旗，农民要好过得多。”时为达县专区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严宗全对南都记者说。农民的命运和人民公社紧紧捆绑在一起，为此后的灾害埋下了伏笔。

朱全森说，为响应“一大二公”的口号，“我们那儿就把两个食堂合并成了一个，小李家沟的人都要去大李家沟吃饭。开始时，有的妇女觉得还可以，因为不做家务了。后来从觉得不合口味开始，慢慢问题越来越多。”

但在 1958 年，吃饭还不是严重的问题。按受访者的说法，事实上，虽然有农作物腐烂在农地里没有收割，但这一年的事实粮食产量较 1957 年为多，这一年并没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当时的口号是“敞开肚皮吃饱饭，鼓起干劲搞生产”。也是在 1958 年，“大放卫星”的风气开始在全国流行。“粮食都估产很高，从亩产千斤到亩产万斤。”周永开说。

当时四川省委书记在四川省大跃进上颇费心思。“他讲要亩产万斤，有一次，温江一位地委副书记说，达到亩产 9800 斤了。四川省委书记说：只 9800 斤，一万斤搞不上？这位地委副书记说，没得行了，只 9000 多斤了。省委书记说：我叫我儿子、孙子以后都亩产万斤。”周永开提及这段往事时，也注意到现在袁隆平超级稻亩产刚刚突破 900 公斤。

“不相信农民会种田”

为了达到高亩产目标，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达县专区也采用了很多办法。

首先是划分了很多试验田，并在耕种方式上力图革新。比较带有时代特色的革新包括密植和深挖，这和农民传统种植方式相去甚远，但举国上下强制推广。

朱全森记得，1959 年的一天，他和其他一些人被叫去种植试验田。“干部在一边指手画脚，叫我种第一行，我就按照密植的要求种了。区委书记表扬我，说我的‘四方兜’密植很好，又问我是否会‘梅花秧’种法，我说会。他让大家都这样种，我们七八个人栽了一下午秧苗。后来没人去收割。太密了，根本不产粮食。”“四方兜”也好、“梅花秧”也好，一个共同点是密植。

密植不产粮食的现实，并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朱全森说，到了 1960 年，四川省又发起“三个一”运动，要求栽秧的行距等都要保持一致，试验田种地都要拿着尺子，一边量一边栽，“太密了，不仅费种子，而且耗工误农时，十几个人一天也就载一亩秧。”更关键的是，影响收成。示范田，大家要严格按要求密植，非示范田就好些。

深耕的经历同样惨痛。1959 年，朱全森工作的碑庙乡组织机关干部和右派分子 40 多人，去中心校后面一块田地种植油菜。“挖地，挖三尺深，分三层挖。然后种植油菜。这是最荒唐的事，后来颗粒无收，油菜根都烂了。但到了 1960 年，还继续深耕。”

那次深耕，朱全森等人一直劳作到凌晨 2 点，大家头发都被露水打湿，也感觉非常疲惫。一位干部提议回家休息算了，得到大家响应。他们回去洗洗刚躺下约半个小时，就被哨声唤醒，原来上级检查来了。大家赶快起来，又赶往田头。

“一晚上没怎么睡，怎么办？早饭后，白天睡。”朱全森把房门外挂上锁，谎称下乡去了，自己则在屋中睡大觉。其他人或者去农民家，或者在山间找块空地，补回头晚的损失。

这是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强迫超时劳动现象，普遍的饥饿让这种劳动强度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民众在可能的空间内寻求解脱。朱全森说，1958、1959 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野战”，到 1960 年上半年随着水肿病越来越多，才慢慢少了。有一次，在碑庙中心校搞基建的朱全森去李家营生产队送木料，看到管理区一个副队长正组织大家披着蓑衣去农田“野战”。“没下雨，怎么披蓑衣？”朱全森内心奇怪，偷偷跟了过去，原来他们只是在应付上级检查，在附近一个空房子内地上铺着蓑衣睡觉。

何大地祖母的弟弟，曾经在背地里痛骂：这样背时的政府哪能……，这样搞生产哪能有吃的？只是那个时候，这种声音只能在私下讲出。“没人敢说真话。”朱全森说。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是，大跃进之前，“整风反右”等运动，已经让人们懂得管好自己的嘴。

那时，朱全森出生地北外公社是达县专区的样板公社，另一个魏家公社是达县的样板。朱全森记得，魏家公社上报的亩产是 6000 斤，临近上级检查时，就从附近的麻柳乡挑长势好、抽穗的谷子拔出来，用汽车运来，堆种在试验田里。“结果秋雨来了，谷子不透风，检查过后，没有长熟就捂烂了。”

朱全森说，类似的情形一直持续到 1961 年春《农业六十条》发布，“这才终于相信农民自己会种田。”

“公粮一交，农民没得吃了”

四川省虚报的高额粮食产量，给了中央超额征购粮食的理由。

“中央传达指示说，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只剩下 7 天粮了，四川要调几十亿斤粮食支援。巴中县一天有四五千辆车，连续不断给中央运粮。本来粮食就少了，大家的口粮就慢慢减少。”当时主管农业的巴中县委副书记周永开说，国务院给四川省委书记打电话，省委书

记再给各地县电话，要求必须调粮，头等任务就是要保证运到中央。周永开经常参加省委电话会，经常一天有两三个会议协调调粮，有时还要前往省城成都。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农民，也包括干部。周永开说，公职人员最初的口粮是每月每人 30 斤，后来慢慢减为 27 斤、21 斤，最低时仅 18 斤。不过，那时领导干部有特殊照顾，所谓大灶、中灶、小灶的区分。周永开每月能额外多分些肉蛋。严宗全 1961 年是副科级干部，曾享受了三四个月的特供食品，他记得一个月有一条烟、一斤黄豆等。

最惨的还是农民。“公粮一交，农民没得吃了。”周永开说，那时缺油少盐，农民还要超负荷重体力劳动，一人每天最少要 1 斤粮才能吃饱。但干部还有定量口粮，农民就没人具体管了，交完公粮剩下多少算多少。

周永开彼时主抓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和征粮，他思想上的压力很大。“主要是粮食压力，就是要保证把仓库里的粮食运走。”他说，总体上而言，那时候的老百姓和现在的想法不一样，巴中是革命老区，人民尤其听话，特别是听说调粮是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所以也比较配合。“那时的政治宣传到这种地步，中央一声号令，别说要粮，死都愿意。”

老百姓的听话程度，在调粮过程中展露无遗。达县专区位于大巴山区，交通不便，曾一度用人力背粮行走山路。朱全森说，1960 年，济南军区派出一个营来到达县，用汽车往外运粮。在汽车不能抵达的乡村，只有动员饥饿的农民上阵。

从金石乡背负粮食到通车的公路，有三十里的上下坡山路。朱全森听说，有一个农民就在这个过程中饿死在路边。但也有农民会借此机会偷偷吃些米。碑庙乡一位副区长唐成之，就曾看到一个农民用自带的铁皮罐头盒子，在桥边舀来水，就地煮米饭吃。不过，唐成之并未揪斗此人，只是问他为什么不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去煮。这种不完全执行中央与地方命令，暗中同情农民的官员，被朱全森称为好干部。

达县专区通江县沙溪公社伏家坝生产队的何光宇也记得，那时每家都被分配了背粮的任务，不得不完成，村里连老婆婆都动员起来，背粮走 80 里山路到毛浴镇，那里通公路了，再远处，广元的火车站有专列在等着向外运粮。

1960 年，达县专区的粮食被源源不断地运出去。“那是水肿病最厉害的时期，死人最多是在 1960 年春节前后，尤其是农历正月、二月的时候。”朱全森回忆。

“那两年我们村一个娃都没生”

饥饿从 1959 年下半年开始。

12 周岁的何光宇读四年级了。放学回家时，因为肚子饿，走山路爬石梯常常爬不动，用手撑在地上一点点挪动。在公共食堂做饭的母亲心疼得哭，常常偷偷给他点吃的，所以他身体比一般同学还要好些。

何光宇所在的村子原来有 100 多人，后来因食堂合并，附近住得分散的村民为避免走十多里山路前来吃饭，也搬过来住，形成 200 多人的规模。而他们原来的居所就在空芜中慢慢败坏。

将家中茶壶都砸烂去炼钢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敞开肚皮吃饭”的好景也不长，1959 年的饥荒袭来，公共食堂吃得都是“超级稀饭”。吃饭时，“每人一勺稀饭，和炊事员关系好的，一勺干些的稀饭，不好的，水就多些。吃野菜，只要猪能吃的人也吃。”

读小学的何光宇也被要求每天挖 6 斤葛根，上交食堂。这个东西深埋在地底，要动用钢钎、锤子，费好大劲才能挖出来。何光宇的一位同龄同学何光森，因患有癫痫病，身体差，完不成任务，就被生产队的干部殴打。“用湿树条打他。他回家后没吃的，过两三天就死了。”

伏家坝生产队一共饿死了 4 个人，其他三个是饭量大的精壮劳力。死人相对较少，因为附近的树皮草根比较多，可以充饥。食堂附近的原村民比外迁过来的占有优势，晚上生产队长会偷偷与大家私分些食物。

巴中县玉山区官公乡英雄大队就没有那么好运。虽然英雄大队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土地平旷，水利好，有河水自流灌溉，产粮也多。但正因其产量多，在极左干部的强迫下，征购粮也格外多。“结果大队 1100 多人，死了约 200 人。这是巴中县死人最多的地方。我们就批，死这么多人，哪里是英雄，是狗熊！”周永开说，他去这个村视察，村民反映上面应该给村民拨粮，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乡、村干部浮夸和工作作风粗暴上，对县级干部都不予批评。

大家普遍患有水肿病，女人则闭经和子宫脱落。“那两年，我们村一个娃都没生。”何光宇说，他的哥哥在不远的洪口乡教书，那里死人相对更多，常常有人走路时倒下，再也没能起来。而在沙溪公社文胜乡，还曾发生轰动一时的食人案。

“执行的背时，不执行的也背时”

饥饿的年代，阶级斗争的弦常常绷得更紧。在达县公安局档案目录上，南都记者看到不少这一时期的“反革命”等案件。另外，也有很多以“刀儿教”等名义的小范围预谋暴动，很快即被镇压。

对“三面红旗”心怀异议，在当时是件很危险的事。

伏家坝大队有个叫王成木的社员，因为对统购统销征粮过多有意见，在 1958 年时就被生产队长打成“坏分子、右派”。何光宇记得，有一天晚上，生产队在学校会议室里开会，书桌都被移到一边，屋里燃起一堆火，他听见生产队长一声吆喝，“把反对统购统销的坏分子王成木抓上来”，立刻就有几个积极分子从人群中把王成木押上台，按在地上拿棒子打。

那次对王成木的批斗持续约半个小时，给年幼的何光宇留下很深印象。“那时动不动就打人。后来给王成木平反时，发现档案里没有坏分子和右派帽子，一直是生产队长自己说他坏分子、右派。”

在达县金桠公社，有个地主成分的杨光金，因为向《四川日报》写信，对粮食政策有意见。1960 年被“抓获”，罪名是反对统购统销与大跃进。

“三面红旗，只能说好，不能批评，否则，想斗你就斗你。”朱全森说，面对自中央传达下

来的指示，基层干部也常常不知所措，“执行的背时（倒霉），不执行的也背时。”

不执行中央决策者，完不成征购粮食任务，要受到处分；严格执行者，少不了手上添很多血债。1961 年，政策开始有所转向，体现在达县专区基层的，是“反军阀作风”运动。部分干部因推行强迫命令逼死人而受到批斗。朱全森说，达县安云公社双河口村支书郑道福，因工作积极，严格执行上级命令而升迁为公社副书记，但在反军阀作风运动时祸临己身。“他人比较耿直，想不开，就在达县县委宾馆厕所里上吊死了。”

在达县专区，反军阀作风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乡村干部，连县级官员都很少触及。朱全森特别提及，饿死人最多的宣汉县，县委书记在群众中印象很差，最后只是调到专区某部任副部长而已。

饿死人的现象在 1962 年开始缓解。这得益于年初“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周永开参加了这次大会，他最终听到了四川省委书记在饿死人事件上的检讨。

—— 原载 南方都市报
Friday, October 07, 2011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
—— 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客、出版人鲍朴
阳光时务
采访：沈达明

荷兰籍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otter）

面对中国当代历史中的大黑洞，有人回避，有人否认，也有一些人坚守历史家的良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将这场被遗忘的惨剧真相揭发出来。冯客作为一位欧洲学者，就在中国做着这样的工作。他抓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查阅到重要的官方档案和文件，并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判断。

冯客

问：你为何对大跃进和大饥荒的主题感兴趣？

答：20 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民国时代。一点点的，从 05 、 06 年开始，我发现越来越多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的资料被档案馆公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机会。这是一个出於实

际的考虑。另外还有一个考虑：既然出现了这些资料，作为历史学家，怎麽能绕过这个害死上千万人命的中国历史上的巨大黑洞，去继续做历史研究？所以（做此研究），是出於实际上的和道德上的两个考量。

问：你如何计算出有至少 4500 万人在大饥荒中失去生命？

答：我没有精确的数字，算出精确数目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必须注意，至今每一步估算都是基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公布的官方统计。然後，历史学家、人口学家，用这些数据估算出 1200 万至 3000 万人。上海的曹树基用官方公开的地方「县志」，算出 3200 万（《大饥荒：1959—1967 年的中国人口》——编者注）。但我发现，档案馆内的截至到 1961 、 62 年数据，包括由公安局、省委以及很有权力的调查组编辑的资料，与政府公开的数据有极大的差距，相差至少达 50%。基於非常细节的研究，我认为 3000 万或 3200 万应提升到至少 4500 万人。

问：研究大饥荒的惨状、死亡数字的多寡，有什麽特别的意义？

答：本书中的最大发现之一，是频繁的暴力所扮演的角色。（听到）「大饥荒」，你以为是人们因没有食物而被饿死。但是本书发现，许多的人实际上是被打死，是被折磨死的。这是本书最重要的发现。也就是说，人们饿死和人们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人们饿死是没有足够食物，但当有食物，故意的不给他们，人们被饿死，这等於是谋杀，大规模的屠杀。根据一些报告和观察，在四川某些地区，高达 60%到 80%的人口遭受到不配给食物的惩罚，而导致死亡。

问：你是否同意，毛泽东的大饥荒与世界历史上其他人为造成的灾难的不同之处，在於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并不是有意造成的？

答：不，（大饥荒）绝对是人为有意造成的。有时看起来似乎是无意的。什麽是真正的意图？他（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制度， 建立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他推动极端的合作化，他要求其他人，像周恩来，要遵从他。

1958 年，周恩来不得不进行了三次的自我批评，因为他根本不认同大跃进的主意。周恩来不得不在所有党政领导人面前进行三次自我批评，这是很大的羞辱。不仅如此，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宣扬暴力是光荣的。他说的很清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认为暴力是好的。

不谈毛泽东，在村庄，许多人被饿死，因为不给他们饭吃。这些受害人是谁？你会发现，有很好的理由说明他们为什麽很坏。他们很坏因为他们是富农，或因为他们是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孩子，基本上属於所谓的「黑五类」。他们被挑了出来，（死亡）并不是随机的。所以，在毛泽东建立制度、和地方干部定出具体的铲除一些人的目标，这之间有一条直接的关系。这里面有许多明显的意图，但是非常的复杂。

问：你如何鉴别文件和数据的权威性？

答：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你对权威性的疑虑，说明数据有可能被造假。伪造数据是非常困难的。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亲眼见到了原始文件，不是复印件。我可以看到上面的签名、封印，可以从纸张分辨出它有年头了。

另一个原因是，文件从来不是单张，有可能几张复印件，甚至上百张。比如，一张送到省委部门，一张送到公安局，一张送到中央。你可以找到的文件从来都不只一张。 这就是为什麼很难摧毁这些文件，也很难造假。

问：有人认为你的写作比较主观，呈现证据之前遍提出评判，不符合学术标准，你怎麼回应这种批评？

答：是否具有学术性要基於你所使用的材料。本书 95%的资料来自中共的档案。我倒希望看到有一本书能有这麼多第一手资料，但还没有。另外，我基本上让这些档案自己说话，我不去干扰，不在上面做评论，我让证据自己说话，读者自己去评断。

我尽可能的保持客观，和资料保持距离。批评可能是因为本书是写给大范围的读者群。为什麼？因为主题太重要，而不能只留给一小部分专家做研究。因为这些专家花了 20 年、 30 年时间去写一个主题，做出的成绩太局限了。这本书是讲述涉及人民和中国的大灾难，关系到全世界人的利益。这是 20 世纪三大灾难之一，另外是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古拉格，所有人都应该拿起这本书读一读。

问：你对其他有关大饥荒的中文着作，比如对杨继绳的《墓碑》有何评价？

答：我对杨继绳很尊重，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他的书不太好读，我还没见过有人把他的书全部读完的。《墓碑》有两大册，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总是同样的故事：有人饿死、有人饿死、有人饿死。《墓碑》还有个问题，总是关於毛泽东。

杨继绳毕竟是共产党员，和其他人一样，总想将毛泽东跟党分割开。但我的书写得很清楚，第二位是刘少奇，第三是周恩来，第四邓小平，他们都在关键的时刻给了毛所需的关键的支持，推动了大跃进前进。很明显，并不是只有一个人应为所发生的事受到责怪，或只责怪一个无人负责的体制。就像纳粹德国和苏联的例子，责任远远不止最高位的某个个人。

鲍朴

问：您为什麼选择这本书出版？本书有什麼特色？

答：这本书是很有特点的。我选这本书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他的材料是根据他去查那些中共档案，省市级的，还有地级的。这些档案，以前没有做综合的审视。他把它综合起来放在一本书里头，这就是很好的。

研究中共的历史，档案是一个很好的来源。另外一个很好的来源就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同样有问题，就是这个材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就要这些历史学家去把它重新研究审视，然後写出书来。

第二个就是他不光给出这个材料，他提出的一个史学的观点，那麼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有人认为就是留下研究记录就可以了，还有人认为，还要提出历史的观点去总结、去归纳。我认为，冯客先生这本书，不光是给出你材料，他还做了归纳。他的史学观点，就是大饥荒在中

国现代史它的地位如何。

第三个特点就是他这个书包括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饥荒给我们理解就好像有人饿死，但他描述的一场浩劫实际上影响到高层政治、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问：您认为本书的出版对历史研究有哪些重要的贡献和意义？

答：最近出版的党史二卷，大概承认大饥荒死亡 1000 万，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进步了。（死亡）数字呢，也说明一些问题。但我个人认为，到底是死了 1000 万，3000 万，4500 万，性质是一样的。关键是要正视这个问题，要把问题的性质讲清楚，有个共识之後，对今後有帮助。

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两场浩劫，刚才冯客先生讲到，其实饥荒死人更多。它的整个程度和规模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为什麼饥荒写的人少？知道的比文革要少？我认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这些人包括了城市里的精英。他们最後回到社会生活当中去，回来以後，有很多处在掌权的位置上，因此对文革的反思比对饥荒反思深刻得多。那麽，这就是这本书在今天的意义。

作者小档案：

冯客（Frank Dikotter），荷兰籍历史学家，曾任教於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现为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他最新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 年的中国浩劫史》（Mao's Great Famine: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获 2011 年度英国约翰逊（Samuel Johnson Prize）图书奖。

—— 原载 阳光时务
Monday, October 10, 2011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现代史的核心——《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原序

冯克

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间，中国陷入了人间地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带领全国投入疯狂的大跃进，企图在十五年之内赶上并超过英国。毛泽东认为，中国有广大的资源，即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足以一举飞越他的竞争对手。他没有仿照苏联单一发展工业的模式，而是「两条腿走路」：发动广大农民同时改造农业和工业，把经济落后的现状，转变为物质极丰富的共產主义社会。为了追求乌托邦天堂，一切都集体化了，把农民集中在庞大的公社裡共同生產劳作，这些公社就是共產主义的试验性标誌。农民被剥夺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家园、他

们的田地、他们的财產和他们的生计。食物由集体食堂根据工分按勺分配，於是就成为迫使人们服从党的领导的武器。多达一半的农业劳动力被迫投入大修水利的群眾运动，这些大规模的蓄水工程的所在地往往离家很远，劳动者必须在那裡长时间地连续工作，缺乏足够的食物和休息。这场实验最终为国家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夺走了数千万人的性命。

至少四千五百万人非正常死亡

相比同类的灾难——例如波尔布特、希特勒或者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灾难——发生在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即，大跃进期间发生的灾难的真正规模至今鲜为人知。因为长期以来，共產党的档案是不公开的，是机密，只有极少数持有证明信的最受信任的歷史学家才能看到。但是最近，新档案法出台，大量档案资料得以向专业的歷史学家开放，这就使得学者们对於毛泽东时代的研究能够较为深入。本书参考的档案文件多达一千餘份，歷经几年收集，从数十个党的档案馆中遴选，包括位於北京的外交部，还有来自河北、山东、甘肃、湖北、湖南、浙江、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等省的材料，分佈在全国不同地区的市县档案馆，行政级别虽然较低，但其资料同样珍贵。收集到的材料有公安部门的机密报告，党内高层会议的详细纪录，未经删节的重要领导人讲话，农村工作研究，大规模死人事件的分析，对死亡数千万人负有责任的干部们的检讨，大跃进晚期派去的特别小组对饥荒真实程度的调查，农民抵制集体化运动的综合报告，秘密意见调查，以及普通群眾的上访信等等。

这些浩瀚详细的卷宗推翻了我们对大跃进的理解。例如，关於最终的死亡人数，迄今为止的研究者只能根据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下结论，其中包括一九五三、一九六四和一九八二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他们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一千五百万到三千二百万之间。但根据公安部门同期整理的报告，以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内中共匯编的大量秘密报告显示，上述数字是远远不足的，灾难的实际程度要严重得多：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年间至少有四千五百万人非正常死亡。

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无处不在

「饥荒」或「大饥荒」，这两个词常被用於形容毛泽东时代那四五个年头，但它无法概括过激的集体化运动所导致的各种死亡情况。同样，不负责任的「饥荒」二字有助於形成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死亡是由於经济计划匆匆上马、执行不善的无心之失。通常也不会将毛泽东、大跃进与大屠杀联繫起来。一般认为，中国当时的情况和缓得多，这是沾了柬埔寨或者苏联的浩劫的光，与两者相比彷彿如此。但本书披露了新的证据，显示大跃进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无处不在。这归功於中共自己匯总的极尽详细的报告，我们从中推断出，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间，粗略估计有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的死者是遭酷刑致死或直接处决的——仅此一项至少有两百五十万人。至於其他受害者，有的是被有意剋扣食物而饿死的，还有许多死於衰老病弱或丧失劳动力——因为不劳动就无法得到维持生命的食物。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讳，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当地干部出於压力，千方百计迎合上面下达的指标，只抓数字，不顾人命，间接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因此丧生。

物质极大丰富的空头支票，不仅造成人类歷史上最惨重、规模最大的死亡，还给农业、

贸易、工业和交通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钢铁產量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神奇标誌，於是锅碗瓢盆和农具都被扔进后院的熔炉以增加铁水的產量。兴办万猪场本来是让家家户户有肉吃的伟大宏图，但事与愿违，牲畜数目骤减，不光因为大量宰杀供应国外，还因为是成批牲畜病饿而死。原材料和资源随意配置，加之工厂领导们为了增產无视生產规程，使浪费越来越严重。人人都在偷工减料，盲目追求更高產量。生產出来的劣质產品堆积在铁路两边如同废物。腐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根纤维，从酱油到水坝一起变质。交通系统陷入停滞，最终全面瘫痪，再也无法负荷计划经济的需求。价值上千万元的货品堆积在食堂、宿舍甚至是马路上，就此烂掉或者生銹。浪费到了无以復加的程度，穀物堆积在尘土飞扬的阡陌之间，而人们则在啃树根或者泥巴裹腹。

本书同样记录了「跑步进入共產主义」如何造成人类歷史上对财產的最大程度的破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一次轰炸。百分之四十的民房变成瓦砾，有的被推倒，用来製造肥料、建设食堂、安置农民、修建公路、留出空间创建更美好的明天，甚至什麼都不为，单单为了惩罚住在房子裡的居民。自然界也未能倖免。我们永远无从得知大跃进期间究竟减少了多少森林面积，我们知道的是，在某些省，长期过度砍伐所毁掉的树林高达一半。河流和水道同样遭殃：水坝和运河遍佈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参与修建，耗掉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绝大多数毫无用场，反而成为祸患，导致泥石滑坡，河流淤积，土地盐碱化以及洪水泛滥。

毛刘周形成的利益链和派系联盟

因此，本书并不局限於论述饥荒本身。它披露了许多灾难的细节，详细记下毛泽东如何在一个濒临崩溃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上建立自己的威信。随著灾难的展开，毛泽东对批评自己的人残酷打击，以维护自己作为中共领袖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饥荒结束之后，形成了一些对毛不满的新的派系：为了牢牢把握政权，毛泽东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将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歷史上最关键的事件。若想真正瞭解共產中国，必须将大跃进放在整个毛泽东统治时代的核心位置来考量。从更宏观的角度说，现代社会致力於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间寻找平衡；而发生在那个时期的灾难，则时刻提醒人们：把国家干预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实在是错上加错。

本书提供了新的线索，说明一党制政体下权力如何运转。政治学家研究大跃进背后的政治，都是基於官方声明、半官方文件或者文化大革命时期流传的红卫兵材料，但这些经过审查删剪的资料无法透露内幕。人们无法完整地瞭解核心领导人的真实的所言所为，除非北京的中共中央档案向研究者开放。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但在省级档案中可以找到许多关键性会议的纪要，因为地方干部经常参加重要的党内会议，以随时领会北京的领导意图。这些档案披露了领导层的另一面：随著一些极机密的会议内容逐步为人所知，我们看到中共内部成员之间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其中毛泽东的面目很难令人恭维，与他精心树立的公眾形象相差甚远：谈话漫无边际，老子天下第一，沉湎於陈年琐屑，开会时擅长虚声恫吓，最重要的是，他无视人民死活。

我们知道，是毛泽东一手策划了大跃进，因此对於此后的灾难，负有主要责任。为了实现目标，他使出浑身解数，协商、哄骗、煽动他的同僚，有时还要折磨或者迫害他们。他不像斯大林，不是把他的对手投入地牢处决，但他有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作为党内的最高统治者，他还有其他许多特权。赶超英国的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几年后他勉为其难

地允许他的同僚重新採取较为和缓的经济发展政策，大跃进才算寿终正寝。但如果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两位权势仅次於他的领导人带头反对的话，他也不可能一意孤行。刘周二人轮番驱策党内其他高干支持毛，由此形成的利益链和派系联盟一直深入到基层农村——本书对此首次作了记录。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表现一般的干部被撤职，而强横霸道的角色则借助於从北京颳出的极端过激主义的狂风，横行不法。

这样那样的隐蔽的抵制和颠覆

本书最重要的工作是，将这场灾难的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分析，在此之前的研究都将两方面孤立起来。我们必须把中共权力中心——中南海——内发生的事件，和普通百姓的遭遇结合起来。除了个别基於访谈的农村调查报告，根本没有任何关於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史，更遑论大饥荒了。正如档案中的新证据所显示的，这场灾难远远不能只归咎於毛泽东一人。中共匯编的大量文献展示了该党统治下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文件颠覆了老百姓仅仅是受害者的观念。儘管共產党对内对外都在宣传本制度的稳定有序，但它从来没有能力把它制定的宏伟蓝图成功地实施过，因为总是遭到这样那样的隐蔽的抵制和颠覆，这种抵制和颠覆在任何一个民选政府的社会中都是闻所未闻的。和有民选政府的社会相反，在实行严酷纪律的共產社会裡，决策层的错误导致整个社会机器发生故障陷入停顿。从档案和访谈中暴露出来的，是个正在解体的社会，是个人各自为战，但凭本能求生、不择手段的社会。所以，正是极端激进的集体化运动本身起著破坏作用，迫使各阶层的人大家都想方设法规避、削弱或者利用中央（兴公灭私的）政策，暗中演化成（极度自私自利的）利益驱动，而这正是中共致力消灭的对象。随著饥荒的蔓延，普通人要想求生，必须越来越依赖於各种反常的手段，诸如撒谎蛊惑、私藏欺瞒、行骗偷窃、巧取豪夺、玩弄谋术，诸如此类，和国家周旋。正如罗伯特□赛韦斯（Robert Service）所指出的，在苏联，这些现象并没有使国家机器停止运转，反而像润滑油一样防止整个制度完全陷入停顿。「纯洁无私的」共產主义政体，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动力推动人民合作，而没有一定程度的利益驱动，它只能走向毁灭。共產党真想长久维护其统治地位，就得时不时地违反自己的共產纲领。

只有反抗，才能生存。从农民私藏粮食到地方干部造假账，群眾发明了种种求生存的方法，同时也延长了政权的寿命，从而成为制度的一部分。混乱是共產主义者的生存方式，人们靠说谎求生存，结果是信息被一路篡改到党的主席那裡。计划经济需要大量录入精确的数据，然而在每一个层面，目标是失真的，数据被夸大，和地方利益相冲突的政策则不被理睬。在求生的驱使下，个人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维都必须被压制，终於形成了长期的封闭僵化。

堕落成为习惯导致更大的破坏

有些歷史学家会把这种生存行为解释为「抵抗」的证据，或者是「农民」反抗「国家」的「弱者的武器」。但是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如果大饥荒期间从上到下各式人等偷窃粮食都算「抵抗」行为的话，这个党早该垮台了。乍一看，普通百姓的抵抗佔据道义上的优势，这种抵抗文化很容易被赋予光荣色彩。实际上，面对有限的食物，一个人吃饱往往意味著另一个人挨饿。农民把粮食藏起来，城裡的工人就没有饭吃。这个工厂的职工在麵粉裡掺沙子，到头来总会有人吃进嘴裡。那不过是绝境之下的生存方式，不能把它浪漫化，就好像不能将世界看成非黑即白。事实是，集体化从不同角度逼迫每一个人作出艰难的道义选择。堕落一旦成为习惯，势必导致大规模的破坏。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在关於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回忆录中提到，倖存者很少是英雄：在一个奉行弱肉强食原则的世界裡，谁

把自己凌驾於他人之上，就意味著他的道德观已经蜕变。列维在《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一书中有个灰色地带，描写几个同住的人，为了获得一份额外的食物，不得不背叛自己的伦理道德，以求生存。他尽量不评判，只叙事，层层展现集中营的日常生活。这也是本书的主旨之一：让读者理解大灾大难期间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中共档案首次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半个世纪之前人们所做的艰难选择——无论是最高决策者，还是远离北京的茅屋裡饥饿的农家。

本书前两部分考察大跃进是怎样展开的，背后的原因是什麼，确认几个关键的转折点，详细说明千百万人的命运如何被寥寥几个最高领导人的决定所改变。第三部分考察破坏的程度，从农业、工业、贸易、住宅到自然环境。第四部分展示宏伟的蓝图如何在普通百姓的生存斗争中变形，其后果没有人预料到，也很少有人完全认可。城裡的工人偷窃、怠工或者蓄意破坏计划经济；农民则採取形形色色的手段以保命，从直接吃地裡的青苗，到背乡离井逃荒活命。还有人抢粮仓、纵火烧党委办公室、袭击货运列车，偶尔还组织起来，武装对抗政权。但在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下，人民处於最底层，他们反抗求生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其中有些人相对更加脆弱，第五部分关注的就是儿童、妇女和老人的状况。最后，第六部分试图分析人们的致死之由，从意外事故、疾病、折磨、被谋杀、到绝食自杀。本书最后《关於引文来源及参考书目的说明》较为细緻地解释了从档案文件中取证的情况。

—— 原载 动向

Sunday, October 16, 2011